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　　期：总第七期（2018 年 2 月—2018 年 4 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　　辑：周诗雨
编　　务：陈天传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 信 公 众 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七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文研通訊

（2018.02-04）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七期

CONTENTS

目录

01 百廿校庆专题

（一）“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未名学者校庆讲坛 02

1、学者讲述 02
- 咎涛：在传承中守正，在守正中创新 02
- 陈侃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05
- 王洪喆：问学之路与归家的人——我的北大学缘 07
- 陆胤：“受业师”和“问学师” 10
- 孙飞宇：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 12
- 程乐松：平静的自觉：传承就是一种坚守 16
- 贾妍：窗外一塔湖图，门里两河春秋——一场始于北大的远行与回归 18

2、前辈分享 22
- 叶朗：做学问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22
- 张鸣：校魂与学缘 26

3、领导总结 29
- 王博：道可传而不可授 29

4、专题报道 31
-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北大文研院举办未名学者校庆讲坛 32

（二）“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纪念展” 34
- “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大文研院举办校庆纪念展 34
- “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纪念展”专题展览精选 35

（三）校庆系列学术活动 41

42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44

[72] 弗雷德·克莱纳：罗马肖像——真实还是虚构 44

[73] 傅无为：坚持，坚持下去！——阿比·瓦尔堡笔下作为自我心智画像的《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 47

傅无为：有障碍的摄影——瓦尔堡美国之行的图片 50

[74] 朱苏力：作为国家制度的家国天下 53

朱苏力：大国的精英选拔 59

[75] 韩森：千年的世界：全球化的开始 63

[76] 德克·凯斯勒：普遍的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大叙事 66

[77] 沈志华：再谈朝鲜战争——从信息沟通和情报认定看中美苏三国的决策 67

[78] 塔玛·加布：影集与华服——进入非洲档案 71

塔玛·加布：绘画 / 政治 / 摄影——马莱内·杜马斯、卢蒙巴夫人与非洲女性图像 75

[79]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遭遇及相关看法（1868—1945） 78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全球化与土耳其的亚洲研究 81

（二）未名学者讲座 83

[29] 闵雪飞：弒神诗人佩索阿——读组诗《守羊人》第八首 83

[30] 李溪：文人之物：从苏轼像中的“杖”谈起 86

[31] 胡鸿：通往华夏之路——六朝南方山区的历史进程 89

[32] 卢白羽：进来吧，因为这里也有众神！——《智者纳坦》里的启蒙与宗教 93

[33] 郭永秉：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 96

（三）北大文研论坛 100

[59] 王绯思等：世界政治进步了吗？ 100

[60] 凯斯勒、苏国勋等：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 105

[61] 和田春树等：日俄战争、东北亚与世界近现代史的转折——《日俄战争》新书研讨会 109

[62] 唐晓峰、鲍宁等：从公主府到红楼——老北大的校园空间（1898–1952） 114

[63] 李水城、张弛、李零等：欧陆视野下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 118

（四）文研汇讲 124

[01] 张治：钱钟书与西方神秘主义诗学 124

[02] 徐建委：早期中国的史料加工——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考察为中心 126

[03] 严志斌：巴蜀符号探索 128

[04] 韩朝：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 130

[05] 赵刚：细读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 131

[06] 刘亦师：田园城市学说之思想来源及其全球传播与实践 133

[07] 孙正军：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解读为线 136

（五）文研读书 138

[07] 先秦城邑与社会 138

[08] 休谟与启蒙运动——《大卫·休谟传》读书研讨会 143

[09] 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十里八村》研读会 146

[10] 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研读会 151

（六）静园雅集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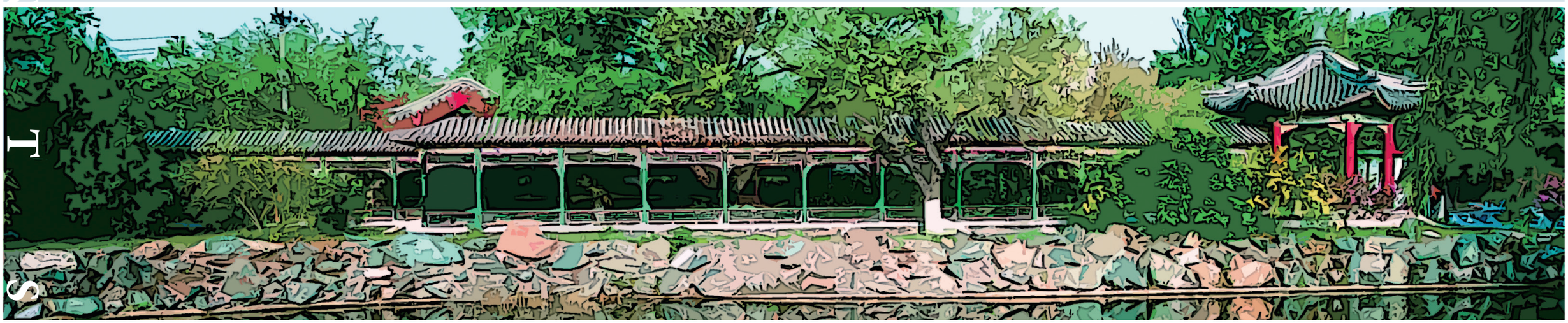
[19] 刘铮：现代北大学者的西文藏书 157

[20] 宋雨喆：虚空擒事业——音乐的制造与思考 160

164 静园学术
- 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 166
- 东亚历史地图编纂的传统与特点 172

176 文研回望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第四期邀访学者欢迎会 178
- “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大文研院举办校庆纪念展 179
-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北大文研院举办未名学者校庆讲坛 179

180 文研纪事



百廿校庆专题

【编者按】

春夏之交，草木葱茏，绿意勃发。

文研院一直以“涵育学术”为使命。所谓涵育，便是要将学问的根扎在深厚的学术史土壤中，并将先贤们的品行风范与精神信念化作滋养后学的财富传承下去。学问是一代代的积累传递，是学脉或隐或现的接续。

值此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文研院举办校庆讲坛、校庆纪念展及相关学术活动。本期通讯特辟校庆专题版块，深度报道系列活动之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一）“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未名学者校庆讲坛

1、学者讲述

在传承中守正，在守正中创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昝涛）

每个人，与北大结缘，无论早晚，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了某个传承的脉络中。在人文社科领域，这尤其突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沐浴在某种学缘所给予的氛围、气场和给养之中，细想起来，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儿。或早或晚，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并进入到一个自觉的状态，也就是从“身在福中不知福”到“知福”。蔡元培先生在 1917 年就任北大校长发表演说时就讲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话可以做文言文，也可以当白话文：文言文说的是大学，白话文讲的是大学者。但无论怎么解释，都跟学问息息相关。

在北大读书期间，作为世界史专业的我听到最多却很遗憾、从未谋面的，就是罗荣渠先生。我进入大学的前一年（1996）他去世了，去年是他的九十冥诞。因而我对罗先生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读书和师长们的讲述。我的导师是董正华老师。大三选课时结识董老师，大四时毕业论文是董老师指导的，他给我一些可供选择的题目，现在我只记得自己选择的那个：土耳其的军人政变。选择这个题目，可能跟青春时代男生的某种军人梦有关系（当然政变似乎不是军人应有的常态）。

昝涛副教授

我的导师或导师的导师并不专门从事土耳其或中东研究，但于我个人来说，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还是有其必然性的。在这样一个“偶然”中，我与土耳其研究结缘。保研后，继续师从董老师，对土耳其倒是越发喜欢了。记得有一天，董老师拿出一本油印的老旧本子，看起来保留得很珍惜的样子。里面的文字密密麻麻，每一页都有红笔修改过的痕迹——那是董老师关于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的硕士论文。隽永的红字，是罗荣渠先生的。董老师曾多次说，罗先生希望他研究土耳其，是因为倍感奥斯曼土耳其和近代中国命运的相似性。罗先生的这个情结，我在后来探索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过程中，才算明白。原来，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曾抱此种看法。大概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罗先生对此仍念兹在兹，但董老师说，他因为年龄等各种原因改了研究方向。我跟随董老师研究土耳其，尽管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但这应该是主脉。因此我说，研究土耳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更不是空穴来风。随着我对学术史的了解越深，这个师承、甚至是更大历史背景下的思想传承线索也越来越清晰了。

如果说，大师是指路的明灯，而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在日常给我们上课、指导论文的教授们，以及那些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图书馆、资料室或实验室的老师们。他们当中，既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此刻，我会想起自己的土耳其老师涂逸姗（Isenbike Togan）教授。如果不是她在十多年前短暂访问北大期间，给我教授了初步的土耳其语，且耳提面命地教我读书，后来的事情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尽管那加起来只有二十几个小时，但却从此为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我一直视涂逸姗教授是自己学术生命中的贵人，当时，她曾问我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我把语言学习的问题告诉了她，她只用英语说了一句：“Why not start now?”然后，我就每天去她在勺园的寓所学习一个小时。后来，第一次到土耳其的时候，人们总说我的土语稍微有那么点儿“娘娘腔”。其实，涂老师不只教我现代土耳其语，还给我讲述了跟词源、历史有关的基本知识，还有就是断断续续跟她学习到的做学问的方法和生活的态度。每次她来北大都是同中古史中心交流多，但陪她最多的学生却是我。

包括我在土耳其期间，也曾短暂地做过她的助手。其间耳濡目染学到的东西，终生受用，如果说罗先生留给我们的是研究近现代世界的遗产，涂逸姗教授则真正为我的学术视野中注入了一个“内亚史”的视角。从此，我的研究不只是国别研究，更是区域研究，而我将这个与现在的全球史视野结合了起来。至今，我还记得她给我讲述她与中亚现代史密切相关的家世、她在美国与贡德·弗兰克等人一起随傅礼初学习的经历，以及她经常从自己的视角点评费正清，并指出这可能对我研究土耳其近代史有什么启示……更不用说她懂七八种语言、还每天想方设法练习中文。以上种种给了我不断学习的动力。总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导师，他们在青年学者的身上可能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才是传承的应有之义。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大学的学者与世界的关系。当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主题，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尽管这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我研究土耳其、中东的历史和文明，当然也会密切地关注从来都是热点的中东现实。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中东研究的青年学者是“9·11一代”。记得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刚开学就发生了“9·11事件”，它在我们这些关心世界的学生们心底注入了某种持续的困惑，也是推动我们探究学问的动力。于我个人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大事件可能还要加上2008年奥运会。那是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空前地、主动地、全方位地在一个时间点上、在各个层面上与世界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刻，因而，很多问题和困惑也在那时注入了我们的视野，形成这一代青年学者的潜在或显在的问题域或问题意识。那不仅仅是时代背景那么简单，而是至今都伴随、拷问甚至塑造着我们的思考。比如，奥运火炬的传递，也“照亮”了中土关系领域中的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胡适先生在1930年说过一句话：“（北大）所以能占据领导地位者，就是因为不专研究过去历史上的死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注重活的问题，当代社会、人生、政治……所未解决的问题，来研究他，来解决他！”

中国是过去几十年世界上发生重大变化最多可能也是最深刻的国家，几年前，北京市的文科高考状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说她想到北大学习和研究土耳其。对于从事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安慰呢。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在这个时候，我不知为何会想起马克斯·韦伯那句名言：“催人苍老的并不是岁月，一个人只要时时具有天赋我辈的伟大激情，他就能永葆青春。”

今晚的主题是“传承”，似乎听起来有些厚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沉重。其实，“传承”这个关键词的意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尽管我们现在是在北大讲传承，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北大自己的事儿。它更深的意思应该是汇聚全球智慧，并在这里不断地传承下去。是的，在传承中守正，在守正中创新。传承是我们的使命，但青年学者更是代表着希望的群体，毕竟，北大是常为新的。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 陈侃理）

陈侃理研究员

2004年，我来到北大历史学系念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201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进了学术研究的门。现在看来是既成事实，但却是初入学时想象不到的。回想刚来北大的时候，我算是“志于学”，但学术研究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可以投入一辈子来做呢？20岁出头的时候，面前还有很多岔路口，人生只有一次，到底选择哪条路走？这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要想清楚这些问题，光靠书本不行，重要的是靠人、靠老师。很幸运，我在北大遇到了好老师，他们让我看到了学术生命的厚度和温度，最终走上了这条路。

记得研一刚入学不久，我从师兄、师姐那儿接到通知，要去给周一良先生扫墓。周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那是他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我听说组织者是田余庆先生，非常激动。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田先生，但他却是吸引我走近古代史研究的关键人物。大二时偶然在图书馆读到田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下子就被迷住了。田先生能够在看似平淡的历史记载里，读出隐藏的含义和线索，逻辑绵密，文笔凝练。有人说他的著作像推理小说，我觉得比推理小说还引人入胜。读完之后，我又找来他的《秦汉魏晋史探微》细读，然后就“入坑”了。现在，我给本科生开课，也将《东晋门阀政治》指定为

必读书。前几天，有一位同学表示读《东晋门阀政治》让他欲罢不能，并准备争取保研念历史系。我听了很得意。

我到北大读书时，田余庆先生已经退休多年。但我熟悉的老师大多是田先生的学生，从他们那儿，也经常能听到田先生的论学警句。比如，他推崇“读书得间”。一般人读书看字面意思，但好的研究者要能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他说，写文章要懂得“割爱”。写学术论文就像艺术创作，无关紧要的枝节、缺少独到见解的内容、思考不成熟的文字，即使写出来也要下决心割舍掉。先生还说，好的材料和题目就好比一包上好的茶叶，与其冲得满满一壶寡淡无味，不如下足功夫沏出一杯“浓茶”来。听到这些话，再去读他的书，更能感觉他以何等呕心沥血的精神在学术上追求卓越的境界。

他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表明，自己学术写作的态度是“宁恨毋悔”，也就是宁可没能写出来而感到遗憾，也不愿意因为写出来不像样而后悔。当时，我把这话当作治学名言，警策自己在学术上要严谨慎重，爱惜“羽毛”。后来，读到田先生晚年的自述：“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了解田先生的经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更能认识到这些话的分量。

回头再说为周一良先生扫墓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田先生本尊。当时，我们几个研究生当然很期待聆听田先生讲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但田先生的话题却是总是围绕周一良先生和中古史中心的历史。他说，周先生在建国以前就是有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50 年代，为了配合学科建设，服从组织安排，改行研究日本史，到了 80 年代才又回到自己钟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来。而据周先生回忆，他和田先生以及制度史专家祝总斌先生，三人的年纪依次相差 10 岁左右，结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松散而亲密的联盟”。田先生强调，当时找到周先生，多少有拜师的味道，希望他能领着大家做研究。他们在写文章之后会互相传看、坦诚交换意见，培养研究生也不分彼此。听了这番话，我才明白，我的几位老师关系融洽，而我们几个研究生虽分属不同的指导老师却亲密无间，定是当年的传统。田先生希望我们把这个传统继承、延续下去。

从那次开始，我陆续见过田先生不过十次。我发现，田先生深居简出，却愿意跟年轻人接触。2007 年开始，中古史中心发起了一个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参加者是海内外的博士生和 30 岁上下的年轻人。只要会议在北京举办，田先生都会拄着拐杖到场发言，鼓励年轻人超越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 2014 年 5 月的一次聚会上。田先生重病后出院不久。田先生坐到我们中间，他说：“历史学的希望在年轻一代，年轻人要敢于超越，实现超越。”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积累非常深厚。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多往前走一小步是不容易的事情。但田先生鼓励大家超越是有依据的。他的学生在各自的领域里尝试超越，并且非常成功。田先生指出，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阎步克老师随之推演出“变态—回归”模式以解释帝制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田先生关于汉代政治史两篇论文，启发陈苏镇老师开创两汉政治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田先生讨论北魏早期历史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子贵母死”现象使得罗新老师找到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内亚视角。至于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也渐渐认识到，田先生是在托付给我们责任。只有尝试超越，才能真正传承老师的学问和精神。田先生去世三年多了，每当我想起他的话，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

事实上，不只是田先生，北大有一大批这样值得我们怀念的老先生。比如中国古代史领域已故的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以及仍健在的祝总斌先生、张广达先生等等。他们在艰难岁月中仍然坚持治学，保存学问的“火种”。改革开放后，他们全心投入到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薪火相传。现在，他们的学生早已成长为学界大牛，学生的学生开始成为学术中坚，而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也已崭露头角。

时代有波澜，人物有代谢，但学问和学术生命的传承是北大永恒不绝的力量。

问学之路与归家的人——我的北大学缘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王洪喆）

今天站在这里，虽然身份已经是一名教师了，但我的自我认同却还是个学生。在北大的课堂上，我尊敬的老师戴锦华反复说过一句话，她的学术生涯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学术跟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当然，也许失败之处也在于此。2007 年来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研究生，我从一名工科生转为文科生，在吴靖老师门下学习媒介与文化研究。今年是北大开展新闻传播学教育 100 周年。自 1918 年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新闻传播学教育虽然几经波折，却也形成兼容并包的独特风格。当年，在所有高校的考研章程里，只有北京大学不指定参考书和考

王洪喆助理教授

察范围，我就觉得这里最适合做我心目中自由而有用的学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到了 10 月份招聘季，很多 500 强企业和央企都关闭了校招。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无处投递简历，夜里在水房偷偷地哭。就业恐慌只持续了几个月就平息了，但对我们这些成长在近 30 年经济增长周期中的一代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不过，这种体验对我来说似曾相识，工业人口的大规模失业潮在 90 年代的东北就已经发生过。

戴老师的那句话，我一开始不太懂。就在那个毕业季，书本上的知识、成长的经验跟当下的处境产生了共振，我开始体认戴老师反复说过的话，也开始思考什么是跟自己生命经验相关的问题意识。在跟导师和同学交流后，关于什么是有用的学问这类问题，浅薄如我还是没有想清楚，也就索性继续读下去了。

2009 年，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到老家钢城——东北的一座工业城市，开展毕业论文的田野调查。我发现，昔日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被工会出租、转卖、改建为洗浴中心和夜总会，老工人被排除出原有的社会经济位置和城市空间；但另一方面，通过改造废弃工业设施的用途、积极应用新兴的信息传播科技，工人们在线上和线下自发的文体活动中延续着昔日城市生活的集体意识、组织方式和团结感。钢城的各类广场舞、歌咏、远足、骑行和登山组织，其 QQ 群的规模经常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的活动甚至超越本市和本省，在同类的兴趣团体中形成不可见的、跨地域的连接和社会支持网络。这些历史与现实，是与我经验最相关的、活着的“媒介研究”。于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劳动者与文化和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成了我最初的问题意识。我带着这样一份研究计划离开北大，赴香港中文大学开始了博士学习。

博士导师邱林川是 1997 回归后第一批从北京大学赴港读书的大陆学生，当年，他求学于北大国际传播教研室（即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部分前身）。后来，他又远赴美国求学，师从网络社会理论开创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专注于考察南中国劳动阶层的网络社会。我到香港求学是在 2010 年，正值深圳的苹果产品代工厂富士康发生工人 13 连跳自杀事件，震惊全球。于是，我加入了三地学生学者组成的“全球化、移民劳工和信息传播技术”课题组，每周末往返于香港沙田大学站和深圳关外的观澜工业区，以深入了解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新媒体使用状况。

珠三角的经验与东北很不同，在我的心中，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两极：一边是难以想象的高速增长，一边是历时漫长的枯竭和衰败。作为世界工厂，在产业内迁之前，珠三角的流水线是全球电子消费品的主要产地。生产过程被置于严酷的劳动控制之下，仅深圳一地每年因工伤致残的手指就有上万根。数量巨大的新生代青年工人们聚居在连片的工业区中，形成过去 20 年间全球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业中心。但工人个体之间却处于原子化的疏离状态，仅靠廉价手机和网吧等信息技术打发掉本就不多的闲暇时间。同时，他们对更有意义的文化生活又有着热切的需求，却苦于超长的劳动时间和工业区稀缺的精神资源。我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工业人口的生成过程与我们的父辈、以东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什么不同？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后果又会是什么？于是，这两种区域经验之间既像是某种历史逻辑的轮回，又有着明确的不可通约之处。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下，我不得不把自己从鲜活的田野中抽离出来，转而去填补这些体验背后的历史空洞。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劳动者和信息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信息传播科技的发明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媒介技术史中是否扮演过与今日不同的角色？历史是否曾经开启过其他的可能性？幸亏，香港中文大学有着同样宽松的学术环境，让这些离经叛道的“传播学题目”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初期的研究并不顺利。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并未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再加上依然模糊的研究问题，我掉进了海量有关中国电子和信息工业史的材料中不得其法，找不到主攻方向。这个时候，一则来自北大的故事提示了我。1975 年 5 月，尚未恢复工作的北大计算机科学家王选起草了一份研发汉字计算机激光排版系统的书面报告（即“七四八工程”前身），准备提交给北大革委会审议。报告在北大印刷厂列印时，印刷工人在读到上面的内容后非常兴奋，认为这将改变排字工人的繁重劳动过程。于是，工人组织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北大革委会。王选得知后受到极大鼓舞，“想不到一个病号只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就受到了工人们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有意义的”。“七四八工程”是信息工业领域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政治认同而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统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公共性”(commons)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当这种劳动共同体的生产关系退化，自动化技术和印刷工人之间就成了绝对对立的关系——激光排版意味着排字工人的去技能化和失业。

这条线索提示的方向集中在由信息传播技术所中介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的变迁，我初步发现，在 1955–1984 年连续 40 年发展的过程中，电子计算机与劳动者的关系经历了三次变迁，回应了不同时期的国家工业目标和社会发展愿景，提供了理解社会主义劳动者角色变迁的另类角度。这其中蕴含多层次的历史遗产，还有待更细致的挖掘和继承。

2014 年博士毕业后，我幸运地回到北大开始教课。站在讲台上，我还会时不时提醒自己别忘了 10 年前金融危机的经历。面对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面对如此高速变动的信息传播科技，我还在思考戴老师的那句话，而这也成为我在课程中试图传递给学生们的命题：与自己生命历程最直接相连的问题是什么？个人的命题如何跟这个国家的历史相联系？如何把个人的困境跟我们的父辈、同龄人和更广泛的人群的命运相联系？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也还是个入门学生，而这将是个伴随终生的学问。

此刻，站在这里，我可以诚惶诚恐地说：这就是我的北大学缘，但更像是一条归家的路。

“受业师”和“问学师”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陆胤）

陆胤副教授

今天的主题是“传承”。在大学里，“传承”主要是“师承”。中国古人讲师承，有“受业师”和“问学师”的分别。

“受业师”就是专门学问的导师、恩师，“不可易之师”，也就是一生中不可替代的那位师长。“受业师”决定了你在专业框架和学术谱系上的位置。人在学术界，总会被问到“你是谁某的学生”。从师学道，鱼游千里，犹如小鱼从大鱼，又如老树发新枝。天地君亲师，“师弟子”是五伦外的第六伦，但在现代社会，也要接受学术公义和学者人格的考验。

我的“受业师”是中文系的夏晓虹教授，她属于传奇的七七级北大学生，是一位亲切温和的女老师。夏老师的风格有如黄山谷评杜诗——“平淡而山高水深”。正是这样一种淡然吸引了我。第一次见老师，师生二人，无多闲话，老师送给我两本书，一部是刚出的学术专著，一部是她的老师季镇淮先生的纪念集。季先生是西南联大的老学生，师从过朱自清、闻一多，治古代文学，又治近代文。当年朱自清先生开一门课，只一人选修，一人旁听，旁听者即季先生。战争时期，唯二的学生一旦同时缺席，朱先生只好默默回家洗衣服。这些轶事经老师淡淡道来，在我则渐渐看到北大的文脉：从晚清到五四，从西南联大的流离播迁，直到七七、七八级我的老师辈。一线之传，微弱而顽强。拿到这两本书，确实有种触电的感觉，仿佛自己真和历史接起来了。

当然，学问的传承又不是封闭的，在五四策源地的北大，师承更应兼容并包，不是过去那种开宗立派、出主入奴的“师法”“灯传”，也不限于现代以来的学科划分。这就涉及古人所说的第二类师承——“问学师”。君子博文约礼，转益多师，“问学师”多多益善，有时候也会为你开出一个崭新的认知世界，同样值得一生的回味与感念。

像我这个年龄前后的中文系老学生，在大学记忆当中，都有一位历史系老师。那就是前些年不幸早逝的刘浦江教授。大概从 1994 到 2002 年，他教学中文系大一的必修课“中国古代史”。他好像永远都穿着这么一件蓝色西装，一副朴素的模样。许多系友的回忆都提到，刘老师开学第一课那句“你们没文化”的当头棒喝，打掉了许多新生的自负。短短一学期的通史课，他教给我们一种打开北大、打开学术的正确方式。有一天上课去晚了，忽闻刘老师唤我姓名，心中一紧。这才刚过了半期考试，我在论述题里放肆地引了几条奇怪的材料，发了些与通行教科书不一样的议论，莫非要因此挂科？抬起头来，谁想刘老师说的是你答得不错，有材料也有判断，甚至因此建议我改行学历史。多年以后，有同学嘲笑我对这么一句小表扬还“念念不忘”。但你要知道，刚进大学的我们是那么稚嫩，什么都觉得要仰慕，不懂得批评与反省，对自己更没什么信心。就是这样一句话成就了我想做学问的信念。而到今天，当我自己也走上了三尺讲台，刘老师对教学的全身心投入，对学生的毫不吝惜的勉励，更成为我自己追摹的榜样。

我和刘浦江老师只有这么一次当面交流，也并没有转去历史系。但对史学和跨界研究的兴趣，却贯穿了我的研究生涯。后来在中文系受业于夏晓虹老师，她在文学研究界，也以文史沟通著称。毕业以后，我又去哲学系做了博士后。我发表的论文不多，却有近一半发表在历史、社科方面的刊物。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晚清民初，处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那是一个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出发眺望遥远西方的时代。研究这样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更需要对历史、思想、人物的细腻把握。我关注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格。这两方面的开拓，都得益于自己多年来混迹于文、史、哲各系的经历。

我想说的第三个缘分，也是一个“问学师”，那便是北大的图书馆。我们这几级入学的时候，正植 1998 年新图书馆落成不久。图书馆成了我的天堂，日常上课之外便在图书馆度过，甚至谈恋爱都以图书馆为场合。我最爱新馆一楼的工具书阅览室，在那里，我不是像人们通常想像地那样查阅工具书——这种查阅功能早就被数据库替代了——我喜欢的是像读常见书一样翻看工具书和大套丛书。我曾经标榜自己是“工具书阅览室的游荡者”，更期许能做一个“数据库时代的抒情学者”。到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我更借重北大图书馆丰厚的古籍、书札和旧期刊收藏。旧期刊部的张宝生老师是 1970 年代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却长年在书库中默默工

作，矮小的身躯套着一件不太合身的运动服，宛若一名老工人。但他却是一位大隐隐于图书馆的“扫地僧”。我们到前台调刊，常看到这位老师伏案看书作笔记。通常，你在前台报出公元某年或某干支，他便能迅速定位到同治、光绪、宣统某年文献；他对许多报刊的栏目、构成、沿革了如指掌，总能带来电子目录语焉不详的惊喜。我们专业方向的老博士们，在完成论文或出书之后，都会记得寄他一本。

如果可以将北大人格化的话，她本身就是一位硕大丰富的“问学师”。一百二十年风云，学问与人生、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答案，多在其中。而且，北大人文社科诸学科并进的优势，更使这里成为“转益多师”的绝佳场合。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曾有“文人共和国”的构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更把“学校”看成天下治乱的枢纽。在我看来，专门、师承的多样性固然值得保护，但北大人似乎更应叩问在专门专业、师承师门之上，有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北大性”的东西。许多北大文科的师长、前辈，许多从事行政服务工作的默默无闻的老师，他们都不仅仅是中文人、历史人、哲学人、图书馆人……在他们的身上更有着超乎学科分工或工作职能之上的“北大性”。这值得我们去感恩，去反省，去发扬。

孙飞宇副教授

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孙飞宇）

我自 1998 年起与北大结缘，迄今已有 20 年了。回想起来，这 20 年过的平凡普通，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唯一值得欣慰的是，20 年来始终能够坚守自己做学问的理想和生活，这当然是最可珍贵的地方。不过我想，这样的生活和理想并不完全是自己选择和坚持的结果，而是受惠于北大才得以成全的缘分。这一缘分主要与两位老师有关。

第一位是社会学系的杨善华老师。最早认识杨老师是在大一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程上。这是我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启蒙课程。从杨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学问的样子是什么。2002 年，我继续在本系读研，拜杨老师为师学习社会理论。我当时很忧虑，觉得自己的资质不够好，见识不够广，在学问上的启蒙也比较晚，所以对于从事理论研究没有什么信心。杨老师对我说，“学问就好像汪洋大海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没有谁敢说自己能够穷尽学问，所以关键在于敬畏学术，保持一个谦逊和开放的态度。”在得知了我的兴趣点是现象学社会学之后，杨老师欣然说，“我对于现象学是不懂的，但是没关系，我认识懂的人，把你介绍给他，你可以跟他去读书。”随即，我被引荐给哲学系的张祥龙老师，并由此开始接触现象学。杨老师非常谦虚，他并非不懂，他同时也在阅读和研究现象学社会学，并且在随后几年里，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年之后我才明白，这种毫无门户之见、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为学生考虑的胸怀，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随后几年，我同时在哲学系和社会学系修课。除了张老师的课，我还选了王玮老师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认识王老师是我在北大的第二个缘分。熟悉北大外哲所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老师在其中的位置和故事。在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范。他创办的“风入松书店”一度成为北京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栖居之地。他的课程基于海德格尔的文本，以精读的方式进行，往往一个学期下来，才读了十几页。正是在这样的课程上，我的思考能力和文本阅读能力都受到了基本的训练。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书本之外，王老师会请我们吃饭，向我们讲述老一代学人如熊伟先生、洪谦先生的治学经验和处事风范。在正式的课程之外，他还为我们开设读书会。读书会一般都设在晚上，从 6 点开始，一直读到 12 点之后。迄今我还清晰记得，2004 年的冬天，有一次，我们的读书会到凌晨 3 点才结束，出门时才发现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大雪纷飞中，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外哲所骑往蓝旗营。这一场景至今依然非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

眼前。虽然我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王老师没有任何的门户之见，对于学问也同样抱持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视为我私淑弟子。他带我到家里，指导我读书，下厨做饭，教我做翻译，带着我逐字逐句校对我在硕士论文中关于海德格尔的部分。在他那里，我感受到了思想的魅力。王老师在 2005 年过世。我永远怀念他。一直到最后，他都在告诉我，一定不要放弃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对中国社会的关注，这是学问的根本。

而在这个方面的训练，主要来自于杨老师。很难表达这些年来他对我们每一位学生的帮助、关心和鼓励。虽然我从事理论的学习，但是杨老师要求我必须参加社会调研。社会调研是北大社会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老一代学人留给北大社会学系的宝贵遗产。两位先生对于北大社会学系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所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的那种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实求知”的严谨学风和“志在富民”的朴素理想，几乎是北大社会学系数代学人生生不息的信念。作为雷先生的亲传弟子，杨老师更是毕生都在兢兢业业地践行着这一传统。几十年来，杨老师几乎遍及了全国各地，带着我们去过许多地方，走了许多路，见识了许多人。

在调研中，杨老师每天晚上都会带我们讨论当天的访谈内容，逐个案例的分析、讨论，教我们如何访谈、如何理解个案、如何提出研究问题。几乎每一天，讨论会都要持续到凌晨。这其中，许多地方更是多次回访和持续性调研。在河北的西水碾村，杨老师坚持了二十年的跟踪调研和访谈，和村庄中几代人都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西水碾村的典型人物、故事和社会结构，都已经成为了我们师门里耳熟能详的共同知识。正是在杨老师这里，我们逐渐体会到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独特魅力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如何理解他人，如何理解社会，如何从事学问研究。这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知行合一的学问，也是一门不仅需要在书斋里读书，还要迈开脚步去走路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魅力不仅在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还在于主动担当社会责任。

如今，杨老师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却仍然勤奋地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他几乎每个月都至少安排一次调研计划。调研地点从河北到广西，再从浙江到乌鲁木齐。这样的工作强度，即便是对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都太大了。然而，他乐此不疲，真正做到了费老所说的“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

杨老师还是一个视学生为己出的好老师。他会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深处援助之手而不要求任何回报。2005 年春天，我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同时也拿到了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录取书。杨老师特别希望我能够读他的博士，我又觉得约克大学的“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特别适合我的兴趣。一时之间，无法取舍，左右为难。直到系里的研究生教务催我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我才战战兢兢地给杨老师打电话说自己拿到了约克大学的录取书。迄今为止，我都清楚得记住了杨老师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真是喜从天降啊！”

他对于自己的所有学生都是如此。在学术工作以外，他尤其重视育人的方面，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在谈话中，告诉学生各种研究的经验心得、历史知识、社会经验、人生感悟等等。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今天，我自己的研究生们都会积极主动地跟着杨老师从事社会调查。杨老师也同样会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谈话。北大的学缘，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维系下去，不绝如缕。在 2015 年社会学系的毕业典礼上，我曾和学生们说，我所体味到的社会学是一种修行的学问。这样的体会，既来自于阅读，也来自于跟随杨老师所做的这些田野调研活动。

杨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育，使我不仅受到了思想史的训练，还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由此出发，对于研究中“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学术态度也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并因此而对于社会理论资源有着更为切实和朴素的开放态度。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我能够顺理成章地在约克大学成为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的最后一位博士生，跟随他研读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幸运的是，奥尼尔和王老师、杨老师有着几乎相同的对于学问、为人和教育的理解。今年，奥尼尔更是把他自己使用的弗洛伊德全集作为礼物寄给了我。在中国和西方的共同经验让我确信，学问本身是不分古今中西的。

20 年后的今天，我有幸接替杨老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并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下从事关于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与此同时，又进入到田野之中，不断磨砺自己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解。

我也会带学生们读海德格尔的书，讲着从王老师那里听来的关于老北大的典故和传统，对学问抱持开放、包容、热情和敬畏的态度。在从事社会理论的同时必须要去进行社会调查，在经验研究之外，也必须坚持读书。努力听取学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希望能够和学生一起学习，共同进步。这是我的北大的学缘。北大于我而言，就像水和鱼儿的关系。未名湖是一个海洋，你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缘分，但是也很确定，它会给你所需要的各种滋养、缘分、学问上的自由和生命里的归宿感。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在北大的这些年里，我在求学方面的缘分当然不仅只与这些先生们有关。他们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这些年来，他们与我亦师亦友，在学问、做人和生活方面关心我，照顾我，使得我能够从各个方面逐渐认识到并努力克服着自己的狭隘、自私和懦弱，逐渐在为人和为学方面都成熟起来。努力做到费老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能够与北大结缘，既是我毕生的幸运，需要感恩，也是我在学问上的责任之所在。

平静的自觉：传承就是一种坚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程乐松）

关于大学精神与学术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有一个类似诠释学循环的难题：师生的个体精神和智识史一起构成了一所大学的传统和精神内涵，而每一个个体精神和智识历史的回顾又必须以大学精神的整体图景为出发点。23 年前的 9 月初，在柿子林里等着开学典礼的我绝想不到今天居然可以作为北大的教员为这一诠释学循环做出贡献——以个人学术发展为主题尝试连接个体精神史与北大的人文传统。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窃喜的是，北大真是一个对青春十分包容的地方，看着 95 后的同学们学拉丁文、希腊文、四库总目的时候，我默默安慰自己，我刚四十，可以继续假装年轻。然而，看着邓小南老师、齐东方老师、张学智老师、李中华老师的笑容和学问，我甚至敢大声的说，面对如此学识渊博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我这样啥都不懂的学生当然还是青春正年少的。

忧虑的是，胡适先生在 26 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北大文科最牛的教授，张岱年先生在 27 岁的时候已经写完了《中国哲学大纲》，汤用彤先生在 33 岁的时候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哲学系主任，荣新江老师在 31 岁的时候就已经阅尽了全球的敦煌文书、33 岁时已经是中古史中心的教授了。而我 40 岁了，还……。

我此前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隋唐以前道教思想与社会史。最近三年，才逐步确立自己的未来学术进路——从两汉思想史入手做道教信仰和观念的前史，并将此作为理解中国本土信仰的视域，将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交织的历史分析作为中国本土信仰理论的土壤。

作为一个道教学者，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直困扰着我：其一，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做道教的就是研究怎么插上翅膀放飞自我，飞升仙界的；有的同事一直建议我把办公室改成丹房，说不得炼出丹来；学界的很多朋友一直称我为大仙；其二，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偏门了，我很难找到对话者。出版社的编辑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已出版的书可以在再版的时候改掉原先的字词错误。我心里知道，他想多了。我的书，虽然印量三千，但卖完至少需要三千年才能，卖完。若要重印，我们真的要依靠道术才能实现——首先要活过下一个三千年。

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研究道教？为什么要在北大研究道教？其实，在 1999 年的时候，我最想做的是《庄子》研究。老师们告诉我，中哲保研竞争激烈，我的程度适合找一个与道家类似的专业——道教。于是，我就成了学道教的学生。当然，若说北京大学的道教研究是中国现代道教研究的肇端之处，毫不为过。汤用彤先生、王明先生、任继愈先生、汤一介先生等人的学术研究都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思想史与宗教史结合的进路成为北大道教研究的重要特色。这是我在读道教很久以后才慢慢知道的学术脉络。

第一次在道藏阅读的时候和元始天尊“见面”，我的内心是完全崩溃的。我是一个理性的人，那种飞来飞去、金玉满堂的场景真的不适合我。近二十年以来，道教研究让我时刻感受到无知的绝望，更体会到道教研究的重要性。做道教研究，不得不读天书一样的道藏。道藏是中国文化中具有隐喻性的观念与知识底色的书类，要读懂它，就不得不绝无遗漏地涉猎中国文史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从古文字到诗词，从制度史到历史地理，再从古文献到艺术史。

我至今都记得 2004 年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的时候，他知道我读道教后问的那些问题。在听了我的讲述后，他也很迷惑：这么多东西都不懂，我是怎么做道教研究的？说实话，我越来越意识到饶公的洞见和睿智，道教研究就是一个持续发现陌生领域重要性的学术探险，自知无知，居然是学术进步的标志之一——这就是道教的魅力所在。

两千年以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须臾不离且作为礼教一部分的道教，看似满纸荒唐言实则充满了隐喻的知识和丰富观念，其在中国文化研究中被忽视的程度是令人惊讶的。作为中国人文学术的殿堂，北大学者对道教的研究目标是：沉潜其中、解读隐喻性文字，让怪力乱神背后的观念、礼教与生活世界的伦理行为以可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道教研究不是在为道教辩护，而是在为自己为何是中国人展开论证。

在一个喧闹的、计件工作的学术时代，以探究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为志业是十分孤独的。所有人眼中可有可无的研究、不断被边缘化的人文领域，即便在北大也变得越来越不受关注——毕竟我们无法带来科技进步奖

程乐松教授

和数量大到炫目的研究基金。因此，我十分珍惜今天这样的机会——在北大的中心舞台上展示一个最边缘的故事。

在中心与边缘、孤独与热闹之间，我看到了北大给我的滋养：那是一种自觉而又活泼的平静。如果连北大都没有人在最边缘处乐此不疲地坚持（哪怕像阿Q一样自我安慰），那么，人文中国就会陷入彻底的黑暗。当然，在这个无数人被教导“地球没有谁都照转”的时代，这似乎是缺乏自知之明的，甚至是骄傲的。而在我看来，这是自觉。

如果北大的学者不能与不断发现自己无知的现实达成内心的和解，那么对中国文化心灵的探究如何保持活泼的精神？人文研究的路，是知识的远征，学问的伊利亚特，也是思考的回乡，心灵的奥德赛。踽踽独行，其道不孤，持续塑造一种可能是盲目的、但支撑着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念，是北大的恩赐。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从哪位学术大师的心灵和学问中传递下来，但我知道它在那里，照耀着我以及我们。

如果说，传承北大的人文精神与学术传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代一代的学者的责任，那么我愿意把这种责任落实成为这样一种学术生活，在平静的自觉中坚守在最边缘处。从释然到适然，我一直依赖这被称为北大及其人文传统的“虚幻”的坚实，更依赖着每一个代际都能互黑、对话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敢和所有北大学术的先行者和笃行者们统称“我们”。

窗外一塔湖图，门里两河春秋
——一场始于北大的远行与回归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 贾妍）

我是贾妍，现在在艺术学院做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我的专业方向稍有点儿偏门，研究的是古代两河流域，主要是亚述时期的图像遗存研究。今天能有这个机会与诸位在座的师友分享自己的“北大学缘”，我既荣幸又忐忑。自己学养尚浅，业无所成，实在不足为道。说服自己有勇气站在这里的原因，一是现在的人生阶段和在校园中的位置，确实是在“老师”和“学生”这两个状态、心态的中间点上，正好可以作为“传承”中的一个链条谈谈自己的“缘”之所在。另外，我也存了一点儿私心，想给自己的小学科找一个在“核心舞台”上宣传的机会。这个校园里有过也有着太多令人仰止的大师，如果说他们是山巅的旗帜，我最多可算作山脚下一个

贾妍助理教授

刚刚启程的攀登者——还是龟速前进的那种。不过，我并不介意给自己身上也插面旗，并以自身经历告诉更年轻的朋友们：前方不远处，两河转角，有人正在探路，或可同行否？

“你怎么会想要学古代近东艺术史的？”这个问题，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常被老师问，如今做老师又常被学生问。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对我来说，最终走到这个方向像是一场毫无预谋的远行。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开篇所说，仿佛是来自“深渊”的诱惑，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没能从这个“坑”里爬出来。唯一确定的是，北大决计是这个“深渊”的入口。

我是九八年考进北京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历史学系。虽然专业是自己选的，但一开始很迷茫，全然没有方向感。大三那年，我选修颜海英老师的《古代东方文明》，后又选修《埃及象形文字》，从此就收拾行囊奔去远古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那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并没有更长远的学术志向，只觉得在小鸟小人拼凑出来的奇异文字中，几千年前的事仿佛触手可及，实在神奇！而且在诸多读不懂想不通之后发现，居然还可以念念《亡灵书》，太治愈了！情绪上的感召还来自那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的颜“女神”。她身上有一种完全放松的、极具感染力的亲和气场。在她的课上，我觉得与古埃及人“相处”是一种真实而轻巧的愉悦，就像末日审判里那杆压得住人心的羽毛——毕竟，这是一个用超过九十个象形文字词汇来表述“快乐”的民族呵！

后来保研，我顺理成章地跟着颜“女神”继续攻读埃及学，并有幸在研究生二年级

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到开罗大学考古学系交换一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求学方向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一年，我第一次体会到看实物、“泡”博物馆、近距离考察遗址的重要性。同时，我还领悟到，对埃及这样的古文明来说，视觉材料可以比文字记录更加丰富。这些视觉材料怎么读？是不是像文字一样有一定的“语法”和规律可循？那些谜一样的图像究竟有什么涵义？在每一个博物馆中，每一座神庙里，我不知道的都太多了，而越不知道就越想去了解。其实，本科时我辅修了艺术学院（当时还是艺术系）的双学位，也知道有艺术史这个专门的领域。不过，在埃及的那一年，才真正产生了在古物和图像研究这个方向上继续深造的想法。

如果说最初是北大和颜老师给我打开了一扇朝向远古的门，后来，引导我一步步进入古代两河世界并在此间找到归宿和方向的，是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学系的艾琳·温特(Irene Winter)教授，也就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温特老师是美国治古代近东艺术的翘楚，年长誉重，年轻时以思维敏锐过人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刚去美国时，同系治中国艺术史的汪悦进教授曾专门对我讲：“中国人学两河艺术史的少，也不容易，有机会和艾琳学是你的运气，要好好努力！”其实我一直也觉得自己挺有运气的，从北大到哈佛，一路都遇到喜欢的专业、喜欢的老师，不承认幸运就有点儿矫情了！不过，当时对汪老师说的“不容易”是没有实际的认知的，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根据RP守恒定律，我很快“被虐”了，而且特别狠！我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就“古代”两个字能搭上边儿，而历史和艺术史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学科。我要在第一年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去近东系“死磕”阿卡德钉子文，同时还要在方法论课上与其他艺术史系的同学假装谈笑风生地讨论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专业课跌跌撞撞的同时，还要去兼顾二外考核、课程作业。现在，网上有很多在国外读文科如何生不如死的帖子，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要到更老一些才能真的在细节上认真回想那段漫长而不堪回首的日子。无休止的熬夜什么的倒还好，最难过的是仿佛永远都无法获得的、专业上的安全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惶惶然不知所以——说是掉进了“深渊”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极感恩温特老师在我最脆弱、最自疑的几年所给予的耐心和信任，使我在浮不出水的窒息感变为人生新常态之后慢慢摸到了岸。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亚述时期的铜门浮雕研究。毕业典礼那天，导师送给我的礼物特别有心——《沙曼尼瑟铜门浮雕》1915年原版！这是关于我研究课题在学术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到我毕业那年刚好出版100年。在书的扉页上，她写着：致贾妍，2015年5月28日，你的“开门”，我的“关门”！老师早在2009年就荣休了，我是她从教四十余年最后一位学生。她从汪悦进教授那里得知中文里有“关门弟子”的说法，所以在赠言里以此为喻来表达对我的期待和祝福！其实到现在我看到这几句话时，眼眶还会湿润。前路漫漫，方向未明，走着走着总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有能力从这扇门中走出去，又或者可以走多远。唯一能做到不辜负的大概就是脚步不停罢了。

十八九岁刚进北大的时候，在钱理群先生的《鲁迅研究》课上，我听到他用慢悠悠而又饱含深情地念出鲁迅的文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有关”出自何处，又去向何方。后来在象形文字的课堂上，我第一次觉得那个遥远时空里的奇异族群正以某种方式向我传达他们的信息，从而让我成为与他们“有关”的人。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我以老师的身份重返母校，最开心的是能够把古代两河艺术史作为一门新课添加到北大的课表上，并在课堂上与和我当初一样年轻而好奇的学生们分享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与文明，其间颇多惊喜。去年，有个大二的小姑娘听了两河艺术史后特别感兴趣，从光华管理学院降转到艺术学院重读大一，现在已经开始跟随拱玉书教授学苏美尔语了！我不知道这姑娘的爸妈会不会怪我，不过，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冷门文化研究者，我实在忍不住内里窃喜！亚述学这个领域太冷清，太需要后继有人了！近东的局势、连年的战火让这个本就以废墟形式存在的文明更加破碎零落；考古发掘的停滞更让这个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古物遗存基础上的学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萎缩。

感谢母校，在这条漫长而狭窄的道路上先是给我开了一扇远古的门，而后又给了我一面临湖的窗，使我可以藉一瓶一钵安身立命。每天沿着未名湖到位于红三楼的学院办公室工作，我都有一种充满幸福的穿越感，像是找到了自己小小世界的入口。不过我更加贪心地希望，并郑重呼吁更多的青年朋友来古文明的“遗体”上一起玩耍吧！这不是一个“重口味”的玩笑，这其实是两河神话里的一个深奥隐喻。苏美尔创世故事里人类文明的守护神恩基就是在其父神——原初“甜水”阿普苏的遗体上定居下来，才创造并拥有了诸多人类文明之“道”！那些已经死掉的文明，那些在历史的远途中失了所谓“正统”文化承袭者的文明，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存，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它们能让人摒弃“楚弓楚得”的民族偏隘，从而享受到最大限度的“不在此山中，却向此山行”的快乐！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田野和来自远古的呼唤！

我一直钟爱古埃及图像中的一个符号——蛇身回首自噬其尾的“衔尾蛇”，常常用以象征回归与重生。于我而言，西行求学的十年后得以重返母校，像是咬到了尾巴，有一种圆满的欣喜。然而，个人的格局终究是太小了！在这个校园里流动的是一种更大的力量，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在北大百廿华诞的大日子里，在建校两个甲子的更新轮回之际，我想借此祝愿所有北大人共同热爱的母校：在自我贯通中求生，求变，求发展，时间在首尾相连的一刻通向永恒，未来因此获得无限可能。而我愿以涓滴之躯投身于母校的往复传承之中，做一个能在更大格局里“衔尾”的北大人。

2、前辈分享

做学问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叶朗）

我听到很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说，北大这所大学能影响人的一辈子，只要在北大上了大学，身上就会打上北大的烙印，一辈子都抹不了。

我想，这种烙印，主要是指精神影响，精神追求，包括志趣，爱好，以致整个人生境界。

反观我自己，我想我也是如此。

在北大当学生，后来在北大工作，我感到北大有一种人文传统，有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传统和氛围的影响下，不论是老一辈的学者，还是年轻的学子，都有一种强烈的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这种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包含着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这种氛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我讲两件事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件事是我在北大的亲身经历，有的是我在北大听到别人讲的。

一件事是 1958 年，全国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北大哲学系请了北京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的一位主任来做报告。报告内容是讲他们原来的高级社遇到了种种矛盾，不能解决，只有进到人民公社才能解决这些矛盾。这个报告是论证人民公社的必然性。这位公社主任用了丰富的材料，讲得十分生动。有一位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参加这个报告会，他在报告会最后讲话说，你们看，现在的哲学家并不是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而是像这位人民公社的主任这样的农村干部，他们善于在实际生活中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是哲学家。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位领导同志讲得很对。冯友兰先生也来听报告了，他也觉得这位领导同志讲得很对，不过他补充了一句。他说，现在的哲学家当然是这些公社干部，但是像哲学史、逻辑学这些学问还是要有人搞，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搞这些学问。当然我们不能称为“哲学家”，我们可以称为“哲学工作者”。这话传出去，有人就说，你看，像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还是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在我们今天看来，冯先生这个话正好说明，他是把做学问看作是他的生命所在，不做学问，他的生命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叶朗教授

再一件事也是在五十年代，当时历史系有一位研究生（现在也是有名的学者），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右派不能毕业分配工作，所以他就留在学校里干些打杂的事，系里有下乡劳动的任务一般都派他参加。但他在这种环境中依然做他的学术研究。在乡下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就做研究。据历史系的人说，他的研究成果用很端庄的小楷写了一本又一本，都达到了可以马上送出去出版的水平。这个且不说，最特别的是每当他听说系里有关部门准备给他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在系里找个事端大吵大闹，大吵大闹是为了给人“表现不好”的印象。这样，有关部门就不好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了。经历过当时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戴右派帽子就会被人另眼看待，滋味极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摘去右派的帽子？这不奇怪吗？原来一摘去右派的帽子，他就要毕业分配工作，他就要离开北京，而他研究的资料都在北京，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互联网，一离开北京就无法继续研究了。这就是说，为了做学术研究，他宁愿戴着右派的帽子。当然，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他后来还是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分配了工作，成了一位很有成就、很有名的学者。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对于北大的一些学生，对于北大的一些学者，做学问，真正成了他的生命所在。

我讲这两件事，是想说明，在北大形成了一种人文传统，形成了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传统和氛围的影响下，北大的很多人，从大学者到年轻的学生，都把学术研究，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的核心，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我进了北大，也深受这种传统和氛围的影响。五五年进北大时，中央号召“向科学进举”，我们心中都以将来成为一名学者作为自己的目标。接着又遇上美学大讨论，使我爱上了美学。但是很快就是五七年“反右”，五八年“红专辩论”，做学问、“成名成家”或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要受到批判。但是这种政治空气依旧改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对我的影响。五八年我们北大哲学系全系师生下乡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共去了九个月，在这个期间，我心里还老是关注学术方面的动态，听到一点学术的消息（不论是哪儿来的）就兴奋。放假时我留在乡下，但是很多同学回学校度假，我就托他们买学术方面（美学方面）的书。毕业后留校工作，我也是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做研究。由于五八年因为追求“成名成家”受过批判，所以我留在系里只能做一些打杂的工作，例如编一些资料等等，在很多人心目中我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做教学和研究，但我自己的追求依旧是做学问，要研究中国

美学和中国艺术。只要有时间就读书，写文章。当时我写了不少文章（例如论叶燮的文章），虽然多数都不能发表。在当时的空气下，这是“越轨”的行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里看书（我当时是住集体宿舍），外面有人推门，走进一位我们系里的老师，他一进来看我在房里看书，脸色马上就变了，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干什么坏事，被他发现了。干什么坏事呢？就是坚持走“白专道路”。这就是当时的空气，现在的年轻同学是很难想象的。还有一次，美学教研室开会，教研室的负责人批评我热衷于“成名成家”，一直不改变，明显的证据就是写文章，他提高了声音说：“不是写一篇两篇，也不是写三篇五篇，而是写十几篇！”我自己听了也大吃一惊，居然偷偷写了十几篇文章，但是被发现了，这是多大的罪状啊！文化革命当中，在一次学习会上，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言，他指着我说：“叶朗，不知你知道不知道，你在系里是大家公认的‘修正主义苗子’，你知道吗？”郑先生的意思是你这种走白专道路的人更要好好的改造自己，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要“夹起尾巴做人”。

今天想来，“白专道路”也好，“成名成家”也好，“修正主义苗子”也好，这些指责，在我身上，其实是一种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正是有了这种学术的渴望，学术的热情，学术的追求，所以在改革开放即大家说的“学术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很快写出《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美在意象》等学术著作，并为推进北大的人文艺术的学科建设（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艺术学院）和推进整个社会的美育、艺术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做了许多工作。我想，这就是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的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研究，往往是一种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而不是一种应用性、技术性的研究，不是直接为了解决某一个现实问题的实用研究。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有可能在学科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孕育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想，乃至创建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学派。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听到北大一位学者对记者的谈话，他把自己的研究和汤用彤先生的研究进行对比。他说，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是纯学术的研究，如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研究，而没有针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没有对当前现实问题发表看法，而他自己则更关心现实问题，要对当前现实问题发表看法，言下之意他的研究高于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我当时就感到这位学者的谈话带有某种片面性。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针对现实问题发表看法，当然非常重要，应该大力提倡，但是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学科的纯学术研究、纯理论研究同样很重要。时代问题从来是理论思考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但是历史上很多大学者往往把时代的要求融入学理的思考，把时代的关注和学理的兴趣统一在一起，致力于基础理论、基本概念的思考和突破，从学理上回应时代的呼唤。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能够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孕育和产生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学派。这种新的概念、新的思想、新的学派，往往能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和命运产生当时不可察觉的但是是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这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种学术的贡献和理论的贡献同样应该提倡。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要保持纯理论的兴趣》，我在文章中说，人往往要从物质实践活动中跳出来，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存在、历史、宇宙等等进行纯理论的、形而上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是出于实用的兴趣（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出于一种纯理论的兴趣。因为这种思考和研究并不能使粮食和钢铁增产，也不能使企业增加利润，但是人类仍然不能没有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开头就说：“人类求知是出自本性。”这就是强调，人的理论的兴趣是出自人的自由本性，而不仅仅是为了现世生活的需要。当代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也说：“人类最高的幸福就在于‘纯理论’。”又说：“出于最深刻的理由，人是一种‘理论的生物’。”（《赞美理论》）文章说，有的人反对和排斥这种纯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他们认为这种纯理论的思考和研究脱离实际。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些从事这种纯学术研究的学者往往被扣上“脱离实际”的帽子。其实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不仅人类眼前的、实用的、功利的活动是实际，整个人生、人性、生命、存在、历史、宇宙也是实际。换句话说，不仅有形而下的实际，而且有形而上的实际。那些反对和排斥纯理论思考的人，他们不承认或看不到这种形而上的实际。而他们之所以不承认或看不到这种形而上的实际，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只承认人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而看不到人同时还是有灵魂的动物，是有精神需求和精神生活的动物，是一种追求超越个体生命有限存在的动物，或者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是一种理论的动物。文章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能不能保持这种纯理论的兴趣，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展这种纯理论的兴趣，乃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就会导致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素质的急剧下降，那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理应保持并发展纯理论的兴趣。

在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影响下所形成的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就包含了这种纯学术的兴趣和纯学术的追求，包含了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存在、历史、宇宙等等进行纯理论的、形而上的思考，包含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理论核心区域的思考和突破。我们在老一辈学者，如冯友兰、熊十力、费孝通、张世英等人身上看到这种追求，我们在许多年轻学者身上，同样也看到这种追求。

校魂与学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鸣）

感谢文研院邀请我参加这么棒的一次活动。几位年轻讲述者和大家分享各自的北大学缘故事。我也讲讲我的感受吧。

我觉得，燕园这个园子，养人。养，是涵养的养，不是养老的养。几位讲述者中，我和陈侃理、陆胤二位比较熟，他们都是在 2000 年代以后燕园这个园子中涵养出来的青年学者，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我和他们的共同点，可以说都受教于北大，也都在北大任教，都受益于燕园这个园子的涵养。

张鸣教授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讲我们和北大的学缘，我特别想把教过我们的老师都列出来，以示感恩。

教过我们的老师大致上可以归为两辈人。

一辈是我们当时称为“先生”的，解放前就在老北大老清华老燕大任教或学习的老师，有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周祖谟先生、阴法鲁先生、王瑶先生、季镇淮先生、冯钟芸先生、彭兰先生、吴小如先生、吕德申先生、陈贻焮先生等等。这些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而且给七七级讲课是大多数先生在北大讲坛上最后的出演。

另一辈是五十年代在北大学习后来留校任教的老师们，比如我的导师赵齐平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褚斌杰老师、袁行霈老师、周强老师、吕乃岩老师、陆颖华老师、金开诚老师、屈育德老师、倪其心老师、裘锡圭老师、陈铁民老师、沈天佑老师、费振刚老师、周先慎老师、何九盈老师、胡经之老师、张少康老师、李思孝老师、闵开德老师、刘煊老师、马振芳老师、陈曦钟老师、严家炎老师、张钟老师、孙玉石老师、谢冕老师、佘树森老师、洪子诚老师等等。后面这一辈大多数也是前面列举的那一辈先生的学生。所以我说七七级比较特殊，我们实际上是受教于两代老师。

文学七七级特殊的地方还有一点，我们和教过课的老师关系都非常好。学生学得专注投入，老师也感觉学问受到尊重，讲课非常用心。除了课堂，好多老师都会到 32 楼学生宿舍和我们聊天，有时是聊学问，聊课程作业的问题，更多时候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像陈贻焮先生、冯钟芸先生、袁行霈老师、吕乃岩老师、张少康老师、周先慎老师、沈天佑老师等，都到 32 楼来过。

平时可能不觉得，现在仔细一回想，中文系这么多老师教过我们，自己都觉得吃惊。以上这些名字，哪一位不是学界响当当的人物？所以我觉得，我这一代人，被文革耽误了十年最好的光阴，但终于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进北大，得到这么多最优秀的老师的教诲，真的是非常幸运。后来我也当了老师，就觉得要尽我所能回报北大，把两辈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传递给后来的学生。我把自己定位为“桥梁”，“桥”的功能就是连接隔绝在两边的空间场所，引申到时间的维度，是连接前后，尤其是特殊时代背景下。总之就是做北大精神的传递者。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北大学缘”，为了说清楚我理解的这个学缘的内涵，我想讲几件事。

第一件，大约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在五院中文系办公室遇见陈贻焮先生，那时他已经生病，我担心他走路不便，便提议送他回家。走到未名湖边蔡元培塑像前，他在正对塑像的那个小路口停下，叫我也过去，说要给蔡校长鞠躬。于是我们爷俩就在那路口上对着老校长塑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鞠完躬，陈先生转身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张鸣，你要记住，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们北大！”说完，两行眼泪就流了下来。陈先生性情中人，我多次见过他因为受到什么事情的感动而流泪，但这次还是让我深受震动。蔡校长的塑像是我们七七、七八级毕业时为表示对北大的感恩捐款建的，但平时路过那里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对蔡校长也只是一般崇敬而已。自从和陈先生的这件事之后，感觉完全不同了，真正理解了很多师长说过的“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这句话的含义，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魂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以后每次路过那儿，都会感受到老校长的目光，每年校庆，只要我在学校，一定去拜谒老校长的塑像。

第二件，还在念本科时，有一次在图书馆借书，借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学术笔记《蛾术编》（蛾，蚁的古字。蛾术：比喻勤学积累）。我把“蛾术”的“蛾”错读为“é”，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馆员李鼎霞老师告诉我这个字不念“é”，念蚂蚁的“yǐ”，并告诉我“蛾术”是什么意思。这虽然是个小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北大图书馆不仅有丰富藏书，关键是还有李鼎霞老师这样学问高深的管理员。当年同学们甚至相传，李鼎霞老师一看你借书的书单就能判断你学问做到哪一步了。我们许多同学在学业上都得到过李鼎霞老师的耐心帮助。所以，在北大学习，学问无处不在，并不是只在教室里。

第三件，2006 年 10 月 4 号，中秋节前一天，林庚先生去世。中秋前两天，10 月 3 号，农历八月十三的傍晚，林先生要护工小黄推他去未名湖边看月亮。在湖边，林先生静静地坐了一会，问小黄说：“月亮怎么还不圆呢？”小黄回答：“再过两天，八月十五就圆了，后天我再推你来湖

边看吧。”不过，林先生终于没有等到八月十五。第二天，八月十四，晚六点多，林先生坐在书桌前椅子上，安然离世。那天晚上，我和林先生家人把林先生遗体送到校医院，回家路上，在燕南园围墙外走过，月光如水，清澈透明，周围异常安静，心里突然明白，林先生的一生，如这月光一样明亮纯净，林先生在这样光风霁月的情境中仙逝，就是造物的安排。过去，无论外面多么喧嚣，世道多么混乱，只要一想到光风霁月一般的林先生就在燕南园里住着，马上心里就觉得充实而安宁。在学问上碰到什么问题，也不会心里没底，不会觉得无处请教。现在林先生走了，他光风霁月一般的人格，毕生追求的纯粹学术和诗意精神，会不会随着他的仙逝而逝去？他的少年精神和布衣情怀，还会不会得到后人的理解？当时体会到的空漠感，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第四件，严格说不是一件事，但姑且当一件事来看。我们讲北大学缘，还得谈谈学脉的继承和延续。陆胤的发言稿讲到了季镇淮先生在西南联大听朱自清先生讲课。我想说一件和这有关的事。自从我带研究生以来，每学期都和学生组织读书会，有一段时间就读朱自清先生的《宋五家诗钞》，一首一首的细读。开始学生可能不明白，读宋诗，可以有更好的读本，为什么单单选中朱自清先生这一本。其实，这本书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讲宋诗的讲义，当时只有三位学生听课，一位正式选课的是王瑶先生，两位旁听的是季镇淮先生和冯钟芸先生。五十年代初，王瑶先生和冯钟芸先生把这部讲义整理出来，加了《宋五家诗钞》的书名，但到 1981 年才正式出版。我 82 年念研究生时，导师赵齐平教授指定此书为必读书，到我给研究生讲宋诗，也把它作为指定参考书之一。我在读书会选择它作为读本，其实也希望学生能知道这个历史渊源。今天的宋诗研究已经大大进步，北大中文系还编了《全宋诗》，但无论多大的进步，都不能忘了前辈学者在西南联大时期那么艰苦条件下仍然坚守学术的精神。

以上事情，我想说的是，北大的学缘，当然首在“学术”，但又并不只是狭义的“学术”那么一点事情。燕园涵养人，在精神层面而言，是全方位的。学术的传承本身当然很重要，但北大的精神，或者说北大的“魂”，其实体现在这个校园中生活、学习、教学、科研等方方面面，甚至也体现在燕园的湖光塔影和草木虫鱼。燕园的湖光塔影，一草一木，都是有故事的，或者都是一段燕园故事的见证。总之，北大是北大人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个人表演的舞台，更不是个人追名逐利的平台。既然是家园，我们要珍惜。我们受益于精神家园的“涵养”，也要回报这个园子，以自己的努力，为这个园子的建设添砖加瓦，让我们故事也能成为精神家园中的段子。

3、领导总结

道可传而不可授

（北京大学副校长 王博）

王博副校长

非常感谢文研院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聆听六位讲述者分享他们的故事。我发现原来学问做得好的人，主持得也不错。今天，我带了一本“红宝书”，这是我们为校庆做的红宝书，封面是百廿校庆的标志。这里面，每一天都记载着历史上在北大发生的故事。

今天，我听到了从不同角度讲述的传承故事以及我们对传承的理解。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园子里，不管是读书还是教书，我们可能都会思考：在这个园子里获得了什么？当然，也有另外的人会思考：我们在这个园子里留下了什么？其实，不管是获得还是留下，都跟传承相关。我们有人谈到了对学问的传承，对知识的传承；有人谈到了对态度的传承，对境界的传承；

有人谈到了对中国的传承，又有人谈到对世界的传承……没错，这就是北大。在北大，永远不可能只传承一样东西。这也是北大令所有北大人都自豪的东西。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学问。叶朗老师讲道，“学问就是生命”。我觉得，很多代人都可以分享这个故事。但是，每一代人在得到“学问就是生命”这样一种理解时，我相信，他们的机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不同之处所在。庄子有言，“道可传而不可授”，我一直觉得这是非常深刻的话。有时候，我们可以传达、传达一些东西，但关键在于，也许其他人永远不能够接收到你想要传达、传递的那个东西。也因此，我认为，真正且最重要的传承就是，在北大这个土壤里培育出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现自己。它既可以呼应一百年前我们的老校长讲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于未来的迅速变化的世界。

大学是能够最好地体现传承的地方。这里是历史和未来的交汇之地，也是已知和未知的交汇之地。我们越接触更多的知识，就越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但是，我们也因此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知识。我认为，可能这就是大学的魅力所在——它给我们提供无限的可能性。一个好老师，不是给学生一个确定的结论，或者给学生指出某一个确定的方向。真正的老师应该像校园一样，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就是可能性的故乡。

我想讲的另一个体会是，我们必须以年轻人为老师。当我看到年轻学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且已经进入到人生的某个阶段了。我总觉得，在一个越来越迅速变化的世界里，年轻人永远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容易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改变一种态度，且应该面向未来。未来的北大就是年轻人的北大。正是年轻人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老师的尊重，让这个园子在变化之中始终坚持某一个东西。也因此，我从来不担心未来的北大会丢掉她自己的初心。年轻人、年轻的老师们和同学们，一定可以让北大、让北大的学问变得更美好。

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

4、专题报道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北大文研院举办未名学者校庆讲坛

合影

春夏之交，校园里草木葱茏，绿意勃发。4 月 20 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未名学者校庆讲坛，在北大二教地下的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拉开帷幕。“未名学者讲座”是文研院旨在选拔和培育北大人文社会学科优秀青年学者的平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有 30 余人登上讲台，业已成为北大青年教师群体的一个缩影。当晚，七位未名学者围绕“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这一主题，讲述了他们与北大、与学术结缘的故事。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资深教师代表叶朗、张鸣和 2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首先登场

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陈侃理研究员在演讲中谈及，正是老师们身上所饱含的学术生命的温度与厚度，引领他走进学术研究之门。他在受惠于田余庆先生“读书得间”“宁恨毋悔”的论学警句的同时，体悟田先生在学术上追求卓越的境界。田余庆先生经常坐到学生们中间，对年轻人寄予厚望，而这种对后学超越前人的嘉许和鼓励，也鼓舞着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学者们不断开拓前行。时代有波澜，人物有代谢，学问和学术生命的传承是北大永恒不绝的力量。

而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助理教授来说，他的北大学缘是一条问学之路，也是一条归家之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就业恐慌。在那个毕业季，书本上的知识、成长的经验跟当下的处境产生了共振，他开始体认戴锦华教授反复提示的“学术与生命体验的连接”，思考与自己生命经验相关的问题意识。于是，他的研究跨越南北，从鲜活的田野走向历史的挖掘。如今面对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面对如此高速变动的信息传播科技，如何把个人的困境与父辈、同龄人和更广泛人群的命运相联系，依旧是伴随他终生的学问。

“君子博文约礼，转益多师”。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副教授受业于夏晓虹教授。夏晓虹教授与他分享朱自清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前辈师长的轶事，使他得以一窥北大文脉——一线之传，微弱而顽强。他也找到了自己在专业框架和学术谱系上的位置。而如果把北大人格化，母校本身是一位硕大丰富的“问学师”。120 年以来，学问与人生、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答案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北大诸多师长、前辈、默默无闻的老师身上，有着超越学科分工或职能之上的“北大性”，值得学人去感恩、反省、发扬。

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幽默地讲述了在北大坚持道教研究这一边缘学科的不易与乐趣。在这种中心与边缘、孤独与热闹之间，他看到了北大所给予的滋养：那是一种自觉的、一种活泼的平静。人文研究的路，是知识的远征，学问的伊利亚特，也是思考的回乡，心灵的奥德赛。在边缘坚守的信念，是北大的恩赐，他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亦或从哪位学术大师的心灵和学问中传递下来，但他知道它在那里，照耀着所有北大学术的先行者和笃行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回忆他与北大结缘 20 载。北大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给学生所需要的各种滋养、缘分以及学问上的自由和生命里的归宿感。无论是北大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对于志在富民、勤奋调研的执着，还是原哲学系已故的王炜教授所体现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范，亦或是约克大学奥尼尔教授对弟子的真诚关怀，中外老师们对于学问、为人和教育的开放态度，让他确信学问本身是不分古今中西的。

担任客串主持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眷涛副教授评价说，传承不仅发生在北大学统之间的新旧更替与延续的意义上。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火种的播散越来越多地跨越了北大乃至中国的边界，走向世界。在他的求学经历中，“9・11”事件的发生，对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震撼，从而激发他走上伊斯兰文明研究的道路，而师从土耳其历史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学习土耳其语，也让他终身受益。学术的追寻没有边界，北大内外的老师们在青年人的成长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才是传承的应有之义。

最后登台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贾妍助理教授。她走向古代近东艺术史研究的过程，既充满偶然，却又如同《吉尔伽美什》史诗开篇所说，那仿佛是来自“深渊”的诱惑。她自比象征回归与重生的“衔尾蛇”——蛇身回首自噬其尾的古埃及符号，在哈佛求学十年后重返母校有一种圆满的欣喜。“窗外一塔湖图，门里两河春秋”，北大校园在更大格局中流动着一种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力量。

访谈环节，北京大学哲学系叶朗教授与中文系张鸣教授作为资深学者的代表，也娓娓讲述他们的北大学缘。叶朗回忆了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他们在时代的坎坷与曲折中，仍然坚持对学术的渴望、热情和追求，将学术看成精神的核心、生命所在。张鸣讲述了作为中文系 77 级的一员，他所问学过的几位老先生的故事。特别是年迈的陈贻焮先生带领他前往拜谒蔡元培先生像的情景，令在场听众尤为动容。在两位老师看来，北大的课内课外，永远有学者对学术保持着热情，对时代保持着关切，学问的火种因此得以代代相传。

庄子有言，“道可传而不可授”。王博在活动的尾声应邀致辞，在他的眼中，北大之大，在于它允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学问。真正的传承是在北大的土壤里所培育出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大学是历史和未来、已知和未知的交界之地，为学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变化越来越迅猛的时代，我们应当以年轻人为老师，而年轻人对历史和对老师的尊重则让北大在变革中始终坚持本色。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涵育学术”为使命，举办本次活动，正是希望突出“涵育”作为人文学术之本，应把学问扎根在深厚的学术史的土壤里，把先贤们的品行风范、精神信念作为化育和滋养后学的财富，传承下去。相信北大的学缘故事，也将因此续写新的篇章。

（本文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张欢）

（二）“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纪念展”

“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大文研院举办校庆纪念展

2018 年 4 月 25 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老校长与北京大学——纪念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纪念展”在文研院（静园二院）地下展厅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是文研院为纪念百廿校庆而举办的特别活动，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25 日，面向在校师生、校友和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以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四位老校长为主线，展出了四位老校长及其与北京大学早期发展相关的历史照片、书信往来和文献资料等，借此表达对曾引领北大前进的老校长们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特别的是，此次展览搜集了1952 年院系调整之前分布在北京城各处的北大各学院平面图，文法学院、理学院、第四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文科研究所等平面图均包含在内。

另外，此次展览根据 1948 年的北京市平面图，原北京大学文法学院、理学院平面图及曾就读和生活于老北大的校友们的口述，重新绘制了北京大学沙滩校区的校舍平面图，其中包含有 20 世纪 40 年代居住在沙滩校区附近的教授的住宅分布。

如今，除红楼等少数建筑外，位于老北大原校址上的大部分建筑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被拆除，北大也由沙滩迁往燕园。在燕园，我们继续传承着一代代北大人的精神，坚持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探寻现代大学的精髓。文研院通过展示北京大学沙滩校区的校舍平面图，力图让观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北京大学成立之初的形态，体悟北大精神的源头。

（本文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胡甲鸣）

“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纪念展”专题展览精选

2018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25 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地下一层举办“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纪念展”。展览按照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四位校长在任时间顺序布展，展品包括照片、书信、文件、报刊等。展览回顾了北京大学建校最初五十年的风雨历程，表达了对老校长、老北大人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一、严复与北京大学建校

早在建校之初，严复就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897 年，他协助友人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在百日维新结束后并入了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02 年，严复应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制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指导翻译工作。1912 年 2 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 月，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总监督改称校长，严复就此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不到一年的任期内，严复为北京大学的生存和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2 年，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下达了解散北京大学的命令。严复愤而向教育部呈交《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认为北京大学自创办以来集中当时最好的人力、物力，经过十余年惨淡经营，才成为唯一的一所具有最高学府地位的国立大学，停办就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况且，北京大学不仅有造就专门人才的任务，而且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宗旨，高等大学应该与普通教育齐头并进。最后，严复表示，他将不计个人进退，推动北京大学的保存和改革。与此同时，严复还亲自向华俄道胜银行借银 7 万两、华比银行借银 20 万两，为北京大学筹得维持生存的必要经费。

接着，严复又呈交《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对各学科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建议将经科并入文科，指出文科要本着

严复

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原则，涵盖东西方哲学、历史、舆地、文学等；法科以本国法律为主，外国法律为辅；理工科则要由学校出资派往德美两国进行插班进修；农科则派送到日本留学。此外，严复还对学校的总体制度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例如招生以考试为准，毕业后给予学位，教员选聘应该以本国人才为主，鼓励国内博学之人和留学归国毕业生进行自主研究和教学，体现了将科研人才作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的远见卓识。在这份说帖中，严复还提出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路。

这些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1912 年 7 月，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这是北大获得国际承认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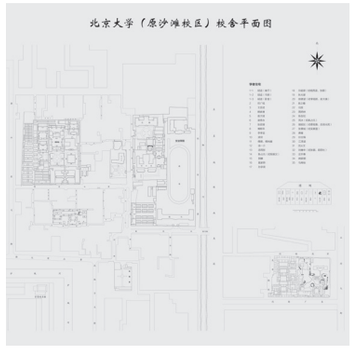
二、蔡元培与兼容并包

1916 年 12 月 26 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 1 月 9 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期望。此后，蔡元培所推动的一系列改革和改革背后的思想主张，在北京大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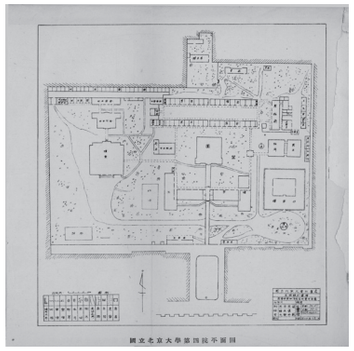
为了最高效地利用教学资源，提高教学和研究的质量，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分科进行了改进。就任时，北京大学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蔡元培认为这与北洋大学的工、法两科和北京另外的工业专门学校重复，于是经教育部和北洋大学同意，将工科并入北洋大学，省下的经费用于理科；商科教学内容少，于是并入法科。这样就形成了三科的划分。同时，蔡元培也考虑到文科、理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于是又弱化三科的界限，并列十四系，设置系主任。

蔡元培在就任之初就指明：“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了改变学生将大学作为升官发财阶梯、而非将研究学术作为天职的观念，蔡元培从聘任博学而热心的教员入手。胡适“旧学邃密”而“新知深沉”，留美回国后便立刻聘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一边与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人用新的研究方法整理古籍经典，一边又整顿英文系，介绍了不少新的教员。二十年代开始，在自然科学各系也请到了丁巽甫、李仲揆等人，又整理了各系的实验室和图书室，改造了第二院的礼堂和庭院以便开设讲座，使学生都有机会在教员指导下扎实地学习。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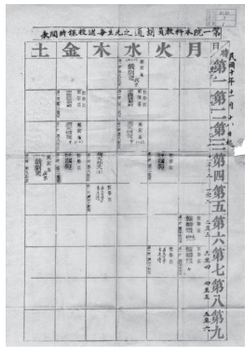
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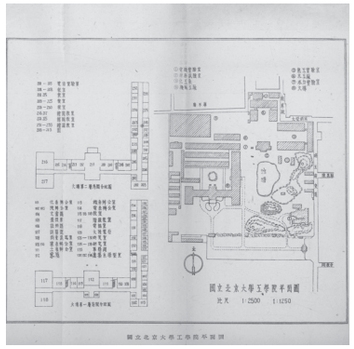
《1946 年北京大学旧校址总图》重新绘制（绘图：赵冬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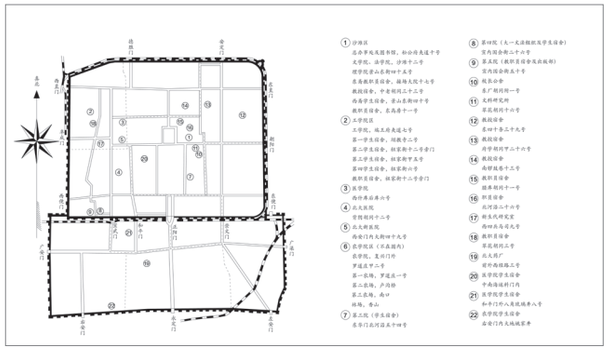
20 世纪 40 年代北京大学四院平面图



北京大学一院本科胡适先生每周授课时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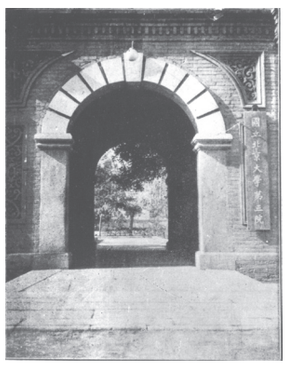


20 世纪 40 年代北京大学工学院平面图



20 世纪 40 年代北京大学校舍分布图

1925 年沙滩红楼一院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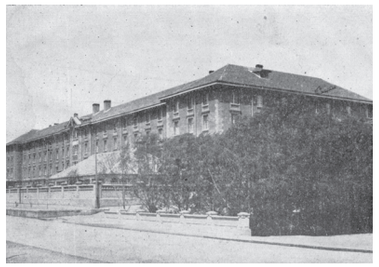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三院（法科校区）大门（位于北河沿，译学馆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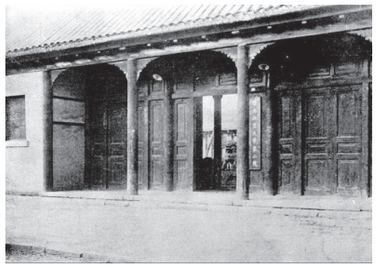
20 世纪 40 年代民主广场

1924 年 9 月研究所国学门同仁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

京师大学堂匾额



北京大学一院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二院

样，北京大学的各系开始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蔡元培相信，每一个学科的教员的主张即使不同，也都言之成理，因此需要让它们并存，给学生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也就形成了学术上的兼容并包的氛围。

蔡元培也看重学业之外的美育和社团活动，曾经亲自讲授美学课程。也支持设立书法研究会、画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有教授专门主持讲授。此外，1920 年 3 月，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蔡元培出席了成立大会。同年，李大钊以研究会的名义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一层，陈列有英、德、法三种语言的马克思全集。

1919 年，谢楚桢致信蔡元培，请求北京大学招收女生。蔡元培随即回复称，大

蒋梦麟 1931 年为北京大学三十三周年纪念刊题词

学没有“女禁”。1920 年，有女学生要求入校，因为错过入学考试，暂时作为旁听生招录。查晓园、奚浈、王兰三位女生因此进入文科旁听。这一年暑假招生时，北京大学就正式招收女生。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其他各所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

蔡元培器局广阔，见识高远，成就一代学风。1917 年底，时值北京大学二十周年校庆，吴梅为北京大学校歌重新填词，写下了“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一句，表达师生对蔡元培的敬仰之情。梁漱溟认为，蔡元培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于开创了一种风气，酿成了一大潮流。

三、蒋梦麟与教授治学

1930 年冬，蔡元培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前，蒋梦麟已经于 1919 年、1920 年先后两次代理校务，并帮助蔡元培筹备了北京大学的总体规划。

蒋梦麟认为，学风是师生共同抱持的信仰，并且大家朝着所信仰的方向走。在五四运动之后，蒋梦麟主张用“提高学术”来唤醒共同的精神，将自己的学问作为立足点，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作为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逐渐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

观展

1931 年，按照大学组织法，北京大学建立校务会议，将学校分为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别担任学院院长。蒋梦麟希望将学术与行政事务分开。根据他所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相互独立，分管行政性事务和学术性事务，前者包括编写全校预算案、设立和废除院系、改进全校事务等，后者包括审定课程、改进教务、决定考试内容和规范、审核毕业生成绩等。

蒋梦麟

四、胡适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1945 年 9 月，国民政府任命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 年 7 月末，胡适回国正式就任，聘任各系主任，自己兼任中文系系主任。8 月，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新生，学校走上正轨。

在动荡的时局中，胡适仍然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自觉地以十年为期，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这样学术独立包括四个方面，即可以充分担负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有足够的设备和师资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有专门人才和研究机构协助解决国内的科学和社会问题、能够与世界各国分工合作促进全人类的学术进展。为此，胡适提出，学术独立的基础是办好大学，因此，需要政府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分阶段重点扶持优秀的大学，并且对整个大学制度进行改革。

尽管许多人相信，中国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胡适也将“复兴北大”乃至发展全国的高等事业看作自己的使命，但是，

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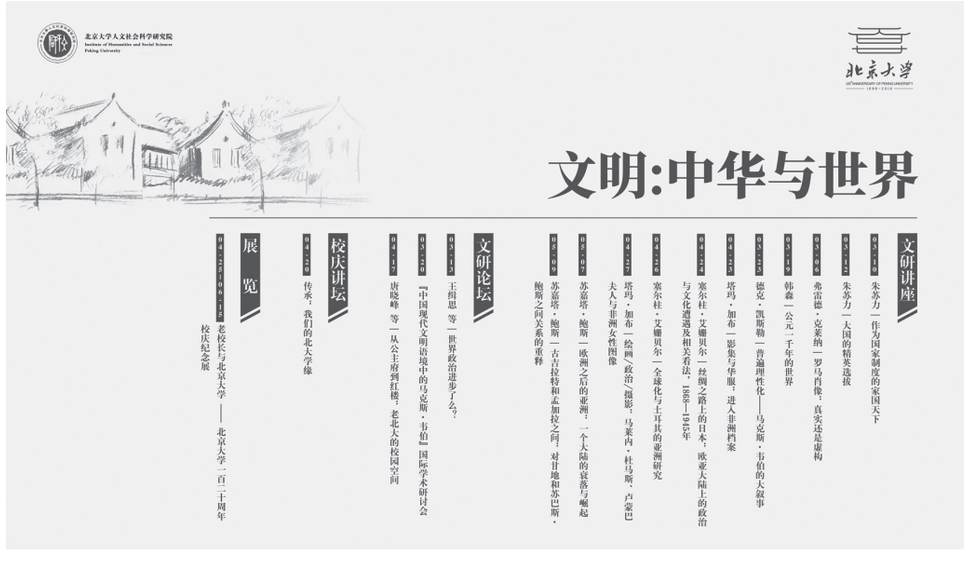
在这些计划提出的时候，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政府财政破产，学校生存尚且受到威胁，胡适只有力不从心。1948 年 12 月，北京大学即将准备 50 周年校庆，胡适写成《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叙述戊戌变法以来的校史。然而，12 月 15 日，国民政府派飞机将他接往台湾。胡适从此与北京大学诀别。

北京大学能够以一校之力引领时代的思想风气、乃至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与这所大学的历任掌舵人的高瞻远瞩息息相关。历任北大校长和历代北大人为北京大学积蓄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奠定了深厚的精神传统。值此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际，通过展览的方式回顾北京大学的光辉历程，既是在纪念历代北大人的努力和成就，也是在展望北京大学的未来，并且期待北京大学在传承中守正、在学脉中创新。

（撰稿：刘小雨）

（三）校庆系列学术活动

2018 年 3 月 10 月至 6 月 25 日，值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文研院以“文明：中华与世界”为主题举办校庆系列学术活动十余场，其中包括文研讲座 11 场、文研论坛 3 场、校庆讲坛 1 场、专题展览 1 场。（具体列表参见下图，详情请见文研学术纪要）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72

弗雷德·克莱纳：罗马肖像——真实还是虚构

弗雷德·克莱纳教授

2018 年 3 月 6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罗马肖像——真实还是虚构”。美国波士顿大学古罗马艺术史教授弗雷德·克莱纳（Fred Kleiner）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一直以来，罗马艺术以其描绘时事的浮雕以及数千件保存至今的肖像和雕塑而闻名。肖像由于能够真实地描绘不同的个体，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中都受到推崇。弗雷德教授讲座的核心便是对这一观点的准确性的质疑。他对罗马皇帝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肖像是否真的与本人相似表示怀疑：罗马肖像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接下来，弗雷德教授展示了不同时期的罗马肖像，并结合其历史背景分析、回答这一问题。

罗马共和国时代留下来的肖像往往是年长的男性（或女性），且清晰地刻画了脸部线条、皱纹，表现出了极端的现实主义风格。据文献记载，罗马人习惯将祖先的肖像放置于住宅的中庭，或在丧礼游行时戴上他们容貌的面具。这些肖像和面具往往是在祖先死后用蜡覆于其面部制成，记录了死者的确切外表，以纪念家族和祖先的荣耀。弗雷德教授提到，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这时期的肖像不仅记录了个体的外貌特征，还呈现出了一致的严肃个性——这也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所推崇的年长、经验、智慧、严肃、尊重传统等价值观完全符合。

弗雷德教授随后展示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凯撒肖像。秃顶，脸颊凹陷，前额和脖子上有深深的皱纹……这尊在罗马附近的图斯库卢姆（Tusculum）出土的凯撒大理石像与文献中关于其外貌的描述完全相符，各方面都符合早期罗马肖像的写实主义模式。这些特征在罗马共和国使用的钱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钱币大多描绘有诸神及诸如赫拉克勒斯这类英雄的形象。凯撒则发行了一系列雕刻着他头像的钱币，以此来纪念他的政绩——这也是第一次有“活人”出现在共和国的钱币上。

在钱币上铸造个人形象的习惯并未随着凯撒遇刺、罗马共和国终结而消失。在随后的动乱中，几乎所有争权夺利的参与者都发行了带有自己肖像的钱币。与埃及的克利奥帕特拉女王结盟的马克·安东尼发行了印有二人肖像的钱币，以此来宣传联盟。凯撒侄子屋大维继承了凯撒的财富和名字，因此，他在发行钱币时印上了自己和凯撒的肖像。围绕年轻的凯撒形象的是“DIVUS IULIUS”这两个词，即“神圣的凯撒大帝”。所以，这里的凯撒并不是人，而是新的罗马神。而屋大维自己的形象同样特别，他是第一位以年轻的形象出现在钱币上的执政者，围绕肖像的题字是“CAESAR DIVI FILIUS”，即“神之子凯撒”。

公元前 31 年，马克·安东尼在希腊亚克兴（Actium）的海战中战败。次年，他和克利奥帕特拉双双自尽。公元前 27 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荣誉称号，屋大维从此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一事件揭开了罗马帝国的序幕，也标志着罗马肖像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弗雷德教授在对比共和国时期的祭司像与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像时发现，虽然都身着祭司制服，但在共和国时期，祭司永远是年长的男性形象；相较之下，奥古斯都像则非常年轻。即便在后来，奥古斯都活到了 76 岁，也未见任何一尊雕像表现出他年老的样子，且每个人都将他描述为年轻人。这一现象表明，奥古斯都像欲表达的信息是：他不是普通人，而是神之子。

弗雷德教授指出，奥古斯都肖像的风格并非属于早期的罗马艺术范畴，而是出自早于他 400 至 450 年的希腊艺术。在一些雕塑中，奥古斯也被表现为全裸，其形象就像年轻的运动员和古希腊那些不朽的英雄一样永远年轻。关于奥古斯都肖像，

弗雷德教授还提到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虽然各个肖像的身体类型不尽相同，但头部总是一样的，即便是前额头发的独特发型也是如此。这说明，虽然这些不同的雕塑都是原创艺术品，但它们都是官方模型的复制品。官方模型有可能是一件镀金的青铜器，由首都的一位雕塑大师制作，然后被复制上千件，放置在庞大的罗马帝国的每一座城市中。

为了验证自己对罗马帝国时期肖像风格的判断，弗雷德教授进一步展示了其他罗马雕像。在科林斯（Corinth）的长方形会堂（basilica）中，有一组雕像是身着祭祀服的奥古斯都及其两个孙子，三人都以年轻人的面貌呈现。这种虚构年龄的现象在奥古斯都妻子的肖像中也有所体现。弗雷德教授随后展示了两尊罗马皇后利维娅（Livia）60 岁左右时的雕刻肖像，都非常地年轻。在不同时期，利维娅的雕像会随着时尚的更替改变发型，但呈现出来的一直是妙龄女子的容貌。

这种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孤例。奥古斯都所开创的罗马和平时期（Pax Romana）大约维系了两百年。之后，繁荣终结，转而陷入内战。弗雷德教授展示了两张内战时期的皇帝肖像图片，其表情显示出了惶恐而不安的情绪。公元 293 年，主张分权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44—312）创立了四帝共治（Tetrarchy）制度。皇帝要求艺术家通过肖像来宣传四位皇帝和谐共治的新政治信息。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钱币和雕像中，四位统治者身着相同的衣服，并以同样的身材出现在一起。四人的个人特征都被抹去，脸上呈现出的自信气质与五十年前的惶恐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组雕像是共治四帝的整体肖像，并非个人肖像，因此，呈现出来的信息也不是对每个人的真实描绘。

戴克里先的制度设计很快被君士坦丁打破，后者恢复了独裁统治。当君士坦丁开始追逐权力时，他在钱币上的形象与他年轻时的真实形象并没有任何关系，反而与四帝的形象相同。而在君士坦丁成为皇帝二十年时发行的金币上，他则呈现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看起来比他本人年轻了三十岁。随后，弗雷德教授展示了君士坦丁头像的全身复原图。在这幅图中，他被描绘成英雄般的裸体坐像，而这一形象是希腊罗马艺术中用于表现宙斯的图像。

通过对上述肖像的比较、分析，弗雷德教授指出，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人们倾向于在雕像中夸大人物的年纪，以彰显有阅历的智者形象；在奥古斯都时期，则改为以年轻人的形象示人，来凸显皇帝的神性；而在君士坦丁时期，不同时段使用了不同的形象。基于此，弗雷德教授认为，虽然罗马的肖像非常逼真，但其实都是虚构的。

讲座最后，弗雷德教授就罗马卡拉卡拉皇帝雕像、如何判断肖像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与在场听众进行了探讨。

（撰稿：包堉含）

73

傅无为：坚持，坚持下去！——阿比·瓦尔堡笔下作为自我心智画像的《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

2018 年 3 月 8 日，“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三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坚持，坚持下去！——阿比·瓦尔堡笔下作为自我心智画像的《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德国汉堡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瓦尔堡档案馆馆长傅无为（Uwe Fleckner）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傅无为教授

讲座正式开始前，朱青生教授对“瓦尔堡图像学”工作坊的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并概述了瓦尔堡在艺术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由此引出本场讲座的主题。接下来，傅无为教授简要介绍了艺术评论家在 20 世纪初对法国画家马奈的作品的态度。他表示，当时的评论家们强调马奈作品中属于其历史时期的特定特征，而这些特征使得其与同时期画家相比更难以被观众理解——即便是马奈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特异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0 年春，柏林举办了“辉煌的马奈作品展”，参观者之一阿比·瓦尔堡表现出了理解马奈作品所必需的敏感性和知性态度。展品中，《娜娜》、《在咖啡馆》等均是介于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之间的、享有独特地位的作品。傅无为教授表示，研究者们并不清楚是哪些特征唤起了瓦尔堡的研究兴趣，并获得他的高度评价。

傅无为教授认为，瓦尔堡在参展时怀有明显的先入之见。早在 1908 年，瓦尔堡就曾阅读过古斯塔夫·泡利所写的一篇名为《拉斐尔与马奈》的短文。在对照分析了《草地上的午餐》（马奈作品）与《帕里斯的裁断》（拉斐尔作品）这两幅作品后，古斯塔夫·泡利阐述了自己的创新构想：马奈在改造神话人物的基础上创造了他的人物形象，并成功吸收了创新的绘画手法。这对于瓦尔堡理解绘画主题的流转变迁具有深远意义，也用独特的方式证实了绘画领域转化过程的长期效应。

接下来，傅无为教授进一步介绍了瓦

尔堡研究马奈原作的过程。1928 年春在德国举办的首场马奈回顾展对他的意义重大。这次展览展出马奈作品近百幅，包括扎卡里·阿斯特吕克与爱弥儿·左拉的肖像画等。事实上，因心脏病发作，瓦尔堡的柏林之行并不十分顺利——但这也成为他参观回顾展的契机。傅无为教授在此引述了瓦尔堡对这次经历的回忆：“马奈在前面举着指挥者的火炬，我将跟随他。”为了攻克他自己意识到的一些绘画史上的问题，瓦尔堡希望成为马奈的追随者。

近距离接触马奈作品的经历对瓦尔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甚至认为赏画具有振奋精神的疗效。本次讲座题目中的“Manet, Manebit!”（坚持，坚持下去！）便是一句瓦尔堡引用过的、与马奈名字相关的拉丁语箴言，马奈本人亦曾选择将这句箴言印在自己的藏书票上。

傅无为教授认为，瓦尔堡将这位饱受争议的艺术家的宣言看作保护的力量，用以对抗自身疾病所导致的存在主义的威胁。同时，它也激励着瓦尔堡克服在研究绘画主题的流转变迁时遇到的方法论问题。在讨论“流转变迁”时，傅无为教授进行了延伸。他在对照当前全球性的迁徙现象后表示，只有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释，才能明确主体自身的位置。

与过去相比，德国艺术评论家对马奈的看法在 1928 年发生了变化。傅无为教授介绍，在表现主义的首要影响下，马奈更多地被视为一个起到桥梁作用、“既革命又保守”的历史人物。而在上世纪 20 年代，一个艺术史学家对现代主义画家如此关注，甚至将其视作艺术范式的历史模式改变的见证人，这一事实是很不寻常的。1928 年 5 月，瓦尔堡将《草地上的午餐》纳入《记忆女神图集》的第一个以摄影形式记录的版本。这一早期版本选择了拉斐尔创作的《雅典学院》等作品为例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如何吸纳古代艺术进行了试探性论证。马奈作品的选用则是瓦尔堡对文艺复兴之后到该时代的一种预告。傅无为教授提到，随着版本的更新，瓦尔堡有关绘画主题流转变迁的论述更加具体，并围绕着“外光派绘画取代奥林匹斯诸神”如何实现的问题，研究了所有与拉斐尔和马奈相关的绘画材料。瓦尔堡对这些绘画作品进行了整理，按严格序列进行解读。基于当时尚不先进的摄影设备，瓦尔堡调整了摄影材料的大小以进行对比。

1928 年秋，为建构理论，瓦尔堡前往意大利接触更多的绘画与文本材料。在此期间，他也致力于了解马奈画作《草地上的午餐》在图像中的谱系关系。瓦尔堡在《帕里斯的裁断》中发现有一例 17 世纪中期对拉斐尔绘画创新手法的改造痕迹，将其视作“一个主题从古代流转迁徙到当代过程中的一个缺环”，并把这些作品整理为图版——阐释、吸收、利用古代艺术的过程中“能量的反转”。傅无为教授介绍道，展出图版上的整个罗马绘画系列对瓦尔堡这一时期的研究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最大挑战：“探讨这种方式的意义即恢复古代艺术中的情念模式，以满足能量传递、强调表现价值的历史理论。”

傅无为教授对瓦尔堡的马奈研究作了进一步说明。这位艺术史家在“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这一标题下制作了五幅图版，包含 250 多幅复制的图像。围绕拉斐尔 / 马奈图版，瓦尔堡构建了一个包含基本画面结构整体的框架，而这些结构整体正是他毕生的研究对象。1929 年，瓦尔堡在一封书信中描述了与这些图画相配合的文本，即对《记忆女神图集》理论介绍的结论。他将图版赠予了格特鲁德·宾——为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印象方面的协助者”和“表达方面的确认者”。傅无为教授总结道，这些事实说明瓦尔堡认为《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系列图版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即它们以图像的形式凝练为个人成就的传记。

接下来，傅无为教授对瓦尔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在《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系列图版中，瓦尔堡精心处理了画作的排列格局，以呈现从古至今“与命运的魔鬼对峙的过程”以及艺术发展所遵循的路径，直至在《草地上的午餐》的画面中完美表达人类自由。瓦尔堡大量引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复制品，并对作品中的姿势表达进行深入研究。在给古斯塔夫·泡利的一封信中，他提到：姿势表达的古风特色具有经久不衰的力量。

瓦尔堡所写的另一解释性文本则首先梳理了《草地上的午餐》在图像志中的谱系，结合古斯塔夫·泡利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瓦尔堡自己的解读：“从能量层面上重组绘画中描绘的人类的心理状态——这是通过姿势和表情互动过程中看似无足轻重的偏差而得以实现的。”瓦尔堡将这种心理表达所发生的反转视作解放的行动，且这种描绘主题由神祇崇拜向俗世之美的转变有着历史的源流。瓦尔堡认为，拉斐尔等人的早期作品体现了“一种从异教仪式中解脱出来的精神解放”，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则将这种精神解放进一步发扬，经宁静沉思的人物形象，展现对大自然永恒轮回的和谐的顺服。

对此，傅无为表示，瓦尔堡将认知的变化提升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在瓦尔堡看来，马奈在人性化的过程中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其作品基于审慎的转化而非反传统的态度，并因此获得“引人入胜的说服力量”。但傅无为教授也提到，面向公众使得瓦尔堡未能揭示这一观点涉及的过于私人化的层面。

随后，傅无为教授还说明了瓦尔堡研究马奈的私人原因。瓦尔堡在组织与马奈相关的系列图画时遇到了方法论上的难题。图版上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了心理状态上的二元对立（“狂喜迷醉”与“沉思默想”）状态，进行梳理后，瓦尔堡对此采用了双向性精神障碍的术语（“躁狂—抑郁型精神障碍”）进行描述。马奈所表述的明晰的自我意识使得瓦尔堡本人与读者得以洞彻其内心，“试图从一种反映自身经历的角度来解读西方图像元素中精神分裂的症候”。瓦尔堡揭示了自我内省是其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而这点也能从他在德语原文中表现出来的语法跳跃得到证实。众多材料表明，瓦尔堡将自己与马奈这一“忠实于所描绘对象的画家”等同起来，并在语言学方面得到进一步发挥。

最后，傅无为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瓦尔堡在心理学上的自我诊断表明，他极其关注马奈在世俗层面为摆脱“掌控命运的魔鬼”所付出的努力，

而这对理解《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瓦尔堡对马奈的研究是一幅“心智方面的自画像”，且这幅自画像对他的生活起到了治疗的作用，成为一种指向自身的斗争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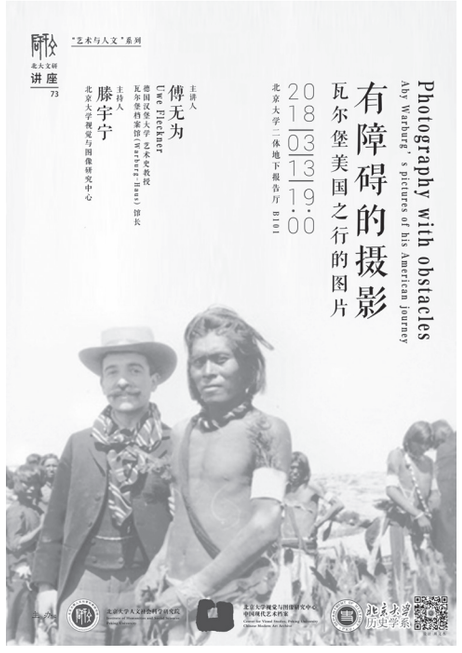
在交流环节，傅无为教授就听众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而生动的回答。从拉斐尔到马奈，画面表达方式发生了改变。针对这一现象，傅无为教授提到，这一差异实际体现了由神祇光环的压抑到人性自身风格凸显的转变进程。关于马奈作品中女性人物的独特风格，傅无为教授认为，需要结合作品的神话学背景来考量这些现象。此外，朱青生教授也作了补充说明。他表示，现代的马奈研究往往与社会学和女性主义视角等领域联系起来，但与此同时，研究者需要具备历史的眼光，关注瓦尔堡自身所处的时代及其研究兴趣。

（撰稿：陈洁樱）

傅无为：有障碍的摄影——瓦尔堡美国之行的图片

2018 年 3 月 13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三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有障碍的摄影——瓦尔堡美国之行的图片”。德国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瓦尔堡档案馆馆长傅无为（Uwe Fleckner）主讲，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副主任滕宇宁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出席本次讲座。

傅无为教授首先介绍了阿比·瓦尔堡的生平。作为艺术史领域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瓦尔堡一生中有两个传奇性事件：一是在少年时期放弃继承家族事业，向弟弟马克斯出让他作为长子接管家族事业的特权，而交换条件则是马克斯将来会为他购买任何他需要的书籍；二是瓦尔堡曾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但他凭借自身努力得以康复。1923 年，瓦尔堡在克罗伊茨林根疗养院做了一场题为“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领地的图片”的讲座，以此向自己、医生和听众们证明他已从精神疾病中康复，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经过同事整理，瓦尔堡这场演讲的《蛇仪讲稿》（A Lecture on Serpent Ritual）于 1939 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他唯一译成英文的文本，内容充满了大胆的文化心理学理论，自出版后，给思想史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随后，傅无为教授指出，1923 年的这场讲座有一个关键前提，即瓦尔堡的美国之行。1895 年 9 月，瓦尔堡前往美国参加弟弟保罗与银行家所罗门•罗卜（Solomon Loeb）女儿妮娜的婚礼。他将这次私人旅行与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结合起来，在美国东海岸各地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图书馆，并与美国的一些重要学者建立了联系，包括塞勒斯•阿德勒（Cyrus Adler）、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等等。正是他们引导或说促使瓦尔堡前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深入探索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印第安人文化。

接着，傅无为教授按历时性顺序展示了瓦尔堡美国之行的足迹。1895 年 11 月，瓦尔堡到达科罗拉多州；12 月到达圣塔菲（Santa Fe），并在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 ó bal）遗址附近仔细观看了早期的岩画和雕刻画，访问了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居留地；1896 年 1 月 1 日，他到访艾克玛部落（Acoma）位于悬崖上的村落，亲眼目睹了一场宗教舞蹈仪式； 2 月，瓦尔堡先是抵达帕萨迪纳（Pasadena），然后抵达圣地亚哥的科罗纳多海滩； 2 月末，他前往旧金山，访问中国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4 月初，他返回新墨西哥州，经由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到达祖尼族人的部落（Zuni Pueblo），再从亚利桑那州的霍尔布鲁克（Holbrook）到达基姆斯坎宁（Keams Canyon）；4 月下旬，瓦尔堡终于到达了原定的目的地奥赖比村（Oraibi）。奥赖比村位于霍皮族人居留地内第三座平顶山上，是美国境内最古老的印第安人居住地之一。

回到欧洲后，瓦尔堡对这次探险之旅的成果进行整理和评估。他根据自己拍摄所得以及从其他研究者那里获取的大量照片，整理出一篇讲稿《图文并茂的日志》。1897 年，他面向业余摄影促进协会，在汉堡、柏林两地举办了三场讲座。这三场讲座可谓是一次“短暂即逝的图像之旅”（ephemeral pictorial journey），展示了瓦尔堡及他人拍摄的约 70 幅照片。傅无为教授评论道，瓦尔堡不是一位技艺娴熟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快照存有很多技术上的瑕疵，如影像模糊、影像重叠、细节不足、曝光不足，等等。然而，正是这些“业余”的拍摄避免了那些常规的摄影美学被强行加入到画面中来，从而使留存下来的瞬间

现场观众提问

直接且如实地显现了瓦尔堡对兴趣题材的天然自发的反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其摄影视角。

傅无为教授强调，瓦尔堡的讲座总是以“图片”（pictures）为题。在他的讲演中，图像与文本、幻灯片与讲演词的关系跟常规艺术史讲座的传统不同，摄影材料的序列和节奏决定了发言的内容，而非相反。这些电影化的影像序列引导着观者观赏美国西南部的广阔荒野。有时，这些影像序列会“将镜头拉近”：首先展示一个村庄全景图似的风景，然后从较近的距离拍摄几座建筑，最后再进入到一座建筑的内部，或以特写手法呈现出一个或多个住户的形象。这些影像序列表明，瓦尔堡在面对一种情境时常常以谨慎的态度逐步靠近。

同时，傅无为教授表示，瓦尔堡对单帧照片的构图方式不太重视，而更在意尽可能真实可感地接近拍摄对象。他的照片通常不能算作客观的、民族志式的纪实材料，而是常常被设计为交流式的——不少拍摄对象都直视拍摄者的眼睛，显出好奇、微笑或是自我防卫的神色。甚至有那么几次，瓦尔堡放下相机，与拍摄对象共处一处。通过这种方式，他放弃了观察者的视角，缩短了自己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不断介入到情境之中去。这促成了其对拍摄对象详细而深入的了解，也使得被观察的个人、他们的行为以及所处的生活空间得到了揭示。同时，图片所呈现的建筑、手工艺、偶像崇拜仪式和服饰方面的细节，为 19 世纪晚期美国西南部欧洲定居者和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文化提供了明确的档案记录。

但是，傅无为教授指出，瓦尔堡与霍皮族人只发生了零星的接触，因此，他运用到的方法很难被视为一种参与性的观察。作为研究者，瓦尔堡并没有实际参与到正在研究的这个部落群体中去；另一方面，他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接触也绝不仅仅是从一个“中立”角度进行秘密观察的。他没有从方法论层面去反思自己对于当地规矩和风俗的拍摄，而是杂合了一部分互动接触、一部分侵犯性的观察，以及游客般猎奇的心理。

为了研究文化差别，瓦尔堡以高度特写的手法进行记录。但是，他未能做到时时尊重这些文化差别，他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一直很明显。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照片上，还体现在 1897 年那三场讲座的讲稿中。根本上的种族优越立场是当时典型的时代产物，年轻的瓦尔堡也没能克服这一点。直到 1923 年，他才在讲座中将欧洲文化同美国印第安文化的特征并置起来，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作对比，体现出对跨文化的宽容和对文明世界的批判。这种比较的方法也影响到他后续对图像进行的实验性运用，使他得以跨类别、跨文化地处理不同的表达形式，研究图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转变迁，并将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时期的全球化观点引入艺术史，从而对今天的艺术史写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傅无为教授、朱青生教授与现场听众就如何解读瓦尔堡的图片、瓦尔堡对当今影像研究的启发、瓦尔堡精神疾病的自我治愈及其对印第安文化的研究贡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撰稿：王梦倩）

74

朱苏力：作为国家制度的家国天下

2017 年 3 月 10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四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作为国家制度的家国天下”。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评议。

在中国历史中，家、国、天下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秩序的重要构成。朱苏力教授在他的新作《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中便以此为主题，从国家制度的角度重新审视三者的关系。

讲座开始，朱苏力教授首先介绍了家、国、天下作为国家制度的具体内涵。纵观历史，中国的制度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派别：家的制度，国的制度和天下的制度。其中，“家”是普通人的生活共同体，是最真实的生活世界，以由血缘关系维系的农耕村落为基础；“国”是农耕村落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地理位置上以中原传统

朱苏力教授（右一）主讲，阎步克教授（左一）评议

农耕区为核心；“天下”指“国”之四周广阔但与中原农耕区有包括冲突在内的重要关系的非农耕区，即传统意义上的“塞外”，包括西北、正北，东北、西南等地。对于普通的农耕百姓来说，自给自足的“家”已经构成了全部的生活事件，他们会感受到“国”和“天下”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但几乎不会考虑“国”与“天下”的问题。考虑这两者的是从“家”中逐步产生的但在人口中仅占少数的政治精英团体，主要是后来的读书人，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读书人也即官僚构成了这个“国”最为政治的那一部分，即state。可以看出，家、国、天下作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中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

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朱苏力教授给出了两种主流的理解思路。其一是儒家的思路，即《礼记》中谈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教导政治精英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若要平天下需先治理好国家，而治理好国家需以齐家作为前提。但是，儒家的这种逻辑显然是不严格的。很多史实都可以证明，“齐家”不一定能“治国”，能“治国”“平天下”也不代表家庭和睦。另一种是道家的思路，更务实地强调“以家为家，以天下为天下”。也就是说，虽然家、国、天下相互勾连，但实际上，三者各指向不同的层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自然而然可以推导出来的。

鉴于农人大致生活在大致自给自足的血缘村落中，而且大量经验也都表明典型的农耕文明本身未必需要一个国，尤其是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大国，朱苏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国至少从西周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大国”？且在之后的历史中即便历经数次分崩离析，还是可以“重新收拾旧山河”，总会形成新的统一体？朱苏力教授认为可能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主要位于河水经常泛滥的黄河中下游，二是北方游牧民族给中原农耕民族带来了持续的威胁。这两大因素贯穿中国历史，推动着华夏大地上的国家建设和朝代更迭。

接下来，朱苏力教授对这两个因素做出了具体解释。首先是黄河泛滥的问题。中国是以中原农耕区为核心慢慢兴起的，黄河泛滥对农民来说便是关乎生计的大事。但是，一家一户的小农是没有能力抗洪的，即便是若干村落联合也难以有效地解决水患。因此，必须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解决黄河问题。这个统治者可以把分散在各处的农民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去修坝开渠、维护河道——小农经济下对政治精英团体的需求便出现了。此外，黄河治理也带来了一些更为具体的需求：首先，治理黄河需要理论水平和技术支持，这些专业知识不是在“家”的层面可以推广开来的；其次，黄河泛滥带来的威胁也会促使各个小国联合，比如春秋时期位于黄河下游的齐国便与黄河中下游的其他国家订立盟约，要求在治水问题上“不得以邻为壑”，以防止上中下游不配合的问题；另外，说是黄河治理，实际是黄河流域以及这一代的众多河流的治理，这是一项跨地区的事业，需要国家层面的组织和调控。总之，黄河泛滥的问题只有在广阔的地域中并在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下才能得到解决。

其次是游牧民族的问题。在中原农耕区以外还有大片的非农耕区，非农耕区的游牧民族经常与中原的农耕民族发生战争。但即便是一方占领了另一方，也不可能长久地在农耕区发展畜牧业，或在非农耕区发展种植业——这种农耕区与非农耕区的划分是由地理、气候条件形成的，非政治、战争可以改变的。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特别是当北方气候寒冷，草场萎缩，游牧文明南下中原，就会与农耕文明爆发直接的激烈的生存冲突。游牧民族有人数优势和骑兵优势，广阔的北方相邻区，单靠一个或几个村落的力量是无法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但两种形态迥异的文明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比如农耕文明虽然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基本自给自足，但仍对游牧民族的马、牛、羊和皮毛制品有大量需求。游牧民族更是在很多方面要完全依仰赖农耕文明的进口，比如粮食茶叶、丝绢麻布、金属冶炼等等。

但两种文明不能完全分离。这一点因此体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认知中：司马迁就在《史记》里将生产牛马的塞北地区也纳入到了中国物产的讨论之中，但其实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当时还处于匈奴控制之下。换言之，虽然中国一直以来以中原农耕区为核心，但在社会精英的认知中，中原农耕区的安定，必须要有这个“天下”的太平，因此这非农耕区也是中华文明整体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草场萎缩会令游牧民族难以生存，这使他们不得不越过长城，到中原地区掠夺粮食；这就使，如何防范游牧民族南下入侵中原，和黄河问题一样，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必然面临的隐患。这也要求了产生一个强有力政府。只有在政府的组织下，把老百姓编成军队，集中国家力量修建防御措施，中原地区的百姓才能守住土地，维持自己的生存——“国”和“天下”的维度也由此建立起来。

随后，朱苏力教授认为，在家、国、天下三者之中，勾连上下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国”，而不是“家”。国家从基层

农耕区获得财政税收和人力资源，再统一调配以有效对抗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国泰”（国的层面）了，才下可保“民安”、上则可“天下太平”（天下层面）。但是，中国传统的高度离散的农民村落不会自发或主动组建一个国家，因此，怎样首先在中原农耕区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就一直是这片土地上最核心的制度问题。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如果从理念来看，这种国家制度愿景出现在西周，概括起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已经初步有了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景，但还不具备大一统的种种物质性的制度条件，便只能先采取分封的形式。但西周的分封制相比于夏商已经有了更多中央控制力和影响力了，也更强调全国的协调和统一行动了，有了政令上传下达了。“烽火戏诸侯”这个历史故事就体现了中央与各地诸侯的政治军事制度。除了政治上的分封，西周也已经通过“家天下”有意地或客观上促成中原地区的基本政治文化共识和文化认同。例如只有语言大致相通，孔子才能周游列国，商鞅才能从魏国到秦国去实行变法。随后秦创立的皇帝制度、郡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等一系列的措施，则让西周的政治愿景基本在制度层面成型了。

但历史中国这个大国的形成发展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各种内外因素，都可能导致“国”的制度崩塌，因此每一代的政治精英都不免要“重新收拾旧山河”。但“重新收拾”并不只是崩溃后的重建，更是一个制度效果不断累积，制度因此可能不断创新的过程。即便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也总会在接受前代制度的基础上，也通过面对现实的制度创造，或多或少或在不同维度上给历史中国带来一些新的因素新的条件，不仅重构中原地区的王朝制度，而且影响甚至重塑“天下”。

中国古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皇权专制，但由于财政和官职逐层代理的问题，国家也只能做到在大的层面上加强中央集权，主要为保证政令畅通，防止地方割据分裂导致战乱，有效选拔和使用政治精英，打击官吏贪腐。因此，在“家”的层面（即村落）实际上是高度自治的。“齐家”依靠的其实是一套不同于“治国”的体系，在特定意义上，完全可以称其为“自治”。这个体系虽一直表述为伦理的，现代以后甚至更多被理解为文化的（包括批判），但这个体系从来都是制度的，虽然没有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却是国家认可或默许的强制性的制度实践，说“教化”也可以，但这个词也容易遮蔽许多强硬的东西。“家”的制度在纵向上表现为父慈子孝，横向上表现为兄友弟恭，女性则作为另一种创造性的角色生产出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总之，“家”的制度也是十分复杂的。在此，朱苏力教授强调，这些看起来是伦理习俗的家庭秩序背后其实都是强硬的制度存在，“家”的制度和“国”的制度之间呈现出既隔离又联系的关系。

而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在国家层面也可以看作是“一国两制”：一块是农耕地区，采取郡县制，实行统一的官僚制度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另一块是广义的游牧地区，在中央能有实际影响的地区，通常采取“羁縻”的自治政策，即以军事保证的政治约束，同时在经济上给予好处以促进发展和交流。因此，中国大部分的官僚制度以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只在农耕区实行，而在广大的非农耕区普遍实行的制度有点类似区域自治或民族自治。但历代王朝对“天下”的政治治理程度或影响力是变化的。当中原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强大时，中央有时也会对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但当中原王朝实力不足，就会出现各种政治实力同中原王朝对峙的局面。

因此，历史中国的“国家”是家、国、天下三部分的统一体。普通人的生活一般仅局限在“家”这个血缘村落中，但广大农耕区的安定生活则必须要有个“国”，能有效回应和应对“天下”的问题。这三个层次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勾连的。

不仅如此，历史中国的这个“国家”，至少到战国之后，就一直同时具有人民，疆域和政治治理三个维度的含义，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分别指的就是英文用三个词强调的三个维度或层面的国家，即 people/nation，country 和 state。

以家、国、天下这三个范畴来讨论中国的国家制度不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现当代的中国的变革和发展。例如，建国以来，国家在农村进行了多次改革，从合作社、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再到后来的乡镇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学生村官以及现在号召的新型城镇化，即便关注不同，

邓小南院长主持

思路也差别很大，但从特定角度看，都是要解决中国农村生活社区的现代化问题，也是要解决农耕村落与国家现代化的制度重构和制度联系。甚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在城市地区变成了城市社区的建设问题，社区广场舞的出现，或城市退休老人的孤独，可以视为“家”的问题在当代城市的变形。由于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以及现代化，传统中国的“天下”的问题总体上在当代中国已经转变为治国的一部分，在具体治理层面则表现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港澳台的“一国两制”问题，当然首先是要力求保证和促进国家的统一，但在具体层面也必须认真和审慎对待民族地区的特殊问题。

因此，借助“家”“国”“天下”的制度构架去理解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展现历史中国的这些制度内在的道理，会有助于基于历史和现代中国的经验发展中国的法学和政治学，在中国国家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创造学术的中国话语和中国表达。

报告结束后，邓小南教授进行简要总结。她指出，朱苏力教授的理论框架以一

个非常广阔的视野阐释了中国历史的制度构成，也让我们对中国长久以来的大国体制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接下来，阎步克教授做出评议。他首先就朱苏力教授的新作《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一书进行了点评。阎步克教授认为，这份研究的构架方法和写作方法都相当新颖，融汇了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讨论的同时，还在方法论上引入了一些中国传统概念，从而提炼出家、国、天下的三层政治共同体。此外，朱苏力教授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纵横驰骋，笔法活泼多变，并且在论证时引用多方原理；不仅讨论现象，更追溯背后最为根本的东西。

对于本次报告的主题，阎步克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看法。首先，家、国、天下三分式的概括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且朱苏力教授在研究中所采取的客观、中立的态度也很好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同时，阎步克教授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黄河治理作为初始王朝强化统治的重要动力的说法因为得不到考古验证已在史学界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现在普遍认为，中国水利建设的政治意义其实是被夸大的。此外，汉之后，黄河至少安流八百年，然而在这之间朝代依然更迭，可见国家形势与黄河治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朱苏力教授提到中央集权不涉及基层，即所谓的“皇权不下县”，这一点在学界也有很多争论。现在一般认可的是，至少在清朝皇权是“下县”的，而之前的很多朝代，虽然基层领导身份上不是国家正式职官，但从职能来看已然属于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所以，“皇权不下县”这一点不能一概而论。第三，朱苏力教授特别强调宪制的“非道德化”（或说“去伦理化”），这导致全书走向了一个较为极端的点，即凡是能促进国家富强的制度就是好制度。虽然从宪制的角度来说，非道德化是必须的，但我们在对历史做出评价时还是要面向未来。因此，历史评价中的道德判断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阎步克教授认为朱苏力教授可能更偏向于法家。

对此，朱苏力教授回应道，他在书中展示的理论框架是一个从历史、时间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模型，是一个功能性、因果性的结构。因此，并不适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他要阐明的仅仅是这三层制度都是中国的“宪法制度”，是指向不同领域但必然相互勾连的制度；当前一个制度出现时，后一个制度就必然会产生。而对于历史制度中非道德的问题，朱苏力教授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把这些“非道德”中合理性的一面阐释出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据此来做出历史评价。朱苏力教授还强调，道德选择与道德评价只是个人层面的事情。讲座最后，阎步克教授与朱苏力教授就伦理与道德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不仅给在场听众带来了启发，也为大家进一步反思伦理与制度拓宽了思路。值得一提的是，本场讲座是文研院纪念建校 120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的开篇。

（撰稿：孔博琳）

朱苏力：大国的精英选拔

朱苏力教授

2018 年 3 月 12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四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大国的精英选拔”。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评议并主持。

朱苏力教授在讲座伊始便表示，大国的精英选拔，核心其实不在于精英政治，而在于“大国”。因为从国内外的政治实践来看，暂且不论如何定义精英，但无论在哪里，最终大致都可以说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果选拔政治精英是在非常小的群体中，人们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分歧就只会集中在精英是否代表了自己的利益；但当群体扩大，出现超大的政治共同体时，人们很难有准确的信息，甚至没有相关的信息，就很难有效评判选择精英了。若根据一些外在符号如知名度或家族来选择，就会出错，不利于政治共同体的治理。因此大国的政治精英选拔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由于历史中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层政治治理领域，朱苏力教授认为，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精英。而且各层级的精英，至少最初，必须从“家”也即农耕村落的小共同体中创造出来。特别是在治国和平天下的层面，这就不仅涉及选择，而且需要把农村的那些有政治能力的人尽

可能培养和塑造成有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乃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国精英。

与农村精英只需与家族或乡里熟人打交道不同的是，大国精英的首要才能是治理国家，需要同陌生人周旋。不仅如此，还必须更关注国家和天下，理想地看，还必须即便面对逆境，也能坚持对国家的忠诚。这样的精英，其实已不能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聪明，还必须能做事，踏实务实——即便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也能做出正确和稳妥的决策。因此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的重要问题之一，首先要在这个大国对何为精英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然后才可能有相对稳定的精英选拔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

早期中国一开始的精英选拔具有强烈的族群或阶层特色，即所谓世卿世禄。但西周通过“家天下”的国家制度建构，至少在中原地带奠定了语言和文化的统一。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抢夺人才，人才选拔上就从“亲亲”逐步转向“贤贤”。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也因此呈现出高度流动，有理由认为这为后来中原农耕区的统一，秦汉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也在这种竞争中，老百姓普遍接受了诸如英雄不问出生的社会规则，也不再迷信于门第、血统、社会阶级或族群。《史记》中记载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王侯将相宁有种”“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斯”之语，即便是司马迁的杜撰，也表明了一种有关政治精英来源的而社会共识。

更大的问题关于精英的选拔。这个问题不可能用“伯乐相马”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大国各地都可能有千里马，真实的伯乐都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伯乐，事实上只是了解本地的千里马，不同地区的千里马很难比较。因此，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必须创造一种制度，一种法治方式，来应对，要避免萧何月下追韩信体现的那种人治方式，最多也只是作为法治的一个补充。

这个问题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战国四大公子每人都有门客三千，却很难确认谁是真正的人才，是大才，因此只能兼容并包，看似美德，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越是兼容并包，实际效果就越是埋没人才，乃至还只能“毛遂自荐”。这都反映出政治共同体越大，人才选拔的麻烦也越大

这个麻烦本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应尖锐化，但因为秦王朝只持续了短短十几年就灭亡了，人才选拔的问题还没凸显出来。汉初到武帝之际逐渐地，这个问题才凸显出来。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外戚强大，如窦太后、王太后家族的窦婴，田玢，以及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霍光等。汉武帝其实是非常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的，可以说是不拘一格用人的，包括从匈奴子弟中发现了金日磾等人才。但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因偶然机遇进入他的视野，被识别并得到重用。这就表明仅靠伯乐是不够的，因为伯乐只可能发现其身边的人才。而要治理大汉，要避免贵族政治，门阀政治，就一定要从全国挑选人才。因此，汉武帝下令每个郡国都要向国家推荐两位人才，后来又根据各郡国的人口总数对推荐的人才数量做了类似比例制的调整。各地推荐的人才从少年时期都在宫廷中学习数年，考核后优秀的留下任职，被淘汰的则返乡。

之所以用这种选拔方式，受到了一系列技术问题的制约。当时未有纸张，无法集中考核、统一标准。即便想统一考试，也需要在全国圈定一个大致的考试范围，便于普通人的文化投资。因此，从这一视角看，武帝罢黜百家的最重要的制度功能就不是为禁锢思想，而是为人才选拔的确定考试范围。这样做不仅可能有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份文化投资指南，使得社会下层也有了进入政治精英行列的可能。汉武帝的这项措施并没有直接导致科举考试制度的诞生，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的重要举措为几个世纪之后的科举考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种考试还有经济上的好处，那就是民间投资，最后由祖国选用人才。

但武帝采用的推举制度也有显著的缺点，地方官吏富豪推荐人才易导致选拔被地方权贵控制，也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弊端。东汉末年战乱，人口大量流失，令这种推举制度难以继续。曹操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派朝廷要员考察选拔人才，大大削弱了地方势力豪强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人才的选拔。但这一察举制度也很快随着选拔人才的“中正”之间利益交换而很快败坏了。

隋唐开始推行科举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再需要朝廷官员的推荐，而改为直接通过县、省、州府、中央考试选拔精英。这既加强了中央管理，也避免了上层官僚的拦截。何炳棣的研究表明，科举制度确实让大量父辈没读过书的贫寒家庭子弟进入王朝的官僚体制，参与政治治理。相对于西方近代之前普遍实践的贵族政治，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才可能产生布衣宰相。

但科举制度仍有弱点：以文字来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当中会趋于更多筛选出会背书的人。但政治治理与政治理论，与哲学、历史不同，政治最重要的是做事，而不是文字表达。因此大国精英选拔制度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从考试选拔的人才中选拔也会做事的人。这个问题甚至更早就出现了，战国时期就提出来了，“纸上谈兵”以及“滥竽充数”的故事都指出了这个人才选拔评价的问题。因此儒家针对此也有诸如“敏于行而纳于言”等一系列告诫，但在朱苏力看来，后世证明，法家的循名责实可能是更有效也更普遍的官僚考核原则，其实也就是问责制度。此外，还特别强调借助政治实践来培养和筛选政治精英，这就是“宰相比起宇宙副，猛将必拔于卒伍”。这可以说是历史中国政治的常规。而且这种选拔措施看来也是有效的，一个并不可靠但仍有意义的标志就是，大致是在唐以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了作为群体现象的失意文人。

最后，朱苏力教授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大国内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一定不平衡，这也给大国的政治精英选拔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汉武帝就意识到，因此要求郡国推荐人才时是按照地区来分配推荐名额，还考虑了郡国人口总量。这种要求就功能来看其实就是让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都有可能参与政治治理。

这个地域考量的问题到宋代已经政治化了，司马光就认为南北方录取的进士不均，不公平，而提议改革。这个问题由于两宋王朝的特点没有变成大麻烦。但到明朝，这个地域之争的矛盾激化了。明王朝首次科举（春榜）录取的四十多个进士都是南方人，引起北方读书人的强烈不满，甚至导致了一些相关读书人的政治悲剧。为赢得北方读书人的信任，明王朝夏榜录取了六十几个北方人进士。为了让知识分子信任中央、对人才选拔制度有信任感，明朝确立了南北榜，后来又把凤阳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绑定在一起，增为中榜。明朝这一选拔制度，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防止南北方政治精英的分裂，不能仅仅考虑分数而录取进士，选拔官僚。，中榜录取实际等于对当时文化教育相对不发达的西南地区采取了加分录取制度。清朝也保留了这项制度。这项制度因此不是一种仅仅关注个人智力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制度，更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群体的大国中努力吸纳和整合各地方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不仅对明清的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而且就功能而言，有代议制的因素。

俞可平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大国的精英选拔是政府学的核心问题，政治演变跟政治精英选拔有很大关系，政治精英主义是政治学的主流学派。政治学也希望将经济学里的帕累托最优应用到政治领域，实现最有效的精英选拔。随后，他就中国传统精英选拔制度的废弃问题，以及传统政治精英与当代政治精英的本质区别与朱苏力教授展开了讨论。

朱苏力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是适应小农经济的，但现代以来中国需要新型知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可能进入当时各地的村落私塾教育，只能通过政府的努力建立现代的洋学堂，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但是，科举尽管废除了，但从某种层面看，传统的科举制度的一些因素也还是继承下来了，从外观上看，可以说如今分解为当下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两部分。废除科举是特定时期的必要产物，问题更多出在科举的内容，而不是这个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个人才选拔制度本身不仅相对于农耕社会有合理之处，即便今天抽象来看也是合理的，至少那些历史的考量都融入了今天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俞可平教授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高考是选拔制度，公务员考试也只是基层公务员的考试，不是政治精英的考核政治。政治精英走的是干部选拔制度，与科举有一定区别。

对于传统政治精英与当代政治精英，朱苏力教授则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心、吸纳足够的信息、听取别人的意见、做出正确的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韬光养晦做实事，在条件具备时步步推进社会发展。现代政治精英区别于古代精英的一点是越来越注重专业技术性。随着劳动分工细化程度的加深，专业的政治精英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技术精英应交给本群体做出评价，而非交给外行人。

（撰稿：熊晓晓）

75

韩森：千年的世界：全球化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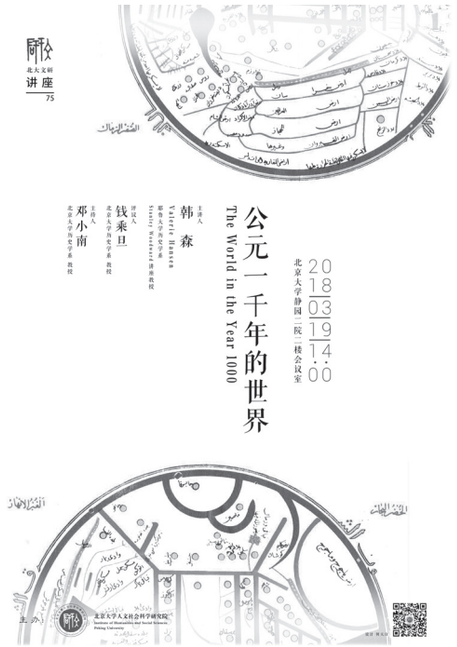
韩森教授

2018 年 3 月 19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千年的世界：全球化的开始”。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评议。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出席并参与讨论。

全球化从何时开始？目前流行的普遍观点是以 1492 年欧洲国家对新航道的开辟为起始点。韩森教授独辟蹊径，将其向前推移 500 年，提出了全球化从公元 1000 年为始的观点。韩森教授解释道，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三大不同地区的人群彼此间碰撞出三次“大接触”，即维京人与加拿大印第安人、维京人与东欧人以及印度洋地区、阿拉伯世界同中国的接触。后经不同部落和文化圈之间的“接力赛”，世界由一个“全球通道”连接，全球化得以开始。在随后的演讲中，韩森教授列举了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以兹佐证。

一、第一次接触：维京人到达加拿大

韩森教授认为，人类不同地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公元 1000 年，也就是北欧维京人到达加拿大的时候。那时，维京



人途径巴芬岛抵达加拿大东北部的纽芬兰岛，并与当地的印第安人接触。韩森教授以大量的史料作为例证，内容包括文字史料、地图、在加出土的石头和铁钉、在纽芬兰岛发掘的考古遗址等。这个考古遗址拥有多个房间，内含卧室、厨房等；而挖掘出土的铁钉也证实了印第安人与外界发生了接触——那时的他们尚不使用铁器。韩森教授表示，后来，维京人与加拿大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且前者在人数规模和打猎技术上均不及后者。维京人既不会使用鱼叉，也不会在冬天挖冰洞、捕海豹。于是，在生活了十年之后，维京人于公元1010年离开了加拿大纽芬兰岛。韩森教授认为，这一历史时刻让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其他地区的同胞并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孤单。

二、第二次接触：维京人到达东欧

考古学家在北欧发现有一些窖藏，内藏硬币和臂章等物件。韩森教授解释道，这些都是当时的部落首领颁给自己下属的奖赏。这些在北欧出土的硬币也称迪拉姆，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它的存在表明，当时的北欧商人已经由中欧到达阿拉伯世界，并进行一些毛皮、奴隶买卖的贸易——中欧地区的平坦地貌与河流连接为北欧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接触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韩森教授介绍，一些俄语资料也表明了当时的俄罗斯从部落社会转型为君主政体的方式。公元800年至900年间，维京人在东欧建立基辅罗斯，从各个部落收取毛皮和奴隶。但这种方式存在着不稳定性，于是，基辅罗斯建立政府以收取稳定的税收，并逐渐从部落社会转型为君主政体。由于政权的存在需要宗教信仰的支持，国王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即位后便立刻派出使者在周边国家寻找合适的宗教以成为国家层面的信仰。之后，国王选择了天主教。韩森教授表示，东欧各国有选择国家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基辅罗斯之所以选择天主教是为了和周边国家形成政治上的联盟。

韩森教授补充道，当今世界的四大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都是从公元1000年开始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至今对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尤其如此。

三、第三次接触：阿拉伯、印度洋地区与中国的交流

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同印度洋地区、阿拉伯国家往来频繁。澶渊之盟后，宋朝主导着与上述地区进行的贸易。当时，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泉州日益壮大，成为对外交流和贸易的重要港口。韩森教授表示，如今在泉州，仍然存有诸多见证着这段历史的资料与文物。

其中，泉州开元寺的石柱上雕有印度的宗教雕塑——毗湿奴。韩森教授解释说，这些柱子原本在泉州地区的印度寺庙里，后来寺庙倒闭，被用到开元寺。此外，在泉州还出土一些融合了中国文化与印度宗教文化元素的雕塑，比如在佛教宗教石雕上的两条龙以及未雕刻完毕的毗湿奴石刻。这些史料的存在成为了中印交流的佐证。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也在中国扎地生根，泉州的圣友寺便是代表。韩森教授表示，当时该地区的伊斯兰教信徒众多，他们便建立起自己的教堂以供集会使用。

此外，泉州现存的古船也是见证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接触的资料。韩森教授解释说，古船上存在的木质钉子表明它曾达到过东南亚地区，并在船损害后由当地人修复过——因为在当时，中国人修理船只用的是铁钉，而东南亚国家则使用木钉。

综合以上论述，韩森教授提出自己的见解：全球大发现时代从公元1000年开始，而非1492年。当时，不同地区的人们以“接力赛”的形式展开交流和贸易。虽然某一件物品不会围绕着地球流通一圈，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使主要区域彼此连接，“世界通路”得以形成，全球化由此开始。

评议环节，钱乘旦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点评。第一，韩森教授的讲座，内容精湛，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代表了西方学者典型的讲座风格。第二，韩森教授没有停留在空洞概念和抽象的解释层面上，她不仅提出了自己观点，还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一些资料甚至是自寻而来的，这种研究态度对史学家来说至关重要。第三，韩森教授知识面广博，研究全球史时避免了空洞化和概念化；她从细节入手，使其变得形象化，这是非常不易的。全球史研究的深化则要求全球史学家具备极强的洞察力。第四，钱乘旦教授高度认同韩森教授“全球史是不同地区之间‘接力赛’的结果”的论断，这一观点新颖别致。钱乘旦教授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为例阐释了自己对“接力赛”的理解，发人深省。

提问环节，荣新江教授提问道：“若全球化从1000年开始，其持续的动力是什么？”对此，韩森教授举出了维京人和加拿大人的接触、维京人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接触这三个例子。他还表示，全球化背后的动力主要是对贸易的需求，以及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最后，多位学生从环境学、历史学角度同韩森教授展开热烈的讨论。

（撰稿：唐国俊）

76

德克·凯斯勒：普遍的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大叙事

2018 年 3 月 23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普遍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大叙事”。德国马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德克·凯斯勒（Dirk Keasler）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老师评议。

德克·凯斯勒教授

首先，李强教授首先对凯斯勒教授在韦伯研究方面突出的贡献进行简单介绍。讲座开始后，凯斯勒教授直入主题，对本次讲座主要讨论的“普遍理性化”这一概念进行论述。他认为，“普遍理性化”是韦伯最为重要、同时也是被现今学术界讨论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包含着韦伯对于世界理性化普遍过程的深邃思考，因而，对其进行考察，不能仅从一个社会学概念的意义上进行，而应放入到更为宏大的叙事中重新思索。就此，凯斯勒教授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斯韦伯这一概念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首先，“普遍理性化过程”和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并逐渐实现全球化这一过程密不可分。考察“普遍理性化”，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关照。其次，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韦伯自身的个人成长历史有重要的关联。他出生于 19 世纪中叶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其祖父、父亲均是普鲁士上层社会重要的政治参与者，母亲出自名门。因此，该时代普鲁士上层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对韦伯产生了重要影响。就个人经历而言，韦伯先后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求学、任教经历，这对其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1892 年之后，韦伯先后游历意大利、美国等地。这一经历既开阔思路，也伸展了思考格局，还帮助韦伯产生了将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这对其后来的比较社会研究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后来的比较研究中，韦伯将理性化过程归结为三个重要问题：其一，为什么只有在西方世界出现了理性化过程？而在其他区域（特别是亚洲）没有出现？其二，为什么资本主义工业化会在西欧率先发生？其三，资本主义理性的发展有何价值、优点？同时又造成了怎样的代价？

至于第四方面，凯斯勒教授认为，应从多个方面考察理性化。这一模式包括政治、官僚化、经济、宗教、艺术甚至人类行为等多个方面。在理性化的时代，上述领域均出现了理性化的过程。凯斯勒教授表示，应从多个方面出发评价这些领域产生的结果，我们既要看到优点，同时也应该持怀疑主义态度看到问题所在。第五，凯斯勒教授表示，应将文化特征和变革时代的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并且应该看到，韦伯的“普遍理性化”概念包含了其自身对于未来资本主义问题的关怀。

评议阶段，田耕助理教授对凯斯勒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了感谢。他认为，凯斯勒教授的讲座重点突出、内容详实，对于修正我们对于马克斯韦伯的误读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他还就韦伯对理性化和人类普遍秩序的建立之论述、韦伯社会学思想对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等问题同凯斯勒教授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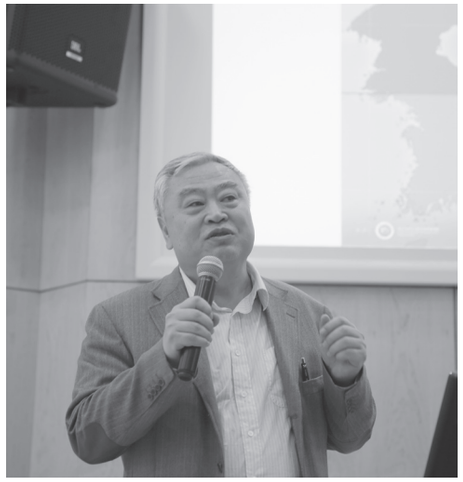
（撰稿：玉书涵）

77

沈志华：再谈朝鲜战争——从信息沟通和情报认定看中美苏三国的决策

2018 年 4 月 12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再谈朝鲜战争：从信息沟通和情报认定看中美苏三国的决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教授金东吉评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沈志华教授指出，朝鲜战争是多个国家（朝鲜、苏联、美国以及中国）根据信息和情报而做出的一系列决策的结果。决策内容包括：是否该发动战争、中国是否出兵、发动后美国是否会卷入以及美国卷入战争之后是否会越过“三八线”等。在整个过程中，朝鲜本身的决策地位反而是不重要的。发动朝鲜战争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对此，沈志华教授解释道，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在 1949 年就决定要发动战争，但当时，没有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许可。信息和情报仅仅是



沈志华教授

战争过程中涉及决策的一方面，而如何认识、鉴定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沈志华教授分别就中、美、苏三国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决策内容、过程和要点进行详细阐释。

一、苏联的决策

当时，苏联主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是否该同意朝鲜发动战争？是否要向中国出兵？战争之前，斯大林一直不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从目前公开的档案来看，金日成在 1949 年 3 月份公开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表示只能使用和平的方式统一朝鲜半岛。此外，同年 6 月，美国撤军，一个月后金日成便制作了先发制人《釜津半岛作战计划》——但这一计划也被斯大林否定了。甚至到了 12 月 24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一次会谈中也一致表示不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

1950 年 1 月 30 日，斯大林突然发电报给金日成表示同意《釜津半岛作战计划》，并强调行事必须缜密。沈志华教授表示，斯大林是在 1 月 30 日当日突然改变主意的。那么，在 1949 年 12 月 24 日至 1950 年 1 月 30 日之间，到底发生何事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主意？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沈志华教授解释道，建国之初，中国没有海军建制，因此，海上作战十分依赖苏联。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要求从苏联手中收回大连、旅顺等港口的特权。斯大林并没有及时应允，双方一直僵持不下。直到 1950 年 1 月 26 日，中国向苏联提交了一份方案，其中有一条明确表示“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苏联海军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沈志华教授认为，这条信息使斯大林抓住中国当时的一个弱点，也让苏联找到维护其在远东利益的契机。因此，在后来的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周恩来的谈判中，苏联又追加了“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战争威胁，苏联军队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动”的条款。沈志华教授认为，斯大林同意发动战争的主要考虑便是维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长久利益。

而至于要不要中国出兵，以及何时让中国出兵则是苏联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沈志华教授表示，当时，朝鲜和外蒙古是苏联的两个“卫星国”，斯大林在当时并不希望中国参与到朝鲜战争中。因此，斯大林一直认为，只要战争能够在“三八线”僵持住，中国便不需要出兵。这样，朝鲜半岛可以一直处于紧张局势，不会威胁到苏联安全，苏联便可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此外，在发动战争前，苏、朝都曾预测美国并不会参与这场战争，所以，美国出兵使斯大林倍感突然。1950 年的 7 月 2 日，斯大林致电报给周恩来，表示让中国做好准备，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的前提是苏联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以及中国派遣陆军、苏联派遣空军。7 月 5 日，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战役。斯大林同意了中方的两个要求，但前提是只有敌人越过了“三八线”苏联才会派遣空军。因此，美国是否越过“三八线”是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的一条底线。

沈志华教授认为，当时，毛泽东希望早点结束战争，金日成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出兵。但是，斯大林并不愿中国参与其中的态度导致朝鲜的求助信息石沉大海。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形势急转直下。值此紧张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传递希望苏联同意中国出兵的消息，由于其传递方式并非正式，没有引起苏联大使的重视，从而导致苏联决策出现错误。

沈志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未将充足的信息告知对方。朝鲜采取了试探斯大林态度的方式，并未将战争局势的紧张程度以及朝鲜的真正诉求告知苏联大使，而苏联大使也没有明说斯大林的暧昧态度。此外，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27 日这一周内，朝鲜面临着通讯中断的问题，以致斯大林发电报给金日成要求其将部队撤回“三八线”附近时，平壤方面一直无法联系上前线部队。直到 9 月 29 日，斯大林方才知道“三八线”无人防守，朝鲜溃不成军。指出，斯大林下定决心，于 10 月 1 日发电给毛泽东让中国出兵。

二、美国的决策

朝鲜战争打响后，作为支持南朝鲜的美国来说，决策的关键问题也有两个：是否要参与朝鲜战争？是否该越过“三八线”？

如上文所述，在发动战争之前，苏、朝一直抱持美国不会干预朝鲜战争的判断。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很多美国学者认为，苏联是根据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和

讲座现场

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讲话来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沈志华教授则表示，苏联不会愚蠢到依据一份公开讲话来进行重大判断。随之，他举出了可信的史料进行佐证：1956年，米高扬访问中国时向毛泽东解释，错误的判断基于当时苏联截获了一份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发给国防部的一份电报。

沈志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美国决定干预朝鲜战争并非一时起意，而是早已定之。在1949年初，美国希望离间中苏关系。但当时，苏联原子弹试制成功，新中国成立，且双方签署了《中苏同盟条约》。美国感受到极大的威胁，随即制定扼制中国的全面战略：只要中国在任何一个方向有所动作，美国必会迅速做出反应。因此，在美国出兵之际，苏联倍感突然。

沈志华教授介绍，越过“三八线”并不是美国的目标——其真正目标是将战争恢复至“三八线”局面。但当时，面对北朝鲜溃不成军，美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应乘胜追击，一举统一半岛。而美国防部表示，美军越过“三八线”后，若中苏参战，则美国必须撤回到“三八线”。沈志华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是否出兵，美国获取的情报是非常充足的。但是，美国人一直抱持着错误的观念：中苏同盟中，苏联是领导者，中国是被领导者——苏联不出兵中国便不会出兵。因此，当得知中国出兵时，美国采取了不以置信的态度，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三、中国的决策

中国在决策时也同样面临着两个问题：是否该出兵援助朝鲜？是否应该在1951年1月接受联合国提出的停火议案？对此，沈志华教授认为，出兵援助正确，未能接受议案却是错误的。

对此，沈志华教授解释道，中苏约定的出兵前提是敌人越过了“三八线”。1950年10月1日，朝鲜战争告急，斯大林发电让中国出兵。但中国高层领导认为，朝鲜局势非常恶劣，出兵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此时若出兵会对中国非常不利。10月2日晚，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传递不宜出兵的信息。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召见印度大使向美国传递“美军不能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将参战”的信息。但是在美国人眼中，印中两国交好，印度大使的话不足为信。沈志华教授总结道，信息虽然重要，但是传播信息的渠道也很重要。所以，在美国越过“三八线”后，中国便不得不出兵。

沈志华教授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是正确的决定。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若不出兵便会被人诟病，且此举赢得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信任。当时，毛泽东判断，苏联不会对朝鲜战争弃之不理。果不其然，中、美第一次对战后，苏联便出动空军，甚至将装甲部队集结于东北地区，随时给予支援。

沈志华教授指出，出兵是正确的，但在1951年初未能及时收兵却是错误的。就在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力挫美军、占领战争主动权之际，联合国从中调和。当时，周恩来在停火协议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的条件（包括台湾问题、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英法等国的首肯逼得美国也不得不同意。但是，当美国同意之后，中国却拒绝了这一提案。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对整个战争形势判断出现错误，即认为停火协议不过是美国的缓兵之计；二是中国对国际舞台外交程序不甚了解，直接拒绝提案使得中国没有任何回旋之地。

沈志华教授表示，其实在第二次战役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是强弩之末，而美军损失较少。若在这时接收停火协议，中国将会得到诸多好处，战争也会停止。拒绝的决策使得中国政治、外交和军事全面失利，陷入被动局面。想必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度认为可打败美国，但实际上不敌美军。因此到第六次战役中国不敌美军的时候呼吁和谈，除战场以外，任何附件条件都没有了。在这场耗时长的战争中，中国损失惨重，没有得到多少利益。

评议阶段，金东吉教授对“苏联估计美国不会参与其中”的观点持相反意见。他根据相关史料提出，苏联预测到美国会参与到朝鲜战争中的。金东吉教授进一步解释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号爆发，美国提案在两天后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速度如此之快可见早有准备。苏联的情报部门在做决定之前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则是不合逻辑的。当时，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并行使一票否决权，此举乃充分估计到美国会参与到朝鲜战争中来而故意为之。只有美国出兵，苏联才有更多理由留在远东地区。同时，这也会将美国的军事力量牵制在东亚地区，有利于苏联在欧洲发展社会主义。沈志华教授回应道，苏联不参加安理会是担心美国将朝鲜战争同苏联联系在一起，从而与其对立。而在当时，苏联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实力。因此，当美国正式参与到朝鲜战争中时，苏联非常吃惊。

提问环节，主讲人就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以及当前中朝关系等问题同在场师生进行互动。

（撰稿：唐国俊）

78

塔玛·加布：影集与华服——进入非洲档案

2018年4月2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八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影集与华服：进入非洲档案”。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程莹评议。

塔玛·加布教授

塔玛·加布教授首先展示了一张家庭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室内场景按照爱德华时代的风格布置。外曾祖父穿着整齐的三件套西装，外祖父则戴着苏格兰高地风格的羽毛帽子，骄傲地炫耀着他的苏格兰短裙。这张照片没有体现出二人的立陶宛犹太移民背景，而是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富有英国特征的想象的未来，让他们适应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习惯，成为更广阔的文化的一部分。

这张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照片在很多充满向往的非洲城市家庭里都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即让家庭、个体和社会团体在摄影棚和沙龙里塑造并展示新的自我认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许多非洲人用现代的摄影技术重新定义了自身的形象，让自己成为当代世界的参与者——即使这个世界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和关切。

这样的照片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南非摄影师莫佛肯（Santu Mofokeng）的“黑色相册 / 看着我：1890–1950”（The Black Photo Album/ Look at Me: 1890–1950，以下简称“黑色相册”）就是一项这样的研究。莫佛肯曾生活在种族隔离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为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反抗运动服务的历史叙述和具体行动受到质疑，他转而研究和反思非洲人在形象塑造中呈现的历史文化。这种历史文化具体体现在城市非洲人的肖像和家庭摄影中。这些摄影不仅可以被用作人种学和人类学的资料，还可以丰富当代人对过去的认识。但是，还没有人充分地理解这些。

在“黑色相册”中，莫佛肯收集了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内，南非的黑人（包括工人和中产阶级）委托他人拍摄的照片。他重新审视了这些照片，希望通过它来表明，南非黑人希望其在后代记忆中树立起这样一种形象：有尊严、有物质财富，紧紧地团结在一个宗教的、兄弟般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中。这与殖民主义摄影师经常塑造的那种在生理物质层面原始、社会层面原子化的形象截然不同。莫佛肯认为，城市中西化的非洲人在这些照片中通过布置摄影棚和装扮自己体现西方文化的痕迹。让自己成为现代都市的主体的同时，又面对着殖民地管理者将他们限制在无产阶级和所谓的“部落身份”中的双重束缚。照片上的人物看向画面之外，与假想的观众交流，而事实上，他们自己才是这些照片日后的观众。这种与自己沟通的渠道也体现了抵消殖民主义叙述的努力。

莫佛肯转向档案方向的研究和一系列当代艺术实践是一致的，这些实践的前提是积累、复制尚能挽救的历史材料，并且把它们还原在自身所处的情境中展示。当代艺术家常常把过去的摄影作品当作内容复杂的历史文物，认为它们一旦被重新制造，就能够反过来批判它们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或者体制制度框架，且可能带来对过去事件和人物的记忆和反思。这种意义上，莫佛肯的研究不仅讨论了大量改写南非政治历史的具体转变，也在总体上反映了档案的转变。这是艺术实践的首要关注。

1997 年，莫佛肯在约翰内斯堡双年展上首次展出了这些照片和与之配套的文本。投影机将这些照片按照预设的时间间隔投影到墙上或者屏幕上，将图像呈现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模仿了艺术史教室的情境中。同时，图片依次出现，让每个人物或小组获得同等的关注。观众可长时间观看细节，不仅有服装、举止、场景，还有图像的磨损迹象。莫佛肯通过一系列问题打断图片的流动，增加了图片中形象的深度。其中既有简单的问题，也有更深远的历史猜测。

同样的思考还在继续。2013 年，莫佛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了一个名为“祖先”的新项目。这是一幅九张图片构成的网格，每一张图片都对古旧的照片进行了扫描和数字化改造而得来，再固定在深绿色的纸板上。图片中的形象非常有趣，从高度艺术性再现阅读书籍的年轻女性，到年轻黑人水手围绕着印有英国国旗和国王称号的椭圆形花环。凡此种种，不一一例举。网格中心的图片上是一对夫妇被殴打的肖像。他借此让观众产生日常生活一般的好奇心，这也延续了“黑色相册”试图消解异域化和原始化认知的努力。

“黑色相册”展现了摄影媒介的历史性，不仅分析和讨论了标志性的证据，且为更富有想象力的回顾搭建了舞台。莫佛肯重新制造了过去。他的确不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人，但是，在他早年从事摄影工作时，南非的视觉历史开始受到审查，可引起狂热的肖像和其他各种图像都被控制。纳尔逊·曼德拉的形象就被当局认为具有煽动性。曼德拉被捕后，所有关于他的叙述都被禁止，包括照片和绘画。但是，摄影师之间仍战略性地流传出一张照片，向公众证明这位领导人还活着。现在，曼德拉的面貌举世闻名，每个人都可安心地看到他的肖像。他的历史形象甚至成为了新的、充满诗意的政治事业模范和象征。喀麦隆艺术家福索（Samuel Fosso）就曾将曼德拉的一幅肖像作为其“非洲精神”系列作品的一部分，这一系列作品中有数位黑人领袖和人民英雄。

福索在 2007 年致力于“非洲精神”的创作。他选择了非洲的英雄来拍摄过去的肖像，并仔细地抉择他想要体现个性的形象，越著名、越可识别越好。这样，通过他精心的伪装，他可以隐藏在熟悉的面孔和框架之后，不仅可展示的个性致敬，且向原型所带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致敬。在扮演曼德拉时，因为曼德拉在他选择的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向塔玛·加布教授（右一）颁发聘书

肖像上穿着部落传统服装，他将这幅作为象征“传统”的一幅，将这位政治家放在了一个有趣的选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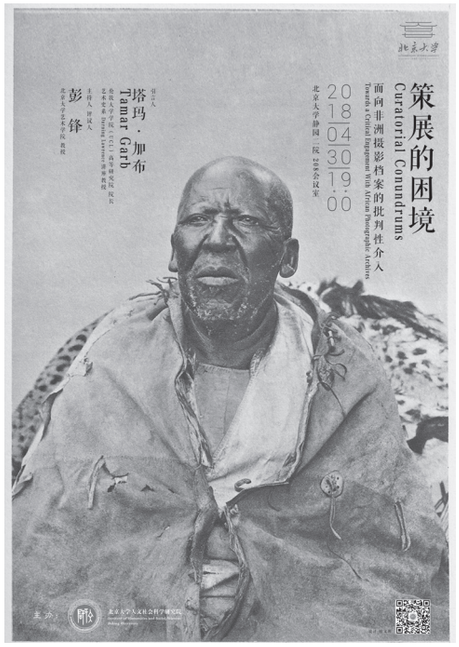
福索认为，摄影棚里的一切都是通过化妆、照明、服装来达到所需要的效果。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模仿原始图像，取决于服装和化妆品。福索希望真正成为他摄影中的“祖先”。与他相比，莫佛肯则希望复制“祖先”的图像。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通过照片表达复杂且有争议的身份的能力，并且通过讨论摄影史来审视照片提供的表现自我的策略。而照片背后的社会背景一经提出，就会使有关整个非洲档案的思考和研究更加复杂——“部落”和“现代”之间永远存在的矛盾也困扰着非洲人的叙述和讨论。

程莹教授认为，摄影艺术向历史档案的转变非常重要，并指出了一些当代摄影中仍然将欧洲作为美好向往的相似性。无论是“黑色相册”还是其他的照片，都是一种重要的视觉上的现实，更是摄影中的主体对自身认知的表述。程莹教授还提到，在近年的展览中，一些中国摄影师对非洲的陈旧甚至歧视的塑造已经引起了争议。这使人们反思，是什么影响了摄影师对于非洲的塑造？中国和非洲在这些照片之外又各自以怎样的方式塑造对方的形象？有关非洲当代摄影研究或可在这些问题上提供启发。

（撰稿：刘小雨）

塔玛·加布：绘画 / 政治 / 摄影
——马莱内·杜马斯、卢蒙巴夫人与非洲女性图像

2018年4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八九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绘画 / 政治 / 摄影：马莱内·杜马斯、卢蒙巴夫人与非洲女性图像”。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程莹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刘晨评议。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程莹老师简要介绍了加布教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讲座开始后，加布教授概述了画家杜马斯在现代艺术领域的造诣和研究价值，并展示《教师》和《孀妇》这两幅经典作品。二者都是基于黑白照片加工完成的油画作品，分别来源于私人家庭相册和新闻图片。杜马斯对原本黑白的画面进行了色彩强化和放大，覆盖并取代了照片的原始空间、意义和材质。

在分析《教师》这一作品时，加布教授提到，画面中站在女教师身后的金发儿童正是画家杜马斯自己。而在把“合影”这一朴素作品变成油画的过程中，杜马斯分别将原照片中右边和左边的两个孩子去掉，以便集中精力和强化构图——他们只是艺术家之眼的“牺牲品”。艺术家的首要职责在于保持画面的连贯性，而非记录或文字的重复。

接下来，加布教授将自己和杜马斯相近的个人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介绍了作品所属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她提到，作为在英国传统或殖民教育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基本都能复述出少年时期的相似图景。以班级合影情境为例，整个群体凝结如一体，以共同的服装和表情为标志，并受摄影师引导和控制。关于画面细节，加布教授挖掘出了体现她与杜马斯明显种族同质性的潜在线索。

加布教授指出，《教师》描绘了二十世

纪中叶南非的一间教室内的景象，同时，也折射出与语言、传统、肤色捆绑的共同体的孤立形态。在种族隔离制度盛行的时期，社区被合法地隔离开来，跨越肤色的社会融合不仅困难重重，甚至被视作犯罪。黑白摄影似乎就此与分离的制度归化相勾连，“漂白”了人们的皮肤，并将他们归为一体。

在加布教授看来，杜马斯的作品模仿了照片的格式，勾勒出背景物件和人物姿势的重复形态。同时，她拒绝原本平淡单一的色调，赋予画面丰富饱和的色彩。《教师》这幅画也强化了观众对画面的感知，借“教师”这一权威核心周围的对称要素揭示出群体生活的一体化，以及学校合影的过程背后，孩子们被精心设计的表现姿态。加布教授认为，杜马斯借此呈现了殖民地儿童视觉文化的历史特殊性。作为一位成年艺术家，杜马斯对原摄影作品中黑人与白人的童年图景进行了挑战性的重新塑造。

杜马斯对待原始图像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也体现在其他作品中。她对真实世界中照片的复制与改造既是一种政治行为，又是一种审美姿态，二者不可分割。随后，加布教授以杜马斯采用同样方式创作的《孀妇》为例，从摄影到绘画在场景边界、表达形式以及细节语言方面的差异入手，进行细致深刻的剖析。

在这幅作品中，杜马斯对原始画面进行了裁切，选取人群的一部分作为绘画的主体。加布教授认为，与绘画的触感和碎片化构图相比，原始照片是具有随意性的“报告文学”，而非仪式化的展示成果。它的符号力量并非预设出来，而是追溯性的。从表面上看，《孀妇》描绘了如下场景：一位裸胸的非洲妇女被两名穿着休闲的同胞护送着穿过人群。服装与赤裸、欧洲服装与非洲肉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人身上。杜马斯刻意去掉了他们的脚部，并将周围的其他人物进行了模糊处理，起到了电影或大型戏剧般的特写效果。

加布教授展示了《孀妇》取材的完整新闻图片，并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她提到，仅从作品本身就能清楚看出，油画取材于一个再现情境的信息源，延续了摄影的镜头构图和形状的色调排列，以描绘城市环境中进行的、特殊的公众游行。画面中央的女性也有着特殊的身份——她是被刺杀的非洲民族领袖、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卢蒙巴的遗孀。加布教授还列举了其他相关作品，介绍作者在创作时常用的艺术手法以及由此获得的独特表达效果。

更进一步的，加布教授解释了杜马斯选择这些素材进行创作的原因。她从《我们时代的暗杀》一书中注意到这些著名人物遗孀的身影，其中就包括了卢蒙巴夫人为丈夫哀悼的景象。加布教授援引了原文本的内容（“卢蒙巴夫人以赤裸作为哀悼的标志”），并认为正是此结论使得杜马斯以这种方式理解照片中服装的意义，即解除了寡妇的政治化姿态，完成非洲女性形象的人物归化。

这种对丧偶孀妇半裸形象的描绘实际覆盖了大多数西方媒体的态度，他们往往聚焦于卢蒙巴夫人举止与衣着所象征的特定文化属性。但加布教授强调，这类内容的摄影描绘实际并不反常，甚至能诉诸传统进行解释。时至今日，跨文化、跨区域的差异与不协调依旧是人类学或民族志解释的重要内容。

早在杜马斯之前，这张历史照片就已在艺术家的视野中出现过。年轻的杜马斯本就被艺术、政治、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所吸引，非洲孀妇的特殊形象乃至当时南非的特殊情况更进一步激发了她视觉上的灵感。大卫·戈德布拉特出版于1973年的《矿山之上》（On the Mines）代表着一种与真实事件相联系的革命性美学，为社会现实主义和报告文学的形式设置了黄金法则。简而言之，纪实摄影被视作具有揭露政客内幕、记录真相功能的媒介。

回归遗孀卢蒙巴夫人的形象讨论，加布教授认为，这种身体裸露的自我表现实际将她自己与周围的支持者分开，并由此对抗欧洲传统的着装与礼仪规则。对杜马斯来说，这种非洲女性特质的展示也为西方绘画原型的同质化和霸权提供了对照。除此之外，加布教授还介绍了围绕卢蒙巴之死展开的意识形态舆论之争。

接下来，加布教授展示了卢蒙巴夫人早期的家庭合影与个人照片，并将其与《孀妇》中的形象进行对比。她指出，卢蒙巴夫人曾是非洲女性西方化的缩影，却在公开哀悼的场合中回归了非洲式的哀悼姿态。她身旁同行的西方装束的黑人男子共同强化了画面表达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卢蒙巴夫人娇小而赤裸的形态反而充满力量。特殊的服装与动作暗示着有迹可循的悲伤与抗争，而非洲妇女的赤裸示威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愤怒的表达。直观的画面构成由此浓缩并传达了复杂的符号叙事。

回归杜马斯《孀妇》本身，加布教授再次就人物脸部的处理细节进行阐释。她认为，杜马斯选择将背景人物如白色面具般模糊，其目的在于模拟摄影时的聚焦，并展现紧张的氛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种族和性别的区分相关。与苍白的陪同者们相比，卢蒙巴夫人的面部和脖颈则被放置在沉重的暗色调之中，强化了对她身体属性的认知和稳固。

最后，加布教授进行总结：画家对照片的改造，并不完全是以非洲妇女的视角重述自己的故事。在面对学校合影等平庸的集体画像时，杜马斯表现了殖民地教室的统一性。而在强有力的史料面前，她无法不去扰动其习惯性的基础，原封不动地完成复制。卢蒙巴夫人的照片具有推动观众尝试着质疑与理解的力量。杜马斯的创作正是对历史照片的信息进行筛选，通过疏远和重建，使人们对熟悉的内容产生新的认识。

接下来，刘晨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议，并就其中的女性意象问题作延伸探讨。对此，加布教授提到，历史中的女性问题越来越重要，并已成为她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女性在历史研究中一度缺位，而今，随着女性视角的引入和发展，其在历史中获得了另一种解读机会。在回应听众关于女性身体暴露作为一种反抗的内在意涵问题时，加布教授认为，女性在公开场合展示身体的确不仅出于种族对立，同时也从性别的层面展示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塞尔柱教授也与加布教授分享了非洲生活的种种经历，并由此交流种族与社会传统的相关议题。

（撰稿：陈洁樱）

79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遭遇及相关看法（1868—1945）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日本”。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评议。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出席并参与讨论。

艾姗贝尔教授主编有《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遭遇及相关看法（1868–1945）》一书。这是一部论文合集，书名饱含深意。“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创造的概念，不仅在地理意义上将汉唐与罗马联系在一起，也引发了人们的全球性想象。因而，“丝绸之路”暗示了本书编纂的方法论指引。此外，丝绸之路在日本人心目中有文化和平的内涵，表达了日本与大陆的世界性联系，揭示出日本在全球视野下的位置。至于“政治和文化的碰撞与图景（encounters and perspectives）”，则是 19 世纪至 20 世纪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话题，体现于日本有关丝绸之路活动的各个方面（从考古到政治宣传等）。同时，日本人并不认为丝绸之路局限于东亚、中亚，而是将地中海地区也贯通起来。“欧亚大陆”意指全球史意义上的互动。

艾姗贝尔教授从五个话题展开她的讨论。首先有关大博弈（the Great Game）背景下的日本。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日本人也开始关注这一地区。1903 年至 1910 年，净土真宗僧侣大谷光瑞三次率队考察中亚，是日本思考丝绸之路的先驱。同时，他也是一位亚洲主义者，在上海写就《大谷光瑞兴亚计划》一书，提出亚洲各国共同组成庄严同盟的愿景。大谷光瑞的探索是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滥觞，其研究对象（语言、当地居民、田野考察等）对后人影响很大。官方层面，日本驻俄国大使西德二郎在 1870 年代探访中亚、新疆后，劝说天皇争取这片土地上的利益，并与俄国抗衡。这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效仿欧洲、逐渐走上帝国扩张道路的一个侧面。在此意义上，日本同时与英、俄、中三国展开角逐，参与到大博弈中。大博弈也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有所回响，是军事活动之外的形式。奥斯曼帝国拒绝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类似于 1838 年《英土商业条约》），在此背景下，奥斯曼政府以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经商的山田寅次郎等人作为“中间人”，与日本建立起非正式外交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艾姗贝尔教授没有使用“半殖民地”这个概念。她认为，奥斯曼是介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虚弱政府”。一方面，奥斯曼已经与欧洲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需要日本的力量与俄国抗衡，不愿开罪日本，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日本已经废除不平等条约，进入国际法体系，自诩脱离“东方”身份，并利用“大博弈”和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要挟奥斯曼。原本经商的山田寅次郎等人在两国关系间扮演的特殊角色，体现了奥斯曼与日本在外交上的某种特殊性。山田寅次郎本人是位出色的商人，借助时局、语言优势和身份便利，他将奥斯曼市场上流通的中国传统商品（如茶叶、丝绸等）改为从日本引入，占领市场，并获取巨大利益。山田寅次郎为我们提供了窥得在丝绸之路另一端日本人活动状态的窗口。

于是，日本与讲突厥语的不同群体、蒙古人、中亚穆斯林的地缘政治战略和联络网应运而生。情报人员与这些群体的活动是本书涉及的第二个话题。2007 年，情报巨头宇都宫太郎的日记由其后人在日本国内出版。宇都宫太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朝鲜的诸多观点，从军事角度认知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他的日记是艾姗贝尔教授这本书中《丝绸之路一端的福島安正和宇都宫太郎：泛亚视角与从奥斯曼、恺加到中亚的军事情报网》（*Fukushima Yasumasa and Utsunomiya Tarō on the Edge of the Silk Road: Pan-Asian Visions and the Network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from the Ottoman and Qajar Realms into Central Asia*）一文的主要原始资料之一。

宇都宫太郎是日本 20 世纪竞逐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军事战略设计师。由于日本希望争取同英、俄两国对立的中亚穆斯林（如鞑靼）的支持，其军事部署的相当一部分任务是在这一区域对日本进行正面宣传、与中亚穆斯林建立友好关系。日本也从中亚、西亚各国吸取政治经验。桥本欣五郎等人就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革命感兴趣，并认为日本应引以为鉴。因为凯末尔主义革命主要由军队领导，凯末尔本人也具有深厚的军事背景。另外，情报网也逐渐建立起来。福島安正在日俄战争期间负责对亚情报，他利用山田寅次郎等人打探俄舰动向，支持日军。

日本的举动得到了来自中亚、西亚的回应。鞑靼的泛伊斯兰主义者、记者阿卜杜拉希德·易卜拉欣（Abdürreşid Ibrahim）来到日本，率先展开俄国 – 中亚穆斯林与日本的联系。他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小松久雄合作，帮助建立日本与讲突厥语的亚洲穆斯林群体的联络网，支持鞑靼学生在伊斯坦布尔学习。后来，易卜拉欣成为了鞑靼人社群的领袖和东京大清真寺的阿訇。但鞑靼人穆斯林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毕竟鞑靼人并不是一个可以

完全自主的群体。比如，沙俄军队中的鞑靼士兵就用歌谣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怀疑。

接下来的话题是奥斯曼帝国与日本的跨国、跨地域交往。庞杂的人潮促进文化和科技交流，意大利裔英籍人士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伊斯坦布尔学会摄影技艺并将之传入日本。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用镜头记录暴力和死亡，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风格。比托留下了1860年东京全景的珍贵照片。这是一种更微观的角度，从个人的辗转沉浮和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透视文化技术在全球的传播。

讨论过政治、文化、科技之后，下一部分是日本人有关地中海和西亚活动的另一个维度——寻找新的自我。日本在学习西方之余，也派遣多人来到融合拜占庭、伊斯兰、波斯等多种文化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或埃及等地，尝试在世界性大都会和古老的文明之地寻觅现代亚欧身份。日本现代建筑师伊东忠太反对纯粹欧洲建筑风格，在其作品中融合了奥斯曼和印度元素。同时，他也建立起更能体现彼此相互影响的世界建筑史三环嵌套模型，取代弗莱切尔（Banister Fletcher）欧洲中心论的树枝状结构。芥川龙之介则置身唐代大都会寻找日本认同。他创作小说《杜子春》，希望能重返一个包罗万象、繁华多元的城市，并认为那才是丝绸之路的意义和辉煌所在。此外，佐藤雅子考察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传说的源流，富有佛道等多重色彩。至今，七夕节依然是日本的重要节日。

最后一个话题有关日本明治时期至二战之前有关丝绸之路和中亚的学术研究。这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时期，学术研究多出于军事考量，但丰厚的积累却为冷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探索和规划奠定了基础，中日两国也在此领域开展合作。突厥学始于欧洲。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著作《西突厥史料》在日本出版，由此，日本开始了突厥学研究。在欧洲影响之外，日本突厥学也有自己的传统，即源于对佛教的回溯。大乘佛教从印度通过中亚传到中国，后进入日本。但这并非仅仅对佛教的关注。橘瑞超是日本突厥学的第一位专业研究者，他认为，宗教将古代日本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其后的学者也通过中国古代典籍字句考证，寻找唐、突厥和日本的关联，区分突厥、土耳古（土耳其）等概念。

评议环节，昝涛教授从自己的学习经历谈起，他指出，关注日本，除了其近代的现代化成就、中日关系等重要维度之外，日本在其他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容忽视，比如在突厥学、中东－伊斯兰研究方面，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有很多相近的问题意识，中国学生在未来的区域研究中不能忽视日本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罗新教授提出，日本关注突厥也有可能是出于民族或语言角度的考量，有学者认为日语带有某些阿尔泰语系特征。作为艺术史研究者，加布教授则表现出对伊东忠太创模型的兴趣。

最后，艾姗贝尔教授同在场听众就民族主义运动、语言学、史料、比较研究、历史的延续性和国际秩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蔡雨珏）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全球化与土耳其的亚洲研究

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全球化与土耳其的亚洲研究”。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阿伊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持并评议。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敏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阿依莎·塞尔柱·艾姗贝尔教授

艾姗贝尔教授首先介绍了土耳其亚洲研究发展的时代背景。土耳其的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全球进程的产物。冷战时期，土耳其民众形成了消极的思考中国的思维方式，土耳其学者也只能依靠西方材料进行中国研究。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土两国相互增进了解，土耳其民众见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但仍难免残存些许的负面现象。艾姗贝尔教授指出，这是双方在未来的交往中必须超越的因素。

接下来，贝尔教授介绍了推动土耳其亚洲研究发展的经济因素。首先，土耳其与东亚国家经济交往在发展，其中，日本产品长期以来占据着土耳其总进口的约百分之三。80年代以来，日本在土投资额逐步增长。而归功于强势的电子产业，韩国产品在土耳其总进口比例也在大幅增长，该国电影也于近年来打入土耳其的市场。至于中国，出口产品以及在土投资额也在大幅增长，且中国的经济成功强化了土耳其民众对东亚模式现代化的积极印象。

至于土耳其中国研究的历史，艾姗贝尔教授表示，事实上，汉学研究是土耳其亚洲研究中最早开展的项目。出于重建民族身份的需要，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鼓励历史学家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的突厥人历史，而这段历史与中国历史以及汉文史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阿塔图尔克本人对汉学研究非常感兴趣。纳粹势力崛起后，千余名德国学者流亡到土耳其，其中就包括德国汉学家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埃伯哈德携带藏书流亡到土耳其，创立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埃伯哈德关注游牧民，他认为，历史上，中国边境地区冲突与商贸交往并存。艾姗贝尔教授指出，埃伯哈德带来了非常普世化（cosmopolitized）的中国历史史观，他对土耳其的中国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冷战时期，土耳其中国研究的发展受到限制，这种情况直至战后才有了新的突破。目前，土耳其拥有四所孔子学院，它们分别是：建立于 2007 年的中东科技大学（METU）孔子学院、建于 2008 年的海峡大学（Boğazici University）孔子学院，建于 2014 年的欧坎大学（Okan University）孔子学院以及建于 2015 年的耶迪特佩大学（Yeditepe University）孔子学院。此外，安卡拉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埃尔齐耶斯大学（Erciyes）建立有汉学系，海峡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等学校开设中国研究的硕士项目，欧坎大学和厄兹耶因大学（Özyeğin）还开设了中文翻译的本科专业。

土耳其还存有关注亚洲问题的智库，比如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组织（SETA），海峡大学、科齐大学（Koç）和中东科技大学各自设立的亚洲研究中心以及以土耳其著名古代中亚艺术研究专家埃梅尔·埃辛（Emel Esin）命名的埃辛基金会（Tek Esin Vakfı）。近年来，土耳其也召开了一系列和中国有关的研讨会。海峡大学与上海大学合办有土耳其—中国论坛（Turkey–China Forum）及“奥斯曼帝国与帝制中国的传教士”（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mperial China）专题研讨会等。土耳其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研究著作，如艾姗贝尔教授与涂逸姗（İsenbike Togan）教授、阿尔泰·阿特勒（Altay Atlı）教授合著的《在土耳其思考中国》（Türkiye'de Çin'i Düşünmek）等作品。

艾姗贝尔教授特别强调了土耳其学者的翻译成果。他们将涉及到古代内亚或突厥的中文古籍翻译成土耳其语，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普拉特·欧特坎（Pulat Otkan）教授在吉莱·费丹（Giray Fidan）教授帮助下完成的遗作——土耳其语版《史记·匈奴列传》。该书在土大受欢迎，目前已再版两次。费丹教授还将《论语》翻译成土耳其语并作注解。《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匈奴传》的土耳其语版也已问世。涂逸姗教授翻译了《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涉及到突厥的部分。

最后，艾姗贝尔教授总结道，土耳其中国研究的意义一直在发生变化。凯末尔时期，研究是为了建构浪漫化的突厥身份，而现在的研究则是为了建构普世性的土耳其民族身份。目前，土耳其的亚洲研究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虽然仍未走出起步阶段，却已发展出了“在土耳其思考亚洲”（Thinking of Asia in Turkey）的视角。艾姗贝尔教授认为，未来，学者们应进一步推进土耳其和中国共享的帝国与革命的历史经历、跨区域联系、互相认知、跨民族政治等方面的研究。

讲座之后，昝涛副教授进行评议。他比较了土耳其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并与艾姗贝尔教授讨论了土耳其人的“亚洲”概念。艾姗贝尔教授与魏敏副研究员讨论中国“一带一路”与土耳其“中间走廊”的对接问题。随后，加布教授与艾姗贝尔教授就土耳其在国际冲突中的自我定位交换意见。最后，艾姗贝尔教授与在场听众就古代历史认知对民众的影响、影响土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土耳其历史协会（Türk Tarihi Kurumu）的作用、台湾地区对土耳其亚洲研究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自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撰稿：陈功）

（二）未名学者讲座

29

闵雪飞：弒神诗人佩索阿——读组诗《守羊人》第八首

闵雪飞副教授

2018 年 3 月 28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闵雪飞作题为“弒神诗人佩索阿——读组诗《守羊人》第八首”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闵雪飞副教授提出了理解佩索阿的基本前提：佩索阿的诗强调感觉主义，读者必须直面文本，全身心地进入作者的历史时空去体会诗人的作品。因此，要进入佩索阿的世界，我们有必要化身为佩索阿同时代的普通人去了解他的一生。

佩索阿全名为费尔南多·安东尼奥·诺隔伊拉·佩索阿（Fernando António Nogueira Pessoa），生于 1888 年 6 月 13 日，卒于 1935 年 11 月 30 日。他在里斯本市中心圣卡洛斯广场（Largo de São Carlos）旁的公寓中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童年痕迹：在《黄昏印象》中飘荡在黄昏村落上空的钟声来自于家旁的殉教者圣母大教堂（Basílica de Nossa Senhora dos Mártires）的塔楼；《斜雨》第六首中的剧院和后院之间交织，起源于正对着居所的圣卡洛斯剧院（Teatro de São Carlos）。佩索阿的父亲是业余音乐评论家，常去剧院听音乐。然而，在他还小的时候，生父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带着幼子随丈夫移居南非德班。

在这里，佩索阿接受了标准的维多利亚式英语教育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 岁时，佩索阿回到葡萄牙定居。后来，诗人用异名写下《再访里斯本》（Lisbon Revisited）一诗，并在其中再次提到童年：“以更遥远的心，以更非我的灵魂”。从此，诗人定居于里斯本，直到最后因胰腺炎而死。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同样是英文：

“我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I know not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佩索阿曾表示：“我的父国是葡萄牙语。”那么相对的，英语则是他的母国——佩索阿在英语上寄托了特殊的情感。在他死后，葡萄牙政府决定将其葬在代表着大航海时代荣光的热罗尼姆修道院（Mosteiro de Jer ó nimo）。佩索阿的墓碑为一桩三棱柱，三面分别刻有三个主要异名的诗一首。

闵雪飞副教授认为，佩索阿的普通生活与其文学生活呈现出惊人的矛盾。总体来说，作为普通人的佩索阿，一生平淡无奇，充斥着虚无之感：他不曾拥有过成功的职业生涯，两次创业均以失败告终，基本上仅靠翻译英文商业信件为生；亦未受到过爱神的亲睐，终生未婚。

相比之下，其文学生涯却是波澜壮阔的。在佩索阿的文学背景之中，主要由英伦传统和古典传统构成，并未包含葡萄牙文学。他将自己的文学生活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青春期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接受教育；第二青春期居住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国度中，并受到了雪莱的影响；第三青春期则栖于希腊与德国的哲学家、法国的颓废诗人和瑞士作家诺尔道的思想之中。他曾经创造过一个前异名亚历山大·瑟迟（Alexandre Search），与另一异名阿尔瓦罗·德·冈波斯（Álvaro de Campos）一起寄托了英伦自我。

佩索阿在葡萄牙文坛内以叛逆的形象出现。根据其发表的《从社会学层面思考的葡萄牙新诗》，佩索阿对于葡萄牙文学有自己的创见，文学中蕴含的便是改造葡萄牙社会的热望。佩索阿认为：正如莎士比亚先于护国公克伦威尔出现一样，在每一个政治的高峰出现之前，必然要有文学的高峰作为前奏铺垫。而无论法国还是英国，但凡在文学上贫乏、不能体现民族精神时，政治上也相应地缺乏建树。而葡萄牙作为民族的存在，是与其“诗化存在”相生相伴的。目前，其诗化已经完全停滞。葡萄牙若要重获昔日的荣光，必须在诗学上寻找新的超越，要“扩大”、“荣耀”葡萄牙的诗化存在，实现“超卡蒙斯”（Super-Camões）。这一壮举依赖于一个“强大的人”（homem de força）——只有他才能实现“超越”。而佩索阿所做的种种文学上的努力，都是在为这个“强大的人”出现做出应有的准备。

闵雪飞副教授认为，“超卡蒙斯”意味着将已经被葡萄牙人奉为神祇的卡蒙斯赶下神坛。佩索阿将要重写卡蒙斯已经书写过的葡萄牙大航海，并予之以新的意涵，“使其能与我之所是相结合”。在此之上，佩索阿要通过神秘主义等方式创造出精神上的乌托邦——“第五帝国”，重新在思想上赋予葡萄牙民族以生命。这种精神构建的努力浓缩在其生前发表的唯一一本诗集《音讯》（Mensagem）中。诗人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待并重新审视了葡萄牙的历史，解构了昔日的神话，又再度构造了属于葡萄牙民族的新神话。

佩索阿对旧神的解构始于渎神。为此，他创造出了“出离的自我”——异名，赋予了他们各异的人格，并让这些异名组成一个不存在的异教徒团体。据佩索阿自述，在某一天突然感受到了神启，并写下了《守羊人》和《斜雨》。团体领袖阿尔伯特·卡埃罗（Alberto Caeiro）就此从佩索阿的身体之中诞生。闵雪飞副教授通过给出异名的代表作品，具体解释了每个异名的典型特征。在署名为阿尔瓦罗·德·冈波斯的《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中，卡埃罗就是异教本身。阿尔瓦罗·德·冈波斯是脾气上的异教徒，反叛社会对他的所有要求；安东尼奥·莫拉（António Mora）是异教徒的哲学家，提供哲学意义上的讨论；里卡多·雷耶斯（Ricardo Reis）是性格上的异教徒，一个有着拉丁“范儿”的老学究，追求古典文学的形式，对文明持有极端保守的看法；佩索阿本人则是“一团乱麻”，追求神秘主义。至此，佩索阿构建出了两组二元对立：佩索阿和卡埃罗代表了神秘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对立；冈波斯和雷耶斯代表了对文明反叛和保守的对立。

在介绍完佩索阿的生平以及基本的文学架构后，闵雪飞副教授解读了署名为阿尔伯特·卡埃罗的组诗《守羊人》第八首，进一步分析了佩索阿“渎神”以及重新建构新神的方式。

卡埃罗的诗大都运用感觉主义，通过简单的词语带给读者明晰的感受。感觉主义认为所有的客体都是我们的感觉，而艺术就是在把感觉转换为客体。因此所有的艺术就是试图一种感觉转换为另一种感觉。卡埃罗的诗即是在传达感觉，《守羊人》第八首伊始，读者就能看到“春末的中午”“梦”“照片”这样的话语，皆是在传达一种直观的感觉。诗人希望读能者拥抱感觉，敞开内心以体会诗。

《守羊人》一诗打破了一般人对于基督教的认知。通过亵渎神灵，圣父、圣母、圣灵被降至极低的位置。诗中的圣子离开了虚伪的天堂，抛弃了束缚于十字架上永远赴死的角色，重新变成婴孩回到人间。在孩童耶稣口中，圣父、圣母变成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形象：圣父是一个满嘴脏话的老头，常常随地吐痰；圣母则不知爱为何物，永远都在以织毛活消磨永恒。圣灵则完全变成了动物——一只鸽子。它总是用喙又啄又挠，栖息在摇椅上把线团弄脏。佩索阿解构了旧三位一体，祛除了基督教神不可侵犯的神性。

作为替代，圣婴和诗人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圣婴向诗人传授世间的真理，教他如何观察花朵，观察石头。石子就是进入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于是，他们就在房子前的台阶上用五颗石子做游戏。圣婴、诗人和全部的存在手拉着手一同走在路上，三者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玩累了之后，圣婴在诗人的臂弯中安睡，诗人遵循着一种充满洁净与母性的仪式慢慢脱掉圣婴的衣服。在这里，诗人实质上自比圣安东尼奥。他进入到圣安东尼奥的梦中，获得了圣婴耶稣的神祇，为重构圣三位提供了正当性。当诗人面对赤身裸体的圣婴时，人与圣婴、自然在象征意义上达成了新的盟约。至此，佩索阿建构出新的神话。

评议环节，周伟驰研究员发言。他表示，佩索阿的神秘主义具有神智学的痕迹，和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有几分相近。而阿尔伯特·卡埃罗（佩索阿异名）的诗中也有一些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相似的思想，即明显的反象征主义。反象征

主义强调直观经验、直观感受，反对宗教的象征主义和哲学上的种种术语，意图去除所有形而上的部分。周伟驰研究员认为，卡埃罗的思想可能受到了其他东方教派（例如庄子）的影响。在卡埃罗的眼中，生活就应该像行云流水一样，思想反而是一种“疾病”。冈波斯虚无主义的想法应该产生于尼采所形容的“上帝已死”之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人失去了上帝便不得不独自面对死亡，因而感到空虚、不安。冈波斯的《烟草店》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他所描述的状态。雷耶斯则以《棋者》为代表体现了其对完美形式的追求与审美偏好。

（撰稿：褚孝睿）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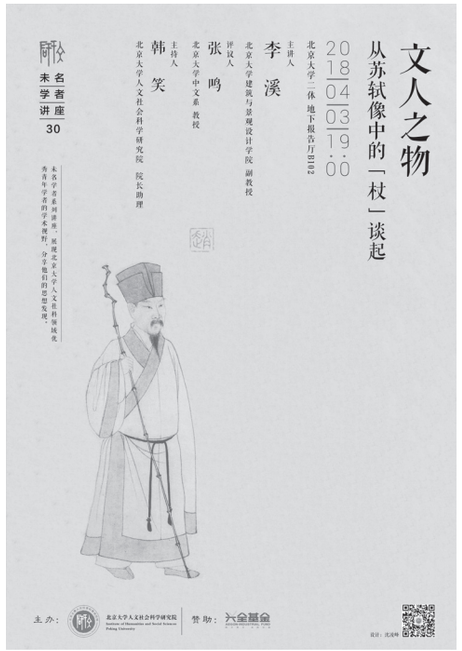
李溪：文人之物：从苏轼像中的“杖”谈起

2018 年 4 月 3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李溪作题为“文人之物：从苏轼像中的‘杖’谈起”的演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评议。

本场讲座以“杖”为切入点，谈论了文人如何对历史中业已形成了“物”的意义进行不断省思，从而涤洗出一种深蕴哲慧的“真实之物”。这种省思主要是在诗和画中完成的。这些文学和艺术“作品”并非是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再现——它表达的是“物”和人的生命相蕴荡的一种永恒的存在状态，或说通过一个“持物者”的形象、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格才能被最真实地呈现出来。

李溪副教授从不同版本入手，认为《苏轼像》在后世流传的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子瞻按藤杖坐磐石图》，现主要有清朱野云摹李公麟、翁方纲跋本；二是《东坡拄杖图》，最有代表性的是台北故宫藏元赵孟頫《前赤壁赋》本，为赋前小像；三是元代以后流传的《坡公笠屐图》，版本众多。

这三种形象都曾被认为是“摹李公麟”，而以艺术史的考证看，“笠屐图”应不是李公麟原作。但是，这只是历史的考据，而李、赵两位画家的苏轼像曾被李日华评为“非公麟不能作，非魏公不能摹，非眉山公亦不能发二公之佳思也”。“文人画”是文人根据对生命真意的理解而作，而文人画像更需要画家对被画者身上这一真意明晰的领悟和天成的表达。苏轼评李公麟《山庄图》时，说他“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又说在他手中的“物”既形于心、又形于手。这个思想可谓文人画的圭臬。绘画是直观的表达，必然会“留于一物”。李公麟以及赵孟頫的苏轼像又特别强调了“杖”这一物。那么，他们为何又是如何通过“杖”这一“物”来表达那个优游通彻的精神世界呢？这是本次讲座的主要问题。



李溪副教授认为，若要真正理解“杖”对苏轼的意义，要从他的诗词中看他对杖的态度。在苏轼黄州时期的诗中，杖已经具有了一种自由和自我的意义。这种看似“天成”的自由状态并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经历了“去蔽”杖的意义的过程。从形体上看，“杖”既具有可用性，也具有指向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天然就容易被权力所“利用”。

最初，杖只是作为单纯的用具使用，随着文明发展，在汉代以前的考古遗物和传世文本中则成为了权力的象征。一方面，它是西南地区传至中原代表祭祀和权力象征的器物；另一方面，中原的敬老观念本身又令其将“年龄”同“权力”结合，从而形成著名的王杖制度。武威汉墓曾出土了授予老人的鸠杖的实物，在其上悬挂《王杖》简中，明言“王杖”的效力，仅次于节，是权力鲜明的指示。但是，当年龄借助一个符号性的“物”成为僵化的律令时，它既以权力遮蔽了“物”的自身，也遮蔽了一个人“存在”于世的真性。年老应意味着经验累积而形成的德行，以及“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状态，而非一种被规定的权力。杖也应是扶助衰老而免于依靠他者之物，它是独立存世和自由精神的表征，而非彰显权力的符号。这一点，苏轼在送给弟弟的“黄子木杖”诗中曾明确地表达过。

李溪副教授表示，远在东晋，陶渊明的“策扶老以流憩”“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便已经显露出一个孤独又自由的身影；在唐代，白居易在“东坡”上“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屨”，晚年寓居时的“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则更加清晰地表达了“杖”所给予和断弃的生命状态。这两位是苏轼生命中的精神知己，对他的诗歌和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海棠》诗中的“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还是《东坡》诗中的“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锽然曳杖声”，都让人感到他在被贬谪流离生涯中对世俗名利的清醒，对独立人格的坚守以及对人在世状态的旷悟。

陶、白、苏三人对“杖”的观念，显然同他们钟爱的庄子哲学有直接关系。庄子“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正体现了杖和文人的相处方式，而那没有意图的“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也正是策杖文人要归去的地方——这一意义也鲜明地呈现在这几位文人的形象当中。李公麟在《归去来图》中对陶渊明“不在田园松菊，而在临清流处”的描绘奠定了其超然自立文人形象的基石，而这也是他图画子瞻的想法之一。元赵孟頫的《东坡拄杖图》也曾为苏轼《海棠》诗所绘，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在黄州时期的生存状态。

苏轼对“杖”的另一重认识来自其破除名相、截断思维的禅宗意旨，主要展现在他晚年被贬惠州以后的诗文中，这也是他同前代文人的不同之处。他在《和陶＜归田园居＞》中说“坐倚朱藤杖”，好友白居易则云“空倚紫藤杖”。这一意象可能受到了李公麟画的启发，但从根本上讲源于禅僧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形象。

在禅宗中，“拄杖”不止是一种用具，更是接化弟子的方式。临济宗义玄参黄蘗禅师时常被“拈起拄杖便打”，云门宗文偃则对弟子“拈起拄杖便问”。其打、其问，都是为了破除“名相”对世界的障蔽。在禅宗看来，杖可“尽十方世界乾坤大地”，这一“物”不是“某物”，而是整个世界、宇宙万物的呈现。

苏轼在《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中云“众中惊倒野狐禅”。这一“惊”，

李溪副教授

惊破了对名相与名物的执着，显现出超越万古的人生气魄。这样的气魄，在李公麟于元祐时期所画的《子瞻按藤杖坐磐石图》中已展露出来。后世文人在题此像或此像摹本时，亦已识得其中真意。北宋邹浩题“大海中央谁与邻，万事一条横榔栗”，又如金代赵秉文题“盘礴万古胸，入此一藤杖”。

接下来，李溪副教授以苏轼黄州时期著名词作《定风波·莫怕穿林打叶声》为例表示，在苏轼生命中，“竹杖芒鞋”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揭示他生命情调和人生旨趣的最重要的“物”之一。这些“物”与作为权力符号的鸠杖不同，甚至与在苏轼像中常常使用的母题“笠屐”也不同。它既不是一种身份的指涉，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事件的再现，而是真正地“进入”到了他的生命境界中，与其“共在”一个脱离尘梓而又逍遥无碍的世界。

而李公麟、赵孟頫以及后世文人画的作者，同样是深领其慧的诗人，这个隽永的形象被他们捕捉下来，成为了后世文人画像的典范。并且，一位踽踽独行的“策杖”者，或是默对远方的“倚杖”者，也是元代以后山水画中常见的身影。在沈周《策杖图》的层峦青嶂中，有一个笔墨渺小简要的策杖者身影，沈氏配诗“笠屐不限我，所适随丘墟。独行因无伴，微吟韵徐徐”。无论从画题还是配诗看，读者都无法了解此图所画何人，这看似不重要的“点景人物”，却是这幅画的意旨所在——作者要表达的是一个可以令“我”安居徐行而无所牵绊的泉石之所。

评议阶段，张鸣教授表示，苏轼的的一生是在颠沛当中度过的，而杖成为了这种生命历程的绝佳象征。张鸣教授还提到，有“杖”的作品均来自他被贬谪时期的名作。苏轼离开黄州去庐山时，发现很多山中人说“苏子瞻来矣”。于是，他在给山民写诗时把自己的形象写成“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应是有意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撰稿：李溪）

31

胡鸿：通往华夏之路——六朝南方山区的历史进程

2018 年 4 月 11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作题为“通往华夏之路——六朝南方山区的历史进程”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

讲座伊始，胡鸿副教授引用前人童恩正的研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南方进行概念界定。他认为，南方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气候为亚热带和热带，水系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耕方面以水稻种植为主、农渔猎并重，动植物资源丰富；交通方面水网密布，船的作用较为突出。南方可分为华南、西南与岭南，本次讲座所涉及的南方主要以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为主。童恩正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指出，公元前三千纪左右，北方为旱作农业，集中居住，战争和不平等社会现象比比皆是。相较之下，南方则以稻作农业为主，分散居住，处于部落社会晚期。受地理环境、信仰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南方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之后便进入停滞状态，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程度开始落后于北方。以水稻种植为例，南方在土地和水利方面都有一

定的条件限制，未能达到技术要求。

随后，胡鸿副教授以表格的形式将中国南北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对照。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南北处于平衡期；而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中原处于衰落期。自公元前2500年开始直至安史之乱（750年），总体上讲北方处于优势地位。唐代后期到北宋，南方得到极大发展，南北再次进入平衡期。北宋灭亡后，中国进入南方优势期，这一状况持续至今。而在六朝时期，北方处于优势期，且这种优势已持续较长时间。胡鸿副教授继而从史料出发就中原人对南方的印象进行分析。首先，在田土与物产方面，《尚书·禹贡》中说扬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在《禹贡》中所列举的田等前六名均是北方，南方都在末尾。从贡品方面来看，北方对南方有着极大的需求，同时也对南方物产有很深的了解。其次便是“南方不饥”的印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再者是南方人的“卑湿早夭”。《史记·货殖列传》云“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南史》也说“南方卑湿，三十已衰”。

鲁西奇曾强调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他认为，南方传统汇入统一王朝有几大关键节点：一是六朝—隋唐时期，唐代最初以关陇集团为主导，却在发展中不断南朝化；二是十国—北宋时期，十国保存了较多唐代制度，并最终影响了北宋；三是南宋—元明清时期。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揭示南方的独特性、主动性和建设性。

胡鸿副教授

在讲述了南方文明的独特性之后，胡鸿副教授转而分析南方山地族群的特征。他首先展示了中国的语言地图，并借用罗新的“海洋与孤岛”这一比喻来说明历史推进中的语言变化情况。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似乎是“孤岛”，而在过去，汉族语言可能才是“孤岛”。南方山地族群的文化更为分隔、多样，语言演变也较为复杂，类似于文化龛（cultural niche）的状态。虽然《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但在“蛮”的内部依旧有较多区别，礼仪和发饰亦可成为判别族群的标准。

南方山地族群在环境方面可概括为山居深险。《后汉书·南蛮传》说“槃瓠……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实是南方山地族群在为自己的居住地寻求合法性。而《抱朴子内篇·登涉》说“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可见山居的危险性。在政治方面，南方则可被概括为不被统治的艺术，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山地人群——他们不仅逃离国家，还设法在山中防止重复建国的进程。中国的秦汉时代，除了西南云贵高原的酋邦（滇、夜郎），南方其他地区仅存有中小规模的政治体，且首领是推举出来的，不采取世袭制，也因此不具备极大的强制力。

在明晰了南方山地族群的相关特点后，胡鸿副教授进而推进至王化与山险的层面进行分析。所谓“华夏网络”，即以州郡县等军政中心和交通线组成的网络，进而还包括在此地理空间网络中流通的物资、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在帝国中央权力的统一调度下，可以在某一结点集中广大区域甚至整个网络的力量。如果说北方的历史以农耕和草原的互动为主，那么南方便是山区和平原的互动为主。胡鸿副教授认为，“华夏网络”分隔了南方山地，且这种分隔可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分隔包围，这种军事行动成本较低。由于山与山之间的联络不及山与平原之间紧密，一旦山中出现紧急情况，周边平原可以联合起来迅速包围。其二是进一步阻碍大规模高级政治体的形成。其三是加剧山地经济的不自足性。

一段时期内，盐曾为国家专营。南方部分地区缺乏盐，因而需要同国家交换才能获得。“聘物以铜与盐”，在西南地区，盐一度算作较为贵重的物品。即使是在产盐地区，盐亦可被强力占据而无法获得。刘禹锡《莫徭歌》中又说“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可见，即使是距离文明较远的木客和鲛人，也依然需要同地上的经济体进行交换，“无所逃乎天地之间”，这也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河谷邦国的不同之处。

接下来，胡鸿副教授分析了六朝“华夏网络”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南方郡县网络日渐稠密，帝国重心也逐渐南移。依据常理推断，在六朝时期对于山区的管辖应处于加强趋势，然而从历史上看，夷夏格局却并非如此——山地族群势力（山越、蛮、獠、俚）更加强大，一度在局部的华夷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针对这一矛盾，胡鸿副教授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华夏网络”的断裂使得山区周围的平原不再能互相配合。“华夏网络”需要各州郡县的结点在交通地理方面相互顺畅联络，且要求各结点（尤其是距离集中点较为近处的结点）拥有支援他处的人力、物力及意愿。而在网络断裂时期，山地族群获得了壮大的机会。以桓中为例，习凿齿《襄阳记》中记录“桓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使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桓中”，而《三国志》称“（建安二十五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鄧、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魏将”一词说明，梅敷原已接受魏的官职，此时改投孙吴。八年之后，周鲂伪叛以诈诱曹休的密笺中提到“陆议、潘璋等讨梅敷”，可见梅敷又成为魏将。从地图上看，桓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位置，一旦平原交通路线断裂，山中通道便极具优势，能与各方保持交通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便是梅敷得以在魏吴之间反复的资本。

其二是山地人群内部政治体的演进。由于“华夏网络”断裂，各方争相拉拢山地族群。南北朝授予山地蛮人首领的官爵名号不断升级（如太守、郡守、刺史等），财富赐予亦倍增。而帝国的这种介入则改变了山地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一方面，通过授予官号和印绶，帝国逐步将周边族群纳入到华夏主导的政治体系中。《续汉书 百官志》云“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对比汉廷颁发给匈奴的印绶，我们可以发现，匈奴的印绶刻有本族官号，而对于山地族群的印绶则并未以汉字音写其原本称呼（如“汉夷邑长”、“蛮夷邑侯”等）——其实是将汉族的政治体系赋予山地族群。另一方面，外来的政治体也加剧了内部的阶层分化，使得等级区分强化。在华夏政治进入山地政治体之后，其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分化：一是生熟分化，即一部分接受帝国的印绶和赏赐，一部分则“不沾王化”；二是熟蛮上、中、下级的分化，即下层熟蛮在归附后渐渐成为编户或奴婢，负担逐渐加重，失去最开始轻赋役的优势，而上层熟蛮的政治地位却不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化并非不可逆，而是一条“双行道”。当国家赋役加重、灾荒饥馑时，一些人会逃亡成为生蛮或熟蛮，而当赋役优待时则可能归附。其他如蛮酋归附、战争俘虏等情况亦可能使其编户化，进入平原地带农耕。

随后，王铭铭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评议。他认为，胡鸿副教授以中国丰富的个案回应了斯科特的研究，内容丰富而精彩。同时，他也提出了三点看法或说问题：其一，从讲座内容来看，华夏化似乎变成一个负面的概念，而讲座题目似乎隐含了推崇之意。其二，胡鸿副教授的研究与华南学派的研究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华南学派讨论的是士绅和民众的流动，而胡鸿副教授则关注民族政治体制间的横向空间关系，不仅是上下之间的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似乎把华南学派的研究推进到了更早的时代中。其三，胡鸿副教授是否能从本地经验中提出一个同“并接结构”对等而又不同的概念？

胡鸿副教授回应了王铭铭教授的质疑。他表示，自己虽研究但并不崇拜华夏化。材料均为华夏的知识精英所书写，研究者只能从中寻求山地族群的侧影。华夏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很难为后者判定好坏，它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亦有不同。其次，华南学派中亦有对于族群问题的关注，如对于海岛的关注就与陆地中的山地存在某种相似性，二者的研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民族史的后半段也会涉及士绅和民众的流动问题，但是在前半段，相关材料较为有限。胡鸿副教授希望可以在未来涉及唐宋时期的地方石刻、文献等问题，而不仅仅局限在客位研究。再者，胡鸿副教授表示，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在通行的文化之下保留其他并行的文化，就像官话覆盖下的方言那样维持下来。

提问讨论环节，胡鸿副教授与王铭铭教授就中国是否曾存在过平等社会、羌人与南方山区族群的对比等问题一一做出解答或补充。

（撰稿：杨晓清）

32

卢白羽：进来吧，因为这里也有众神！——《智者纳坦》里的启蒙与宗教

卢白羽讲师

2018 年 4 月 17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卢白羽作题为“进来吧，因为这里也有众神！——《智者纳坦》里的启蒙与宗教”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黄燎宇评议。

本场讲座从莱辛本人面对启蒙和宗教所持的立场出发，对其代表作品戏剧《智者纳坦》中体现的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张力进行解读。卢白羽老师首先引入德国启蒙与新教传统之间的关系，并以启蒙为参照梳理了 18 世纪德国新教神学的三个派别——路德宗正统派、“新学”派和自然神论对启蒙运动的不同看法。启蒙运动与基督教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启示与理性的关系。莱辛认为，强行调和启示和理性的“新学”派危害性更大。同时，他还深入研究过最为激进的自然神论——在德国最著名的自然神论代表人物莱马鲁斯之遗作《对理性敬拜上帝者的辩护书》亦由莱辛匿名出版。莱辛出版莱马鲁斯残稿的行为在德国掀起了影响深远的神学辩论，即“残稿之争”。

这些残稿集中批判了启示宗教，而莱辛出版残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迫使“新学”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事实上，真正与莱辛陷入论战的却是莱辛原本有好感的路德宗正统派牧师葛茨。论战过程中，莱辛还附上了《编者的反对意见》，辩驳莱马鲁斯的观点。该文中，莱辛一方面承认启示宗教里仍然有理性无法理解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又区分了宗教的“精神”和圣经的“文字”，分别对应着圣经记载的“历史真理”和宗教蕴含的“理性真理”。他以此反对路德宗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唯有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由此来看，残稿作者攻击圣经以及从启示中得出的教义，并不会伤害到宗教的本质。

莱辛习惯于采用“文学”手法来思考哲学问题。在“残稿之争”的过程中，他的写作风格被葛茨斥为“戏剧逻辑”。莱辛的论战风格并非概念不清、头脑混乱，而是与他思考的内容相关：对于理性和习

传信仰而言，没有非此即彼的唯一答案，任何肯定的答案都会立即陷入教条。正如信仰一踏入社会领域就会变成启示（实证）宗教，共济会的秘密一旦说出口就不再是共济会的秘密，永恒福音时代一旦来临就不再是永恒福音。五、六十年代的莱辛认为，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能力，都拥有自然宗教的禀赋和履行自然宗教的义务。但是，与自然神论者不同的是，莱辛又看到了自然宗教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实证宗教。因为，我们认定宗教应该是公共事务，而自然的宗教不能在人群中以普遍而统一的方式来履行。那么，为了交流和沟通，必须就某些概念达成共识。于是就出现了约定俗成的符号、习俗，也就是实证宗教。

而莱辛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如果说自然宗教凭其自身就具备必然性的话，实证宗教里的这些习传事物和符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是我们赋予的。莱辛指出，各个宗教约定俗成的部分，就其必要性而言具有真理性，但就其对自然宗教的损害而言，又是假的。到了创作《写给共济会员》的时候（即“残稿之争”时期），晚年莱辛对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宗教、国家政制等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其本来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人福祉，也是个人达到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却危害到人对幸福的追求，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设计，它都是不完美的。“为了使人联合起来，为了通过联合确保幸福而发明的手段，反而使人隔绝”，因此，共济会员“顺带做弥合分裂、让人们尽可能紧密地一起生活的事工”，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弥合所带来的伤害。后来，莱辛遭遇审查，不得再与人进行宗教论战。于是，他转战文学战场，创作《智者纳坦》，试图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启蒙与宗教的看法。《智者纳坦》中的主人公纳坦正像莱辛笔下的共济会员，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的耶路撒冷，在这个因体制化的信仰而造成对个人幸福最大伤害的城市里，凭靠着他的智慧做着“弥合的事工”。

在勾勒了《智者纳坦》的创作背景和莱辛对传统的启示宗教及理性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后，卢白羽老师从上述视角出发，重点解读了戏剧主人公与几个次要人物的形象和重要的戏剧场景。卢白羽老师对主人公纳坦的第一个定义是“启蒙哲人”。作为启蒙哲人的纳坦首先破除了养女莱夏被圣殿骑士所救后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用“自然”（即“理性”）的方法为养女的神秘主义式体验做出了解释。同时，纳坦还批判了莱夏神秘体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认为这种宗教体验隐含着更大的危害，是一种“傲慢”。骑士的“行善”也被提升为目的本身，启蒙运动的理想，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普遍人性而非宗教归属的基础上看似得以实现。但后来，圣殿骑士的愤怒以及两个次要人物（基督徒修士波纳菲德和拜火教徒阿尔·哈非）的态度却反映了基于更高的理性认知的层面而达到的纯粹人性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困境。信仰普遍人性的纳坦最终无法抛下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卢白羽老师认为，若要理解纳坦言行不一致以及作者的立场，就需要对剧中的“指环寓言”进行解读。纳坦从寓言中三个儿子获得的三枚真假难辨的戒指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传统和宗教根本无法从理性上验证真伪，或者说，它们的重点根本就与真伪无关，而是关乎有益或有害。宗教总是与父母无条件的爱绑定在一起，而我们对爱的回应，不是考察其中的真理性，而是“忠诚和信仰”这种无涉理性的情感。这些情感既无法通过理性获得和争取，也无法通过理性来证明其真伪。当父亲让匠人做出两枚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戒指之后，不需反思的传承链条出现了断裂。唯一性被破坏的指环失去了凭其存在就理所当然拥有的威权，而我们与我们背负的传统、传承的关系也从毫无原则的顺从进入到一种更为自由的状态，这也为我们的伦理行为创造了更好的土壤。实质变成了“爱”的符号，需要我们通过阐释去获取它的意义。传统、宗教也是同样，它们已经失去了理所当然的权威，变成了爱的“符号”，需要我们通过伦理行为去“激活”符号中隐含的意义。这是指环寓言与伦理、与我们的行动相关联的结论。三兄弟没有扔掉戒指，其实就是保留他们的信仰，通过实际行动活出每种信仰里的真理。

随着戏剧情节的展开，观众发现，指环寓言中的三兄弟对应着戏剧中分属三大宗教的一家人：基督徒圣殿骑士、犹太教徒莱夏和穆斯林萨拉丁。戏剧在“全体无言地一再拥抱中落幕”，也是象征着因宗教而产生的隔阂终于在人类一家亲的团结之中得到弥合。然而，大团圆并不完美，纳坦并不属于这个大家庭。舞台上的纳坦孤零零地站在一旁，他抽离出这个家庭，也抽离出这个世界。在这里，卢白羽老师对纳坦的第二个定义是“沉默”。沉默的纳坦象征着宗教性的最后一个层面：超越理性和社会性的部分。这一层面的一大特征是它的私密性，这种经验在纳坦看来无法、也不能与别人分享。在这里，莱辛也承认有一部分宗教体验是无法进入共同体的领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神不仅是慈爱的、奖励善行的神，这个世界也并不是按照人的意愿而安排和设计的，总有一部分是人的理性永远无法达到、无法理解的，世界的残酷就属于其中之一。纳坦的苦难和控诉令人联想到旧约中的约伯。人的理性不是要追究苦难的源头、原因以及公正与否，而是要追问该如何正确地行为，以及在苦难之中或之后，个人该如何生存下去。卢白羽老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纳坦才能真正被称为“智者”。

评议阶段，黄燎宇教授表示，中国学界对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旗帜人物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他强调了莱辛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并认为国内学界（特别是哲学界）应该为莱辛正名。莱辛在面临难民危机的德国尤其重要，每当德国出现历史危机时就会上演《智者纳坦》。此外，黄燎宇教授还关心一个问题，即莱辛主张的宽容限度在哪里？以及这样的宽容能否关照包含无神论者的全世界？除此之外，莱辛与犹太人的关系尤为值得人们注意——他在剧中首次以正面形象塑造了犹太人的形象，并对犹太人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撰稿：曾悦）

33

郭永秉：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

郭永秉教授

2018 年 4 月 24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作题为“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敕瑞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平安评议。

郭永秉教授首先指出，新出土文献给先秦思想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的新材料、新知识和新问题，对研究先秦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战国秦汉简帛古书资料，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简、上博简等。这些材料，即使是有传本的古书资料，在内容上也经常出现与传本不同的地方，而那些更具研究价值和文献意义重大、在传世典籍中已不见身影的佚书则尤其珍贵。

参考陈寅恪先生、裘锡圭先生等人的定义，郭永秉教授对“二重证据法”偏好的概念予以明晰。他认为，近代学者多自觉使用的“二重证据法”是结合地上地下的材料，对历史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在先秦思想研究方面，亦是如此。陈寅恪先生将新材料比作残破的古画片段，将旧材料比作古画的大致轮廓（摹本），并认为复原工作需以摹本为根本，方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裘锡圭先生指出，古典学研究应避免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的问题，也是对“二重证据法”使用戒律的重要探索。但是，“二重证据法”在具体使用当中，常常会遇到相当多的复杂问题。

至于文本的解读困境，郭教授认为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古画残片的文本信息是否能正确、充分地提取；第二类是对古画摹本的文本信息是否能正确、充分地提取；第三类是摹本与残片能否相对应匹配；第四类是如果摹本与残片确定是匹配、关联的，但又存在内容冲突时，如何确定冲突的内容是否有价值——如果确有价值，又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到底是以摹本还是以残片为准，或者是两者皆部分正确、部分错误。

郭永秉教授首先针对前三类困境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对于第一种困境，他以《老子》中的“圣”“孝慈”等字和《论语》中“其舍诸”为例，通过孙雍长先生和李零先生关于“其舍诸”的争论，指出了今本和古本文本信息的正确提取方式。对于第二类困境，他以《庄子·天下》中的“亘（极）先无有”到“亘（极）无有”再到“恒无有”的误读和避讳改的“常无有”为例，讲述了自己对于古画摹本文本信息的充分提取过程。至于第三类问题，他则以《墨子》佚文和上博简《容成氏》为例，强调要避免两种简单化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为通过语词文句的二重证据简单比附，随意推导“碎片”的家派归属、思想属性；第二种倾向为为不认真细致阅读分析、统合研究“碎片”文本，夸大家派之间的影响、交融的一面，模糊歪曲“碎片”的定位。

针对第四类问题，郭永秉教授则结合自己的治学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先以《孔子见季桓子》中对待“邪民”的主张为例，对比《论语·为政》和《论语·颜渊》中的记载后指出，历史上就被拿来做“二重证据法”研究的传世文本本身有着极其纷纭的解释，而出土古书的解读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若使用“二重证据法”必须慎之又慎，不宜轻易根据文本的相似而作比附、申发，而应对所掌握资料的有限性做充分估计，并对“残片”与“摹本”做好切实的文本梳理、研究。

接下来，郭永秉教授以孟子到底是否批评过《性自命出》的讨论为例，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说。《性自命出》年代在孟子以前，反映的正是当时“天下之言性也”的情况，为破解《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提供了重要材料。梁涛先生在《＜性情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一文中提到：1998 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其中明确提到“交性者，故也”，因此，他将“性”、“故”联系在一起，并对“故”字作了专门解说。从梁先生的观点来看，孟子以前，人们往往将性、习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人虽然具有性，但需要经过后天的修习、培养。可以说，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观念，为儒道各家所承认。孟子有言“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应当正是对此而言的。但

对于所谓“交性者故也”的“交性”怎么理解，“故”如何有修习的意思，梁涛先生却没有讲清楚。因此，其说出后，有多人商榷、反驳。

裘锡圭先生在肯定梁涛对“性”、“故”的联系上加以补正。裘先生认为，释“交”的意见影响很大，但他否决了过去对“交”字的释法，主张此字应释为“室”（或下加心旁）。2003 年，经过反覆的权衡考虑，裘先生最终放弃把“室性者故也”读为“实性者故也”的选择。他认为应读为“节性者故也”，即在心性修养过程中，节性属初级阶段，且是比较被动的做法；“故”不大可能指节性的主体的主动行为，而应该指能节制人性的成例、规范、制度之类的东西。

郭永秉教授认为，两位学者的解释依旧存疑。例如，李世平等指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从文义上讲，孟子批评的是反对把“性”等同于“故”来阐释，且“室（节）性者故也”只是说用来“节性”的是“故”，“故”与“性”并不是一对对等的概念。李锐也认为，所谓“天下之言性”是泛论当时各种学说对“性”的看法，应有其共同性：如果“故”是指仁义礼智等规范准则，那么，对道家等而言，这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又怎么能包含在“天下之言性”内？况且裘先生认为“节性者故也”也是孟子所反对的，这意味着孟子反对孔子，似乎不妥。因此，李锐先生提出或该考虑用“实性”说来回避这个矛盾——就《性自命出》来看，这里所说的“性”，是指那个来自天命、天赋的“性”。

在梳理总结了前人的争论后，郭永秉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考证过程和理解思路。首先，从文字的训诂考据上，他认为释“室（或从心）”的意见恐难成立。《性情论》此字去掉“心”旁和所谓“宀”的部分，实难以看成“至”的简省。“至”旁在先秦古文字中有时确实可以简省，但没有例外都是把最下一横省去，但箭镞的两笔则不会省。他考究了战国简中的“至”字各种（系）写法，包括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望山简、九店简中的部分“室”字，以及郭店简的所谓“室”字的误摹问题。郭永秉教授指出，这个字应当是“亯”字（即“惇”字）的异体。《性自命出》的字形，就是“亯”字在战国楚文字中的一种最简化的写法。

至于《性自命出》中的“故”字，郭永秉教授认为，裘先生把字释读为“节”实际上偏向于制度、规范一类对人性加以框限的东西，比一般人理解得要窄。但是，因为其他学者对于“实性”“节性”等释读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所以对“故”的理解也就难以切中肯綮。如果简文是“敦性者故也”，那么，对“故”字具体所指，则应重新斟酌。他认为，敦，厚也、笃实也。“惇”字的常训也是厚，音义与“敦”同，《国语》就屡见“厚性”的说法。因此，郭永秉教授认为，“故”应指《诗》《书》《礼》《乐》，尤其是《诗》《书》。“敦性者故也”一句说的就是心性的修养与《诗》《书》等故籍的关系的，与孟子批评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没有联系。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郭永秉教授则回到《孟子·离娄下》二十六章的文本，通过解读朱熹、焦循、陆九渊、张岱年等人的思想进一步阐释道：虽然用来“敦性”的“故”是有为为之的，但这不应该是被孟子所反对的。孟子自己常常在阐说、论辩中引用《诗》《书》，甚至有时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根据自己对于人性论的判断加以删用解说。例如，在讲完仁义礼智四端之后，孟子接着说：“《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这为性善论找到了天生之“则”，因此“敦性者故也”不但不是孟子所批评的，反而可能应该是思孟学派所提倡的一种利用故志、故典对民性进行培育的观念。

最后，郭永秉教授谈到了自己的治学理想。他表示：在出土文献与传世古书结合背景下，研究先秦思想大有可为，可以在不少地方将过去的疑问看得更清楚，或者发现、解决新的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先秦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人们依旧有很多未知之处。对于这些文本，也还有很多没有充分消化的地方，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读、理解，并尽最大可能、实事求是地将残片和摹本结合好，达到合则双美的目的。他希望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多关注古文字研究；也希望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也将目光稍稍放开阔一些，多关注历史、思想、制度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宜固步自封。

评议阶段，胡敕瑞教授高度肯定了文字的训诂之功，并认为若文本没读懂，生发内容就会变得很困难。赵平安教授也对郭永秉教授通过经典案例来解释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思想史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积累深厚，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对“至性者故也”的解释引人深思。此后，郭永秉教授与赵平安教授就主题演讲为何采用“偏好”二字、“亯”把下部分省去只剩上部分是否确切以及考据中的汉语古声部等问题同现场听众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讨论。

（撰稿：熊晓晓）

（三）北大文研论坛

59

王绯思等：世界政治进步了吗？

王绯思教授

2018 年 3 月 13 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世界政治进步了吗？”。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绯思作引言，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士其、朱文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出席并参与讨论。

王绯思教授首先指出，要探究世界政治的进步与否，首先需要明确何谓“进步”。他认为，在世界政治领域，“进步”应当是指人类普遍的安全感增加，暴力活动减少，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走向稳定，财富总量增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公正，人与人之间在权利方面更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自由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他认为，总的来看，世界政治既有进步，也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或有倒退的危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十方面：

（一）人类暴力逐渐减少，但战争的毁灭力增强。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历史中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特例），目前参加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乱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低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王绯思教授认为，大范围的长期和平有可能实现：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极大转变，对战争的目的有了重新思考，大国之间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也降低了突发事件演化为战争的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在信息时代，网络战、太空战和其他新的毁灭手段所能造成灾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核战争。军事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人类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进步，甚至使其逆转。

（二）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为人类生活带来许多好处，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使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但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三）世界物质财富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18 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此后的工业革命促使世界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速相比更快、更难以逆转，是一种进步。然而，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暴力革命等事件，就会发生大逆转、负增长。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意味着人类的总财富和平均财富在持续增长。不过，财富的增长永远也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满足人类需要。

（四）人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严重。在过去 25 年里，人类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人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妇女和女童、农村居民、原住民、少数族群、残疾人、季节性劳工、难民等等，都是世界上贫困、被边缘化、易受伤害的人群。如果不消除根深蒂固的发展障碍，包括歧视和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各国、各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公正平衡的调节器的作用，有的政策甚至加大了收益分配的失衡。如果说财富增长代表人类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至少部分抵消了这种进步。再者，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挑战：超过 3 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儿童。可以说，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不均状况是史上空前的，而人口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不平衡。

（五）全球化不可逆转。王绯思教授认为，回顾远古以来的历史，实际上亦是人类群体交往越来越多、世界越变越小的全球化进程。当代的全球化推动了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过去相互隔离的状态。从这一层面上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损更多，前进道路上所遭遇逆流的大小和多少，以及人类是否有能力纠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六）在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自由在某些方面

也受到更多约束。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国内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而人们享有的言论自由等权利，一方面在技术上很容易受限于政府和社会的监控，另一方面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有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

（七）以法治、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结果，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多样化。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和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巩固。需要注意的是，建设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实现法治、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并非只有一种范式，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实现。总体而言，现代国家体制不会再倒退至过去的皇权专制或是殖民帝国体制。但是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必须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

（八）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主权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独立国家的出现远远多于国家的合并。民族分离主义此起彼伏，将推动更多国家的产生。

不过，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民族主义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和国家团结是必要的，但它却只能凝聚内部，不能吸引外族，不能增加自己对外的软实力。比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以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却难以引起共鸣。近年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民粹主义相融合，形成了对自由主义的强劲挑战。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可能是现阶段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在这场思想冲突中谁胜谁负，尚待长期观察。

（九）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人类的宗教信仰不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消亡。同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安全感、社会公正、平等与信教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也没有明显的关系。事实上，世界各个主要宗教都比民族国家稳定得多，寿命长得多。但是宗教只能凝聚相同信仰的教徒，却排拒其他宗教。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问题只在于这种冲突是否演化为大规模暴力。

（十）全球政治体系有望继续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的建立由村社到城邦、封建国家、帝国体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后，不再有完全无序的地理区域和功能性领域。局部的政治失序经常发生，但全球政治体系总体上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然而近年来，大国地缘政治争夺愈演愈烈，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冲突时起时伏，尤其在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肤色不同的族群被迫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愈发困难。未来的全球秩序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最后，王缉思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另一方面，“公正”和“信仰”也正在变成新的两大主题。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两大问题，世界政治的进步便是有限的，甚至可能倒退。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依旧需要研究者开拓视野，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王缉思教授的发言结束后，几位与谈人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包刚升副教授首先从危机切入，回应王缉思教授论及的民主问题。他认为，民主、法治和民族主义的趋势在西方是相关的。全球民主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二老一新”问题——税收与贫富差距问题和族群宗教文化多元主义问题。民主政体的运转高度依赖公民共同体的构成和体制，而目前西方社会同化移民的速度慢于其移民人口增加的速度，移民人口不能被充分同化，或者同化速度不够高，公民共同体的构成及政治文化发生变化。包刚升副教授继而指出，民族主义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现实主义。西方从 1945 年到今天大约 72 年的时间中，自由的道德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基本上是社会的主流氛围。然而，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并不能解决当今的挑战。包刚升副教授认为，西方需要转向更现实主义的方向，而民族主义即是现实主义的呈现形式。民族主义是一种很有力的动员手段，至少能抓住社会当中大部分人口，把握好这个方向对西方国家和世界走向非常重要。第二个难题是新兴的民主政体能否解决好转型、巩固和治理绩效的问题。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转型顺利，但仍有三分之一遭遇挫败，总的来说喜忧参半。新兴国家能否用好民主方式去解决问题，涉及到世界对民主政体的信心。

随后，包刚升副教授针对宗教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所谓宗教的复兴主要是伊斯兰教的复兴。19 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总体上西方占优势，伊斯兰教一方处于被动局面。而如果伊斯兰世界寻求改革和世俗化，则会被认为是倾向西方，对内无法实现自我革命，对外又无法和解，陷入难以超越的状态。包刚升副教授担忧，伊斯兰教的复兴可能存在一种困境：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动会导致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处在一种难以自拔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而如果出现这样的格局，人类的迈进便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包刚升副教授谈及了全球化不可逆转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与商品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宗教的全球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全球政治的分歧本来就存在，但是过去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矛盾不易激化；当今全球化要求在技术、经济和人口方面实现全球融合，但分歧并未因此解决，故而全球融合和全球分歧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加突出。

针对世界政治进步与否这一问题，朱文莉教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她倾向于悲观的态度，认为政治的退步是可能的，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甚至可能会进入倒退模式。朱文莉教授认为，民族民粹主义可能会战胜自由主义有三个依据。一是由于自由主义的胜利成为了自己本身的敌人。在和平与发展方面，自由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财富的聚集并不能带来公正的

分配，于是出现了许多反弹。二是技术的两面性，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颠覆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第三个因素来自于分配，财富向最顶层的百分之一聚集，连次高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中没有进入百分之一的部分也被抛在后面，造成非常严重的资源、财富分配不均。朱文莉教授认为，如果民族民粹主义胜出，则很难完成和平发展任务，也不能完成公正的任务。历史上，民族经济没能像全球经济时代那样积累财富、改善经济状况，民粹政治也大多以失败告终。民族民粹主义会制造分歧、分裂和歧视，实际上是非理性的。如果非理性的一方在二者对垒中胜出，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不乐观的。朱文莉教授进而分析，虽然有诸多因素推动，但是民粹民族主义的胜利距离成为现实仍有一个过程。她认为美国虽然存在来自于非理性情绪的挑战，但是也有强大的根基支持，因此对于美国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而对于欧盟，朱文莉教授则表示谨慎悲观。欧盟的经济定位错误，政治定位模糊，文化定位也有极大的问题。在 2015 年难民潮到来时，欧洲政客没有正确区分难民和移民，带来极大影响。如果欧盟失败，美国谨慎乐观的前景无法实现，那么在短期内便有可能进入“倒车”模式。

刁大明副教授认为，国家本身出现了“倒车”的情况，但也开启了另外一种可能进步的窗口。当今是一个“加速时代”，其特点是全球化和技术提升。社交媒体的出现，分散和解构了话语权，带来政治文化的突变，进而导致政治文化的变化速度大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化。而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便是既存体制能否适应或回应这种变化。美国的灵活性过剩虽然助长了加速时代对这个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美国长期以来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特朗普在体制框架内用美国反对美国，实际上也给了美国一个重构自己角色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影响美国人抛弃分歧，共同寻找解决道路，推动美国的下一次进步。

唐士其教授指出，世界政治是在进步，但未来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应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他强调，人类对于政治的认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政治当私有财产，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变成公共服务的平台，现在或许处于过渡阶段，但已经不可能回到第一阶段，这是进步的体现。再者，二战以后，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成为政治的基本目标，越来越多公民受到尊重，人们不会被随意奴役、杀戮；这亦是政治的一大进步。最后，自由主义的基本点在于保障政治权利的绝对平等，而在面对难民问题时，自由主义没有办法回应平等待遇的要求。所以说，自由主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困境。因此，我们要明确政治进步的标准，但也要找到处理危机的方式。

随后，与会者与听众又针对世界政治进步与否、美国政治危机和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袁明教授作总结发言，她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这样的大问题，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世界政治变化，展开更开阔、更深入的研究。

（撰稿：杨晓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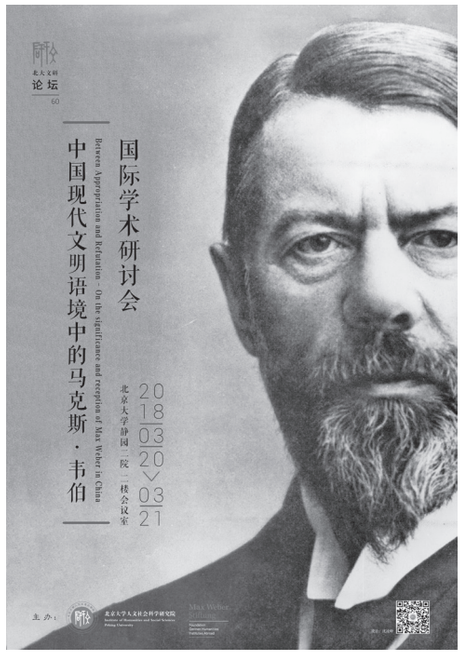
60

凯斯勒、苏国勋等：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

合影

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本次研讨会由文研院与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共同主办，来自内地、港台、欧美的近二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主席叶翰(Hans van Ess)、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以及德国驻华大使馆科学部参事延思·霍夫曼（Jens Hofmann）致开幕辞。

论坛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苏国勋首先介绍了他接触到韦伯学说的过程。1978 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学习。同班只有两名研究生，其中一位在“马克思主义人道化问题”的语境下以尼采为课题做研究。苏国勋教授则研究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在被《儒教与道教》深深吸引后，最终选择以韦伯作为研究对象。随后，他以“马克斯·韦伯思想在中国”为题概述了韦伯思想东渐的情况。上世纪 30 年代，郑太朴先生翻译了韦伯《社会经济史》一书。此外，前几年北京大学在整理燕京大学旧物时，发现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80 年代起，随着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国内对韦伯的译介和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韦伯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弥合行动与结构的冲突，其次是多元因果分析。而韦伯学说确实也存在瑕疵——《儒教与道教》受条件限制，在历史事实和文本上有些讹误。对此，我们应当更加关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



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蔡博方概述了韦伯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文语境中的继受状况及时代背景。中文学界很少直接由德文原版翻译韦伯著作，转而参考英语学界的译本。因此，对韦伯的翻译、理解或多或少会受到英语学界的启发与局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的发言题目为“略论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对家产制官僚的界说及其与中国之关系”。从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者的观察来看，漫长的帝制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巨大张力，而致力于历史比较的韦伯学者似乎强化了韦伯对中国如是观。但韦伯关于家产制的支配社会学论述，恰恰没有提供对传统得以生成的解说。韦伯提供的是专注于占有的家产制双轨制这一普遍矛盾，以及非常特殊的“破解”方案——采邑制的说法。即使韦伯自己也暗示，以此双轨制为基础的家产制，如果没有充足的、对中国传统生成的思考和检讨，那么很难直接判断 20 世纪早期中国学者的一系列焦虑，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尝试将支配与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的论说结合起来的出发点之一。

歌德学院东京分部马蒂亚斯·冯·盖伦（Matthias von Gehlen）则从韦伯对古代中国添置不动产的讨论切入，将其与西欧比较。东亚深受儒家伦理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该受到限制，但追求不动产的倾向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种关联不能被视为一般规律。至于当前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冯·盖伦认为，企业内部严格论资排辈等因素或许可提供部分解释。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费瑞实（Thomas Fröhlich）表示，在《儒教与道教》中，儒家精英的世界观被称为“彻底的现世乐观主义”。韦伯关于儒家的研究历来争议不断，而这一诊断却很少受到重视。实际上，它对于理解韦伯如何比较中西现代性道路至关重要。韦伯的“现世乐观主义”概念固然存有瑕疵，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性究竟该被“乐观地”理解为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驱动的事业，还是该被“悲观地”视为主体失势、渐渐被“铁笼”束缚的历史进程？

德国马堡大学教授德克·凯斯勒（Dirk Kaesler）表示，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勾勒了一幅“文官支配”的理想图景。其中，文官资枯主要由通过科举考试的次数决定，而非祖荫。教育是社会声望与政治支配的唯一尺度。作为也许这恰好契合韦伯——一位德意志帝国治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韦伯勾勒的图景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我们固然应该阅读韦伯，但当今的困局需要自己去另寻出路。

至此，第一天会议结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作主题评议。

会议第二天，首先发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王楠。他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篇论文出发，切入韦伯有关伦理人格和生活样式的讨论。在他看来，韦伯相信现代人必须将理想和主观追求放入日常的伦理实践之中，培养自己的伦理品质。这样，在集体的共同生活（教派）中才能够形成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在韦伯后期，他会把这种内在信仰构成的实践激活力放在世界诸宗教的比较之中。在两次演讲中，韦伯要求现代人考察这些理想可能的现实后果。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叶翰（Hans van Ess）的兴趣点有二。其一，韦伯关于儒教的论述到底有哪些是可靠的？其二，我们该如何看待某些学者对韦伯的回应？正如韦伯论及的新教伦理在欧洲和北美的效果那样，这些学者认为儒教也是一套可以促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系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表示，儒教中的“超越性问题”是韦伯、雅斯贝尔斯和沃格林的共同问题。韦伯认为，中国的外部社会条件看似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缺乏必要的政治结构和法律环境来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从比较宗教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儒教缺乏新教那样的“超越性价值”，而这一价值对资本主义

苏国勋教授

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Hoyt Tillman)则以余英时和黄进兴为例，阐述中国学者回应马克斯·韦伯儒教研究的方式。受韦伯式问题的激发，余英时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试图表明儒家伦理能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提供动力。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教授阎克文在发言中概述《经济与社会》各部分内容，并澄清了几种常见的误解。例如，韦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曾自称为社会学家。因此，我们不该只在社会学的框架内狭隘地理解《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

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借助施路赫特等人编订的韦伯全集版本，细致梳理了韦伯《经济与社会》的写作过程，并据此分析韦伯作品中的不同层次（尤其是《儒教与道教》与《经济与社会》）的内在关联。

中国旅德学者王容芬的发言题目为“现今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王容芬老师表示，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在他看来，政治家需要负责任地行事，而非严守“登山宝训”。这一演讲对二战后的德国政治家（诸如特奥多尔·豪斯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影响深远。然而，两德统一后，韦伯所言的政治家责任伦理被新一代抛在脑后。

论坛最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分析了韦伯另一篇著名演讲——“科学作为天职”。他通过介绍韦伯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对话，揭示了韦伯笔下学术生活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应对大学的“美国化”或“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卡勒尔等新浪漫派对神秘体验的狂热。学者应该谨守理智的清明，并与自己的政治激情保持一定的距离。随后，渠敬东教授抛出了两个问题：韦伯所提出的要求是否过于压抑了他本人对学术的激情？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与行动生活(vita activa)的关系？

至此，历时两天的研讨会在开放而又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撰稿：吉砚茹）

61

和田春树等：日俄战争、东北亚与世界近现代史的转折——《日俄战争》新书研讨会

2018年4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日俄战争、东北亚与世界近现代史的转折——《日俄战争》新书研讨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主讲，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主持。文研院四期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高士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三联书店联合主办。

论坛伊始，翟德芳对《日俄战争》一书的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1904至1905年间，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为主要战场，打响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日俄战争。战争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双方伤亡达五十余万人。这场战争是东北亚乃至世界近现代史上非常关键的历史事件，也是日、俄、朝、中四国各自历史发展或明或暗的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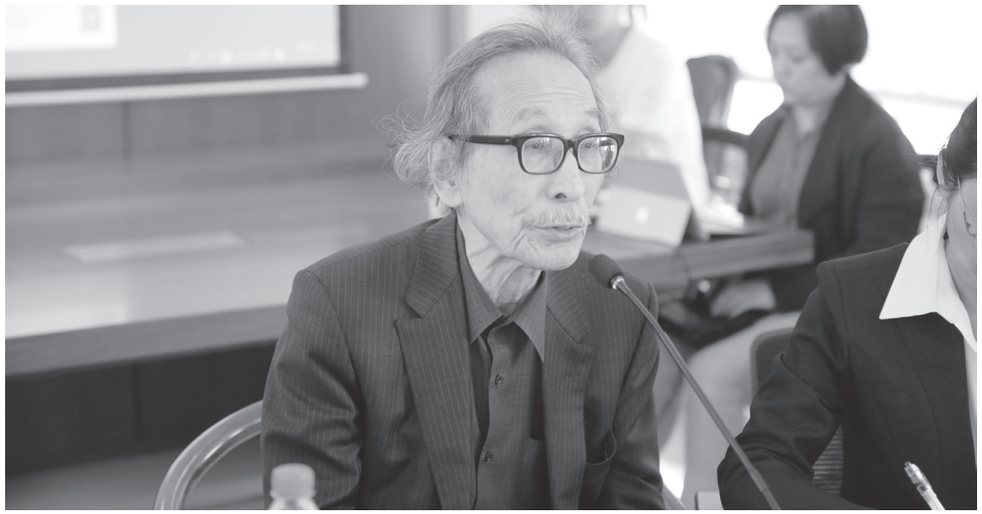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东北？它与朝鲜、中国以及当时其他的殖民地国又有怎样的关联？在全面调查日本、俄罗斯、韩国资料的基础上，俄罗斯史与朝鲜史专家和田春树教授出版了这本学术巨作，全面地呈现了这场战争的错综起源，以及开战前一年与战争第一个月的历史全貌。

随后，和田春树教授发言。他首先介绍了撰写《日俄战争》的初衷。在日本国民意识中，日俄战争是一场被美化的战争。近代日本的观念诞生于明治时期，然而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国民才开始建立国民身份，树立国民意识。因此，要修正日本国民的日俄战争观是很困难的。但是，日本要在东北亚地区长期发展下去，这件事情又是必须要做的。

司马辽太郎所著的《坂上之云》以日本的主体性描写了日俄战争的实质。和田教授通过对这部作品作批判性研究，围绕日俄战争展开了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脉络。和田教授认为，在研究日俄战争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朝鲜的存在——而这在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中被忽略。因此，和田教授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详细描写朝鲜和俄罗斯的动向。

至于明治维新的成果，和田教授也与司马辽太郎观点向左。他表示，早在1880年中期，日本就已经对朝鲜半岛存有野心。在日本，当时的普遍观念是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有野心——若俄罗斯占领朝鲜，日本的独立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日本必须进军朝鲜。

然而，这种维护独立的观念将日本的野心伪装了起来。事实上，俄罗斯开始支持朝鲜半岛独立。日本外交官在1890年代中期



和田春树教授

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既不想控制朝鲜，也不想和日本一起在朝鲜半岛分割而治。所以，如果日本能够强势出兵朝鲜，就能够控制朝鲜半岛。因此，日本计划在 1903 年日俄双方展开谈判时，若意见不被接受，就展开战争。而此时，正是战争的最佳时机。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控制朝鲜半岛，还将目光“瞄”向了南满洲。最终的结果是，满洲被俄罗斯控制，朝鲜被日本控制。而实际上，对日本来说，占领朝鲜是理所当然的——便于之后进军南满洲。所以，战争因日本长期觊觎并入侵朝鲜而肇始，最后发展成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展开战争，其结果是俄罗斯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权益。

日俄战争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战争只发生在日俄双方，但它对全世界（包括朝鲜在内）都有很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交互的、多面的。

日俄战争为俄罗斯带来了第一场革命。俄罗斯的革命派对日方取得胜利表示欢迎，列宁尤其如此。在 1905 年旅顺陷落之后，俄罗斯爆发血色星期日革命。但是，第一次革命未能彻底进行，而第二次革命直到 1917 年才发生。

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复杂的。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派（如孙中山）对这场战争的结果持积极的态度。但在日本占领朝鲜之后、开始进军南满洲时，孙中山也意识到了日本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桥梁这一严酷真相。

总体而言，日本的胜利确实是“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但这只是事情真相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在看待历史时必须看到历史的整体面貌。来自越南的留学生们，一开始也对日本抱持期待心情。但在看到其侵略行为后，期待幻灭。中国人可能也是同样的心情。

随后，汪晖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几点体会。首先，这部历史著作不止讲述过去，同时也试图与所处的时代对话。和田教授以重新叙述日俄战争的方式检讨战后日本史观。作为确立日本现代主体性和国民革命的重要开端，日俄战争被凝固成一种历史记忆。战争、历史记忆和现代主体性之间相互关联，因此，批判战后日本的史观并不容易。

其次，和田先生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将日俄战争的架构从朝鲜延伸至满洲，实际上是将朝鲜放到了整个日俄战争的脉络之中。肇始于朝鲜的日俄战争与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之间构成了纵向的解释脉络。在今天，朝鲜半岛又处于紧张的时刻，我们可以将朝鲜在整个帝国历史中的战略地位为参照，揭示其背后的地缘政治意义。

汪晖教授也谈及日俄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战争爆发之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主流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欧洲人道主义社会民主派的“破产”——大国不再有可能以均势实现和平，过去的维也纳体系也无法维持世界和平。与此同时，这也成为他们转向革命的重要契机。因此，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脉络见证着帝国均势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也见证维也纳体制破产的过程。日俄战争是开启世界性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亚洲觉醒的革命序列来看，从 1905 年的俄罗斯到波斯、土耳其，再从中国到 1917 年的俄罗斯，这形成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格局。

汪晖教授认为，若要重新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日俄战争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中国民族革命转向成为压倒性的新潮流便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田先生的研究为中国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机会。

沈志华教授借日俄战争往后的历史考察日苏关系的变化。他认为，20 世纪以来，在任何一个双边关系背后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国际背景。日俄战争之后，三个转折点“定格”了日苏关系。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 1938 至 1940 年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关东军想要继续北进攻打苏联，这一战略行为威胁到了斯大林，张鼓峰战争使之进入僵局。事实上，迫使关东军放弃攻打苏联的变化发生在欧洲，苏德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 年，苏德签订秘密条约。然而到了 1940 年，苏德就瓜分欧洲的线路发生了分歧。希特勒实施入侵苏联的计划，这一举动使得世界局势再一次发生变化。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再度紧张。与此同时，日本也因关东军的失败使得海军得势，与美国开战——这促成了苏联加入英美同盟国。

第二个转折点是 1945 年。英美为减少在日陆地作战人员的损失，想要苏联参战。双方达成协议后，美国甚至同意苏联在日本本土登陆。转变发生在投放原子弹以后，美国拒绝苏联参与对日作战，日本本土也不能让其插手。然而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在后续的谈判中，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半岛进行划分。但由于优势不在，苏联排除了对日本战后问题的处理。从此，苏联和日本脱离了彼此间的接触。

第三个转折点是 1955 年。1953 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希望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然而在 1955 年协议将要达成之际，美国介入并干预。美国分别与韩国、日本以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达成日美安保条约、美韩条约

及美蒋条约。在东亚地区对中国形成包围。1955 年以后，亚洲格局基本定格，美日韩同盟、中苏朝同盟，且双方互不来往。

接下来，孙歌教授发言。她认为，历史学与现实有一种断裂的连接。一个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回应同时代的课题是一个分寸感强的问题。同时，她注意到了《日俄战争》一书的几个鲜明特色。

首先，《日俄战争》讲述的是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与过程。孙歌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尽到的、最大的本分。只有当我们讨论一个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才能知道它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其次，和田先生在讨论日俄战争这一具体历史过程的时候，关注的是作为结构性的历史本身。在这一结构中，日本挑战了强大的俄国，并且以“有色人种”这样的身份战胜了白人的帝国，打破了当时的国际秩序。将这样的真实相对化之后，我们看到了另外的真实。比如，日俄战争的胜利作为一个积淀下来的、被传媒不断复制的民族国家记忆，在 20 世纪的日本历史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孙歌教授表示，1941 年底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与日俄战争胜利这样一个集体记忆至少存在一个潜在的关联。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20 世纪是一个帝国主义战争与改变国内秩序的革命相交错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对这样的历史进行复杂的辨认和分析？学者在谈论战争及革命的时候都会以国家、民族为单位去定位整个暴力事件。然而，和田先生的书能够帮助我们进入这个暴力过程本身并认清事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强烈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交织时进行决策的。有时，甚至需要借助一些偶然性事件推动整个历史进程。

如果我们承认 20 世纪是帝国主义与革命重新打造人类秩序的时代，那么，21 世纪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孙歌教授认为，这才是战争研究中最根本的课题。

接下来发言的是王中忱教授。他首先评述了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一书。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叙述非常深刻地浸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司马史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晦暗的昭和、明亮的明治”，《坂上之云》是其代表。和田先生以严谨的历史学家态度来对抗这种已经成为共识的历史认知，令人敬佩。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和田先生在这部巨著中所叙述的不仅是日俄关系，更是世界史的事件——牵动了整个东北亚地域政治格局的大事件。王中忱教授由此联系到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后者更多地是在一个国家的格局内部、一个线索里来讨论，对国际性事件关注较少。

试举一例。《日俄战争》一书细致地写到俄罗斯在 1900 年利用义和团事件出兵满洲，要求签订俄清密约却未能达成的事件。中国的近代史叙述会较多地强调中方的抵抗。和田先生则在书中提到，其实日本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帝国列强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也有可能维护和争取自己的主权权益。实际上，中国学者可以继续关注的方面有：怎样认识当时那个世界？特别是在强国之间的均衡关系中，弱国该怎样找到自己维护和争取主权的空间？

高士华研究员则分析了日方对日俄战争的阐释。日本学者认为，俄罗斯自从占领西伯利亚以后，就有了南下的想法：先进入中国东北，再进攻日本。日本是为了阻止苏联南下做准备。那么，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

2015 年，安倍晋三在发表讲话时谈到，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地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事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对此话发表抗议，他们表示“本质上，日俄战争是两国围绕满洲等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支配权而展开的战争。其主战场也在上述地区。换言之，这是怀着帝国主义的野心，在其过程中不断侵犯被当作战场的非当事国人民的人权而持续的战争”。

日俄战争的胜利确实鼓舞了亚非人民争取独立的愿望。但问题是，日本在之后开始了其侵略步伐。高士华研究员认为，这场战争让日本军队野心膨胀。不仅如此，日本对日俄战争一直没有反省，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成人礼”。日本军队可与白种人对抗并取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是特别危险的。英美国家的人认为甲午战争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中日战争，而忽略了中间 1905 年的日俄战争。无论是日本史还是中国史，日俄战争都非常重要。

咎涛副教授关心的问题是：除了故事上的历史源头和过程，《日俄战争》一书在知识和思想上能带给没有日俄战争记忆的人什么启发？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但它仍会以不同的形式与每个人相遇。

咎涛副教授在研究土耳其史时“偶遇”到日俄战争这段历史。在一位土耳其社会科学家的传记中，学生们得到了日俄战争的消息后，情绪空前高涨，自发欢呼游行，庆祝俄国战败。

咎涛副教授表示，可以从两个视角解释亚非拉人民对日本战胜俄国的看法。首先，在种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存在对立关系。其实，这种观点不是亚非拉人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西方人打着科学的名义制造出来的。

其次，日俄战争是两个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且在第三方领土上发生。作为世界史的重大事件，它在思想史的维度上也会有多视角的呈现。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他需要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思想和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切实相关性。

论坛最后，和田教授回应了讨论中的部分问题，并希望日后能与中国学者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翟德芳总编辑总结到，中日两国学者围绕日俄战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触及很多问题，也引发了诸多思考。这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俄战争这个历史事件，深刻认识东北亚错综复杂的现实和我们所处的特殊环境。

（撰稿：张欢）

62

唐晓峰、鲍宁等：从公主府到红楼
——老北大的校园空间（1898-1952）

2018 年 4 月 17 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公主府到红楼：老北大的校园空间（1898–195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鲍宁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主持。故宫博物院王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季剑青、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李卫伟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唐晓峰对论坛选题背景作简要介绍。了解北大的初心与对其早期的地理位置记忆是分不开的，如今正值 120 周年校庆，回忆和讨论渐渐远离我们记忆的老北大校园空间，是学校该做的事。

引言环节，鲍宁首先进行整体性介绍。她以“空间”为关键词，梳理近代化过程中老北大校园空间的发展过程，探讨在传统城市中建立现代校园的特点、困难以及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并介绍了老北大的校园建筑遗存问题和传统街区保护措施。

何为“空间”？鲍宁介绍了王建伟和叶文心两位学者对“空间”的定义。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方法交汇融合，“空间”被赋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并成为一个复合概念。同时，作为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我们可以从人的感受和物质形态两方面去理解它。鲍宁以时间为线，按照清末、北洋时期、三十年代、战时及战后、现状五大时间段为顺序梳理老北大的空间发展过程。

第一个时间段为清末时期（1898–1911）。那时，虽有理想规划，但直到 1898 年 4 月正式宣布设立京师大学堂之时，清廷依然没有找到理想的空间建设。于是，朝廷决定援引日本经验，划拨官房先行办学，另拨公地从容建设。被选中的官房是马神庙公主府，即乾隆 25 年和嘉公主出嫁时赐建的府邸。这里规模宽敞、获取便利、毗邻皇城，且为闲置官产。经过改造和新建，得到房屋 507 间半。这个时期的京师大学堂以马神庙为中心，另有官书局和医学馆两处附属房产。

庚子事变后，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城内外进一步扩展。主体部分，扩建、整修了公主府房舍，并在“壬寅·癸卯学制”的指导下扩建大学堂操场、宿舍、植物园等空间要素。同时，译学馆、医学馆、进士馆、博物品实习科等各个分科馆舍在北京城内扩散。此外，京师大学堂还购买和建设了几处城外的地产，包括丰台瓦窑民田、德胜门外旧操场、望海楼官地等。

关于其与周边民房的关系，鲍宁认为，京师大学堂一直都在尝试着开辟附近的民房以缓解空间压力。但据史料记载，购买民房存在困难。从校区平面图可以看到，二者呈现出交错的关系，体现了过渡时期校园建设的特点。

第二个时间段是北洋时期。1912 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北大对大学堂原有的各项地产进行调整，包括延用、延用后独立、主动停用和被动停用四种方式。1914 年，北大呈请恢复分科大学建设，但未获批准。分科大学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收，老北大在城外建校的尝试又一次失败，其所属地产再次集中到以公主府为中心的内城，学校规模随之缩减。

红楼的建设是巨大空间压力的结果。比利时仪器公司、中法实业公司、义善实业公司负责建设，1918 年交付完工作为教学楼使用。红楼的筹建资金来源于向比利时仪器公司借款的 20 万元，以汉花园地皮作为抵押，并以学生缴纳的住宿费偿还贷款，共计 20 年还清。红楼由红砖砌成，因而得名。红楼建成后，成为了北大新的空间中心。无论是规划还是实际建设层面，北大都从城外转向了城内。

这一时期北大和周边区域互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筹划大学区域，包括打造模范区、便利学生活动、使教员学生“居住于同一区域”、“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等；二是整理学校周边学生自赁宿舍。因此，北大和周边民房的关系处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合作的变化之中。

第三个时间段是 20 世纪 30 年代。1931 年，北大购得松公府全部地产并对其进行改建和新建。图书馆由建筑师沈理源设计成山字形，地质馆则由梁思成建造为 L 形。1952 年院系调整后，地质馆成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校舍。灰楼的建设背景则源于北大的宿舍紧张问题，经由学生情愿，校方聘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设计。至此，北大三院五斋格局得以奠定。

这一时期，北大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体现在对周边区域的整理上，尤其以北大路的筹建最为著名。这一工程表明，为实现建设统一校区的目标，校方和民间社会围

论坛现场

绕周边空间不断进行协商和争夺，在持续的互动作用下，民房景观最终被校园景观取代。

第四个时间段为抗战及战后（1937–1952）。此时的老北大校园空间再次向城内和城外分散：一是主校区扩建，二是新院系设置。主校区新建有一栋教学楼，俗称“北楼”，位于沙滩北街二号；另一处是为纪念老校长蔡元培而建立的孑民纪念堂，位于如今的《求是》杂志社院内。此外，主校区还新建有四院和五院：前者于 1946 年至 1949 年间作为先修班和文法学院一年级新生校舍使用，后者主要作教职工宿舍和出版部印刷使用。

新院系设置方面，胡适于 1945 年出任北大校长，在原有文、理、法和文科研究所基础上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工学院成立于 1947 年 8 月，大部分科系于 1952 年并入清华大学，校舍现为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农学院成立于 1945 年，其历史可追溯到朝廷在 1908 年划拨的望海楼官地。在数百亩土地上建设的农科大学校舍和实验农场，在建成 4 年后与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组；医学院成立于 1946 年，现址为北大医院所使用。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老北大还包括有教授宿舍、教职员宿舍、校长公舍、文科研究所在内的多处地产。最后，鲍宁介绍了老北大现存遗迹及保护状况。

讨论环节，李卫伟首先建议将老北大沙滩灰楼及其它校园遗存联合一体，像北大红楼一样，申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其次，他认为可从更大的空间视角看待老北大建筑。若以工艺美术运动视角看红楼的建筑特点，可发现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建筑。而灰楼的现代主义极简风格，又与战后这一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此外，李卫伟认为，老北大的建筑与场所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讲述老北大校园空间故事时也应加入哲学层面的思考，这种讲述应面向多种受众，使得普通人、学者和外国人都能理解。

唐晓峰对此进行了回应。他指出，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的是学术，是客体，后者则包含很多有意味的故事，此外还有主观加入。他讲述了当年学生租房的轶事：一位来自南方的北大学生到校园周边租房，问房东是否提供家具，结果房东错将“家具”听成“家眷”，勃然大怒。此外，唐晓峰表示，老北大建筑遗存的确分属两种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即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楼因其充分的历史记忆被纳入前者，灰楼作为学者的研究对象缺乏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而被纳入后者。由此，他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否因二者历史记忆的差别导致了文物级别的不同？

接下来发言的是季剑青。他认为，鲍宁详尽客观的学术研究中充满了故事点，如何体会成为了关键。他以“流动”一词形容老北大的校园空间发展，既体现在变动的规划设计中，也体现在校园建设之中。老北大分散的校园空间镶嵌在北京这座城市之中，因而与中国现代转型、北京城转型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北大宿舍空间紧张，学生到校外胡同租赁宿舍情况普遍，自由度大。胡同居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分散性。人员鱼龙混杂，包括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者、作家等。因此，胡同居所为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提供了空间。正是这种居住文化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校园氛围，促进了文化发展，酝酿了社会动力。

唐晓峰认为，将北京大学的场所特点与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活动建立联系的视角十分新颖。他补充了另外一类空间影响群众运动的案例：广场、大礼堂等王朝时代所没有的空间为学生集会提供了机会。今天，沙滩这个曾经吸引了重要人物聚集的场所却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发挥遗址的价值，并从中发掘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王军分享了自己与北大空间变迁的故事。王军在新华社工作时，曾参与保护蔡元培先生故居。当他发现开发商正在拆蔡元培故居后，便迅速赶往现场，拍摄照片留取资料，并向上级汇报。最终，蔡元培故居免遭拆迁。此外，他还参与保护了新华社院内的北大建筑遗址。王军也列举了一些北大建筑空间未被妥善保护的案例。最后，王军表示，北大的最初选址与旧学的知识系统有关。但在此基础上，北大代表的是新学，这说明新学不是对旧学的铲除，而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语）。

最后，唐晓峰进行回应和总结。二院是京师大学堂最初诞生的位置，但如今，很多北大学生都不了解二院的历史。以二院旁的大学夹道为例，这条在京师大学堂诞生之后慢慢形成的小胡同虽然苍老，其所用的大型灰砖，却代表着王朝时代高等级的建筑。他认为，沙滩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的记忆不应消失，而应在地名、位置和景观三方面得以妥善留存。我们应集合各方努力，对历史记忆进行宏大叙事并将其传承下去。这么做，不仅对北大有意义，对国家在历史转折过程中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撰稿：王梦倩）

63

李水城、张弛、李零等：欧陆视野下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

2018 年 4 月 19 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亚视野下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教授张弛作召集人。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十余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此次工作坊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主持。首先，李零教授介绍了举办这次工作坊的初衷，并代表文研院向与会嘉宾表示感谢。

第一位发言的是张弛教授，发言题目为《龙山——二里头：新石器时代世界向青铜时代世界的转变》。他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该地区长期高度发展，于距今 9000 年分别发展出了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距今 5000 年始，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内出现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化和大型社会群体。依据遗址数量、都邑型聚落的变化、文化的影响力三个指标，他认为，两个核心区文化相继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首先全面衰落，黄河中下游诸龙山文化次之。核心区历经两次衰落后，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和伊洛河流域成为唯一没有衰落的地区。与此同时，半月形文化带（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兴起，出现了密集的聚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这可能跟西方麦类作物和家畜传入有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半月形地带与其外部区域的稳定接触，而河西走廊—新疆地区稳定的绿洲农业聚落正是开展稳定的文化交流的前提。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了庙底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这些文明曾四处拓展至西北、东北、西南和华南，并持续影响了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此后，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他认为，中西方文明起源的基本步骤一致，文化交流与气候变化是推进文明进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当社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时，后者是最主要的推手。韩建业教授分别比较了距今 6000 年、5000 年和 4000 年的中西方社会，得出了“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复杂过程，中国早期文明正是在自身基础上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启示’和‘馈赠’才有了伟大成熟的中国文明”的结论。他认为，虽然在距今 5000 年左右，中西方文化交流已开始，但具体到了何种程度仍需再做工作。距今 4000 年的中西交流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核心区的衰落，这一时期恰恰见证了西北文化的发展迅速。这正对应于气候干冷事件（或称小冰期）。驯养家畜而带来的技术和思想也影响到二里头文化，由此，二里头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这种王权的“味道”与龙山文化不同，以中原为中心，文明程度很高，对内有浩大的工程，对周围的影响也前所未见。他进一步强调，距今 4000 年的时候，文化格局出现的革命性变化与西方交往有关，但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文化西来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首先阐述了对“欧亚视野”的理解。欧亚视野是中国考古学持续关注的议题之一。他指出，欧亚视野不仅需关注欧亚的地理节点，还要既有焦点，又有余光，将欧亚作为一个大的体系进行考察。紧接着，他分享了关于龙山之前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一些想法。历史上第一次区域的大融合在距今 5500 年—5000 年左右，这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一个时间结点。大融合以胡焕庸线以东的表现最为突出，代表性产品为玉石，中原及周边为彩陶；聚落快速增长，文化扩张较为明显（如黄河中下游呈放射线式的外扩），长江中下游东西向交流十分频繁。历史上第二次区域大融合发生于距今 5000 年 –4500 年左右，各区域此起彼伏，中原衰落，长江中下游聚落急剧膨胀，分别向黄河中、下游扩张。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实力强劲，将淮河中下游收入囊中，借道向西直达中原。他指出，如果良渚文化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文明（国家），那么大汶口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的性质需重新审视。关于此后文化发展的格局，他认同张弛教授《龙山—二里头》一文的观点，并指出，在距今 4000 年前后，礼仪化的玉石器再次兴盛，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出现的聚落文化亮点等值得关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田野国际学校负责人叶娃博士结合杨官寨遗址，就遗址的社会性质和堆积形成的过程分享了自己的心得。该遗址目前只见圆形的半地穴或地穴式房子，没有方形房子和大房子。遗址内已发现的 2000 多座墓葬都是单人葬，且出土玉器较少。对比同时期东部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遗址，杨官寨遗址似乎社会分化不明显。她结合遗址发现的陶器及制陶作坊区指出，制陶这一较复杂的生产活动需要首领的组织，且经土壤微形态分析表明，有人工修整痕迹的环壕也需在一定组织下营建。因此，杨官寨遗址是较平等的社会与否还需日后更多发现加以佐证。受美国过程考古学的影响，她以杨官寨遗址“发现房子的地方伴有陶窑发现似乎无明确居住区和工作区分界”为例，启发学生思考遗址的形成是有明确规划，还是从小到大自由地发展。她密切关注遗址堆积的形成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积极提倡多学科合作，致力于研究每一种活动的痕迹在堆积上的反映。她还认为，对每一最小堆积单位、遗迹、遗址的形成废弃过程的深入研究，便是中国新石器考古对世界考古学的贡献。

论坛现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结合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心得，着重从旧石器时代、新旧石器过渡阶段并涵盖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比较了欧亚大陆近东、远东以及核心区部分重要考古发现反映的异同。她提出，很大程度上，中西方文化表现的不同受生态环境差异特别是季风带的影响。季风带的分界线也部分与吴卫红研究员所说的胡焕庸线重合。她举例说明新疆的阿凡纳切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并未深入影响至中原，其实也受西风带影响所限。她特别补充道上述观点不是环境决定论，而是提醒进行跨区域文化比较时对环境因素的影响需有所重视。此外，她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两概念的差异较感兴趣，后者具体指中国境内的文明还是有大一统的中国文明，这点引人深思。厘清这一概念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亦十分重要。针对张弛教授和韩建业教授关于中华文化自身特性的观点，吴小红教授从技术层面进一步补充，以青铜技术传入中国的变化和埃及蓝与中国蓝的核心元素是两种体系等为例，说明技术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并未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

上午的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文化发展的核心区衰落的原因和人口的流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张弛教授认为，气候变化为造成文化普遍衰落的原因之一。韩建业教授认为，人口向大聚落的聚集可以部分解释人口的流向，气候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戴向明研究员则表示，洪水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下半场的讨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首先发言，他针对当前欧亚视野下的文明演进研究进行评价。他认为，对于近期学术界无情绪、无偏见地探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以及诸位学者致力于将一件件文物串联起来形成宏大的历史叙事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进步。另外，这种宏大的视角突破了以往“多元一体”史观关注的范围。其次，他就西方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前，探讨西亚、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区域多集中于半月形文化带，而且多局限于技术层面（如青铜、家畜等）。这些技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了中国文明的演进？就人而言，半月形文化带生活的人应为中国的土著，其文化传统传承自黄河中下游核心区域的文化因素。对中国文明产生决定影响的是生活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土著先民。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中国文明继承了很多北方的因素，比如夏沿袭了多种“华西系统“的玉器，随之的商源于半月形文化带的南端，并被源于西北的周所取代。总之，中国文明是在大中华文化圈内由多种文化因素融合而成。

文研院第四期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认为，半月形文化带有一个形成过程，与中原相对应，可以分为龙山文化和夏两期。龙山文化时期半月形文化带的情况如下：燕辽地区存在一定的缺环；北方地区的规模初定（北至朱开沟遗址一线、南至晋中、西至陕北和晋北一带，东与燕辽地区相接），奠定了农牧交错带的基础；甘青地区分布着齐家文化，得益于广阔的地理分布，保持着长期的繁盛。上述三个地区分别与中原进行南北向的联系，但各自之间的联系不多，这一情况延续至夏。早商至西周初，文化交流转变为东西向；西周至两周之际，文化交流以南北向为主；东周至秦，又转变为以东西向为主。成都平原不宜划入半月形文化带中，如以三叉护手剑为代表的北方因素仅见于成都平原边缘，未进入腹地。此外，杨建华教授表示，文化衰落应看作两个文化发展的稳定期中的非稳定期：在非稳定期，文化遗存的缺失并不一定是文化发展低迷所致，也有可能源于生活方式的变化。伦福儒曾提出，距今 3000 年—2800 年，畜牧经济逐步转变为游牧经济，在转变期内，文化遗存较少；这种现象也见于燕辽地区，即夏家店上层（结束于春秋早期）与春秋晚期之间存在缺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重点梳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发展状况。东北地区，这个时期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燕山—拒马河一线大致为它们与二里头文化的分界线。晋陕高原在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分布着较多遗址，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东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从遗址数量看，黄河以东的晋陕高原乃至华北地区，龙山文化偏早至二里头文化未见明显的衰落。但是，黄河以西的陕北以南至关中西部，几乎不见这个时期的遗址。从文化分布范围和影响程度看，二里头文化时期东方对中原的影响并不弱于龙山文化时期。仰韶时代，大汶口文化深入至河南平顶山一带；龙山文化时期，豫东一带被中原龙山文化占领；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豫东地区重新被纳入东方的岳石文化范围内。另一方面，岳石文化较强势地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但是，后者不仅包括前者的因素。此外，在文明演进中应该关注“人”的变化。人祭可为此提供一个视角，这一现象普遍见于龙山时代诸遗址

中，如石峁遗址的人头坑、王城岗遗址乱葬的灰坑等。这种现象也见于殷墟，说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此或许为早期文明的一个标志。若以此论，中国早期文明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为龙山文化—殷墟和周——后者已不见人祭。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戴向明指出，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距今 6000 年，农业社会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建立起来；庙底沟期，大房子、大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明已经开始起步；龙山时代，黄河、长江聚落均出现了超级聚落，早期文明进一步发展；甚至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他还指出，虽然从技术层面看，中国最后融入到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内，但是，中国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中原等各区域自成体系的格局自 9000 年前已奠定下来，故以中原为代表的早期文明为“原生文明”。相较于中原，以石峁遗址、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周边地区均在受了中原地区刺激后逐步进入文明阶段，因此，它们属于“次生文明”。在众多促进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动力中，贸易、对贵重的资源的追逐应是不可忽视的。良渚文化对玉器的追逐以及早商对中条山地区铜矿资源的控制均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以“世界体系下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为题发言。“世界体系”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针对近 500 年来世界发展史提出的，但国外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可上推至 5000 年前。距今 9000 年，两河流域的农业群体向欧洲迁徙，促进了欧洲农业文明的确立。稍晚，两河流域的农业群体或穿过高加索山脉，经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区，导致南俄草原地区的人群迁徙，促使特里波里文化出现。与此同时，近东文明也从伊朗北部进入中亚，催生了那里的绿洲农业。距今 6500 年，来自中亚和乌拉尔山以西的印欧语系人群范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导致西伯利亚圜底罐系统文化的出现。这与红铜时代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可以黎凡特和巴尔干为代表。在这个大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也进入了红铜时代。距今 4500 年左右，地中海东侧的人群再次西迁，导致西伯利亚进入青铜时代，形成平底罐文化系统，并最终促使安德罗诺沃文化形成。与上述世界体系内的人口迁徙，中国也出现了相应的人口流动。如距今 6000 年前后的庙底沟期的西渐，在甘青地区发展出马家窑文化，一直向西进入新疆东部。距今 4000 年前后，齐家文化西进，随后，在河西走廊形成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并西进至哈密，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引入新疆并继续向西不断扩散。总之，中原文化的向外扩展与世界体系下的人群迁徙是紧密联系的，这点深刻地影响到早期东西文化的交互，也对中原内地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首先介绍了古典时期欧洲人的世界观。以斯特拉博《地理学》一书为代表，欧亚的分界线为顿河；亚洲主要指的是近东，以及埃及、利比亚等非洲北部地区，西至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当今欧亚视野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向东推移，中国史前考古在亚洲占有重要地位，足以同欧亚大陆西部相匹敌。其次，他结合欧洲历史谈中国古代文化格局的变化。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东南低、西北高，而南北和东西的不断拉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但是，从长程看，不论亚洲或欧洲，北方一直压制南方——虽然南方文化比较古老，却常被一次次地从北方南下的文化所取代。最后，他以苏秉琦先生的一首诗作为发结尾：“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豰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首诗正描绘了此次讨论主体下的文化格局变化。

此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简单介绍了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中西文化交流通道的认识。他认为，“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基于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提出的。与安特生、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相比，李希霍芬非常重视自然地理基础，其对中亚所做的一系列人文分析均是建立在细致考察自然地理基础之上的。李希霍芬对于中亚的人文地理变化，提出了由西向东迁移的特征。李希霍芬的代表作品《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只翻译了有关中亚与黄土高原的关系的部分内容，唐晓峰教授对此表示遗憾。此外，唐晓峰教授还简要说明了中亚内流区和外流区的相关问题。

在下半场的讨论环节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与诸位发言人对车辙等发现进行了探讨。常怀颖副研究员还简单介绍了殷墟马车的发现情况。赵辉教授、张弛教授分别以良渚古城钟家港和蒋庄遗址为例补充了良渚文化时期暴力现象的发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指出，风暴潮可能是导致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极大促进了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与之相关的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外的学者也相继来中国进行交流与合作，新的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对“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有利于学术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也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

（撰稿：马永超、杨一笛）

（四）文研汇讲

01

张治：钱钟书与西方神秘主义诗学

2018 年 3 月 14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治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钱钟书与西方神秘主义诗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张治副教授

报告会伊始，张治副教授表示，钱钟书从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但他的本行以及平生最下功夫的却是西方文学。他治西方文学的心得通过两个渠道保存下来：一是杨绛的翻译，二是他的手稿集。后者指的是在他去世后十几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影印出版的札记、读书笔记的手稿，包含了其晚年未完成著作的资料和观点，总共有七十二册之多，五万页的篇幅。其中，钱钟书对神秘主义的学说和相关研究一直很留意。

《容安馆札记》一文追溯了“mysticism”的语源。神秘主义者们似乎在默认：秘不示人，反而达到了与神明的契合。钱钟书赞许“默然冥契”，认为“神秘宗”讲法最为精要，并在《管锥编》罗列中西古今“言语之不堪宣情尽意”之说。钱钟书尤其称赏《法华玄义》中“圣默然”一说，认为其与拉丁语“sanctum silentium”一词意思相同，仿佛对译。他在此关注的是，谈论玄妙深奥的道理时，如何在修辞术上表现空无之理。钱钟书在讨论这方面时保持着警觉的敏锐力。当留白、笑而不语或《繁花》里的“不响”成为“套路”的时候，所谓的“默契”与“默然而道存”是不可能的。他欣赏“富于包孕的片刻”，并在《谈中国诗》一文中说：“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作为自己修辞观念的贯彻成果，小说《围城》的结尾便创造性地重新诠释了一个“默然”时刻。

《谈艺录》从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神秘主义风格开始分析，上溯其渊源至普罗提诺，并将之比作庄子——“神秘诗秘，其揆一也”。但是，宗教中人往往是排斥诗歌的。唯有普罗提诺将感性直觉的文艺和理性思辨的政教并置在一起沟通，且认为二者可达到一个向上而与神明往来的、完美超然的世界。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诗歌思维的“圆”象以及神秘经验时，兼论中西文学以求会通。这条线索关涉到他对神韵派诗歌理论的兴趣。一般认为，钱钟书下笔典故学问堆砌，写诗文小说时重视出处来历的做法可能与清代后期以才学为诗、追摹宋诗派的风气相关。他专门研究过宋诗，且与宋诗派的大人物交好。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数次讨论神韵说，并在附说中联系西方的神秘主义诗学。而神韵派是敌视宋诗派的，严羽谓“诗有别才，非观书也”，提出诗并不依赖于学问。钱钟书赞成将“神韵”树立为诗歌最高境界，但不认同王渔洋所理解的范围——他将西方神秘主义诗学那套比较形而上的、本质化的辨析论说引进来就是为了矫正古典中国诗歌在术语上出现的混乱不确定性的问题。

结合《外文笔记》、《容安馆札记》和已刊著作，钱钟书对普罗提诺的认知主要展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不言和多言的对立统一，这背后是超越和遍在的对立统一——一方面重视默然，重视以不言达到道的体悟；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善于修辞，不抛弃文学表达，不排斥诗歌。其二是看似自相矛盾的意见相反相成地实现了论说上的周备。在西方的思想传统里，圆之为象，一个是永恒，一个是回归——二者都合乎普罗提诺的立说。钱钟书写有一篇文章《说“回家”》，而他既在《九章集》里谈过“回家”这个哲学命题，也在《容安馆札记》里重点讨论过。《庄子》有言：“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想必这个观念也影响到钱钟书的人生实践，不然他也不会在《谈艺录》称普罗提诺是西方庄子。

钱钟书的神秘主义诗学来源还包括：中古德国哲学家埃克哈特大师、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诗歌运动里出现的两个西里西亚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布鲁诺以及意大利马里诺派诸诗家。在文学修辞技巧上，钱钟书重视巴洛克的繁复、独创的技巧；在诗学趣旨上，他则强调神韵和意在言外。其实，这既指向古典传统，也针对当下汉语文学的缺失。可以说，钱钟书希望通过彻底的中西文学比较来给中国文学注入新鲜又有益的养分。

（撰稿：张治）

02

徐建委：早期中国的史料加工
——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考察为中心

徐建委副教授

2018 年 3 月 21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早期中国的史料加工——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中心的考察”。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参与讨论。

徐建委副教授首先就这一论题的选择做了说明：本研究始于《国风》和《小雅》的研读经历，是一种有关早期材料的整体观感。同时，他特别解释了这项研究所遵循的方法或前提：第一，这项研究是文学意义上的研究，重心不在考证史实，而在分析史料的加工；第二，先秦史料本不足征，在“严酷”的史料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处理和使用材料是本研究着重考虑的地方；第三，早期文献问题众多，在可控的限度内使用文献是本研究的“自律法则”；最后，在文献阙如的地方需要借助想象力进行补充，这与上述两点矛盾，却是无法避免的。

就先秦研究来说，我们必须对三个问题保持方法论层面的警醒，即文本长时段性、刘向校书对文本的影响和书写者身份。这三个问题直接与材料的适用限度挂钩。我们要意识到早期文献的适用边界，不可无条件地使用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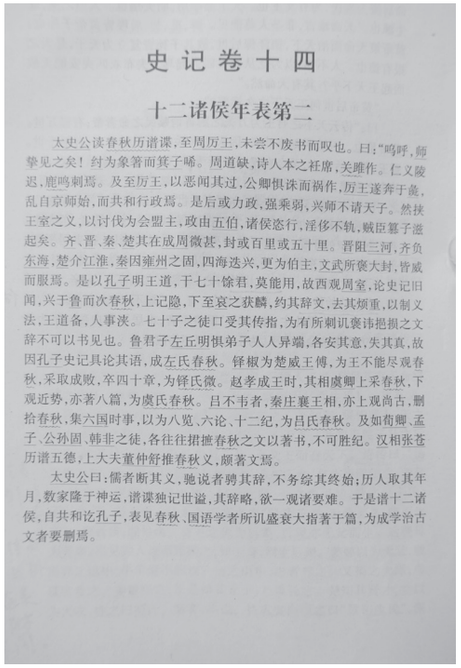
至于为什么会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为中心考察早期史料的加工问题，徐建委副教授表示，相对于西周史料、战国史料而言，春秋史料可控度高，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外，《年表》与《春秋》、《左传》、《周本纪》、《秦本纪》、诸《世家》关系紧密，可统摄今传春秋史料的主体部分。此表以时间、事件为主，几乎没有冗余叙事，故可以将模糊解释的可能降至最低。

通过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年表》前一百多年的叙事几乎全部与《左传》的早期历史相关，《左传》相关年份的补述或插叙，会被《年表》错误的编入此年，而不是补述、插叙事件的真正年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此我们可以判定，《年表》主要依据《左传》编成。

在此基础上，徐建委副教授考定了几处《春秋》的错简及《年表》的年代错误，并初步还原了后者的编纂过程。编纂者很可能先以周王、鲁公系年为准，以《春秋历牒谱》、《世本》为基础制出总表，后依据《春秋》、《左氏春秋》等材料将各国“要事”写成一枚枚系年的竹简，最后将单简所记誊写入总表。也可以这样说，在制作《年表》时，先由单支竹简系统抄录出《春秋》、《左传》等古籍的“条目事件”，然后再誊写入已经制作好的空表中。

随后，徐建委副教授由《年表》、《周本纪》等篇章存在的史观差异转向了战国秦汉时代有关西周历史的两种主要的叙事体系——它们又都与《诗经》的解释体系密切相关。

这两种解释体系是《春秋》学发展起来之后的产物，属于战国早期儒家的解释系统，最晚在孟子时代便已形成。徐建委副教授以《孟子》引《诗》为例作了说明：除了极少几条，《孟子》引用的诗句，几乎全部都不是孤立的。不仅见于《孟子》，也会被其他战国秦汉文献所引用。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诗句的使用情况也是相对固定的。具体到引用某一篇《诗经》的哪几句诗，各战国秦汉典籍基本是相同的。可以这样说，在配合特定说理议论问题时，征引哪一篇、哪一句《诗》的“规矩”在孟子之前便已出现。故在孟子之前，儒家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诗》的引用“套路”。而分析这些“套路”，我们会发现，《孟子》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弃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威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抿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中的《诗》已经染上了浓重的《春秋》学色彩。

这种基于《春秋》义理的解释体系，将《诗经》纳入了历史的大框架之内，并赋予了其价值和意义，还造成了某些与之不协调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湮灭（如西周末年携惠王的历史）。同时，这一体系也会制作一些新的历史故事，战国秦汉时代那些大量流传的事语类故事便是一例。这些都是战国早期儒家学者所做的事。但是，到了西汉时代，关于早期历史的叙事已经主要由《春秋》系统来提供了。于是，汉人的先秦，主要就是战国儒家的先秦了——《年表》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被塑造过的春秋史。

徐建委副教授最后重申，晚期体系化的加工并不能掩盖加工材料的早期属性。我们面对的情况是：虽然房子是新的，但多数砖石却是古老的。而问题是，只有依靠那些数量不占优势的新砖石，房子才得以建造出来。至于房子的图纸是新是旧，还未能确知。同样未知的还有，希望重建老房子的建造者有没有进行臆造。

（撰稿：徐建委）

03

严志斌：巴蜀符号探索

2018 年 3 月 28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巴蜀符号探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赵刚、韩潮，访问学者徐建委、高波、张治、孙正军、戴海滨参与讨论。

巴蜀符号主要指在四川盆地内，于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器物上经常出现的符号。古文字的解读（特别是对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在四川重庆地区发现的巴蜀符号是是这一重大课题中的难题之一，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重建与理解巴蜀古文化。

严志斌研究员首先回顾了学术界有关巴蜀符号的研究状况。巴蜀符号研究始于 1936 年，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鎛于。1942 年，卫聚贤先生整理公布了 48 种纹饰符号，他认为那就是巴文。学术界对巴蜀符号以比较严肃的态度进行探索和研究是在宝轮院、冬笋坝二地公布巴蜀墓葬材料之后。佟柱臣、徐中舒、邓少琴、蒙文通、童恩正等人对此都有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性质问题。严志斌研究员将其归纳为花纹说、图像语言说（李复华、王家祐为代表）、吉祥符号说（孙华为代表）、文字说（李学勤为代表）、图腾徽识说（王仁湘为代表）五种，并点评了各种观点的得失。随后，严志斌研究员提及巴蜀符号研究存在问题与难点：部分符号漶漫不清、部分符号发表摹本有误、符号间的区分问题、符号与纹饰的区分问题等等。此外，有很多器物是采集或传世而得，因而丧失了考古出土背景。

随后，严志斌研究员介绍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进展。他仔细甄别了 246 种巴蜀符号，其时代可由战国早期延至西汉早期。三星堆文化刻划符号与巴蜀符号之间存在缺环。巴蜀符号最多地出现在兵器与印章上，在杯、罍、豆、带钩等生活用器上也常被发现。严志斌研究员以罍形符号、钟形符号、水草形符号、栅栏形符号、兰字形符号等具体符号为个案，讨论了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及符号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分布与变化情况以及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

严志斌研究员认为，有一些巴蜀符号有较为固定的组合，且组合顺序保持一致——可能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巴蜀符号组合的演变经历了由简益繁、由繁趋简的过程。此外，严志斌研究员还讨论了巴蜀符号的方向性与器物性问题。他认为，讨论巴蜀符号应当与器用联系起来，且其在铜印与铜兵器两类性质不同的用器上有着比较明显的使用差别。至于族群性问题，严志斌研究员表示，可通过巴蜀符号地域性分布来探讨。就目前材料来看，巴蜀符号的大多既见于蜀人区的成都平原地区，也见于巴人区的峡江地区，并不能区分出巴人或蜀人专用的符号。总体而言，巴蜀符号似乎不具备民族或种族的族群性特征，但又不能排除其具有聚落性（地域性）的特征。目前，对巴蜀文化聚落与墓地性质的研究开展得尚不充分，有关族群性的研究还得基于巴蜀人群的聚落形态性质研究才能更好地得出结论。

严志斌教授

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就三星堆文化、古印度文字、自然语言学及考古工作等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

（撰稿：严志斌）

04

韩潮：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

2018 年 4 月 3 日，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高波参与讨论。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为韩潮教授（右）颁发聘书

在 1903 年《群己权界论》出版之前，严复曾对“权利”译名提出异议。他认为，用“权利”二字强译西语中的“right”，“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为此，严复曾经构想过两个替代性方案：一为“职”，二为同音的“直”。前者无法同西语中的“duty”区分开来，因而后者更为可取——“直”不仅兼有“职”之义，且与“right”的西语词源相近。

一般认为，严复的“以霸译王”一说，是“将西方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翻译为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词”。而在韩潮教授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严复对权利的正名，另一着眼之处在于“权利”的字面含义不能体现“right”在西方语境中“与生俱来”的意味。权利的字面含义“近于力征经营”，“本非其所固有者”。

韩潮教授表示，严复对权利译名的调整和修正体现了他对“natural right”观念的理解。这可通过四种语境相印证，即对话者语境、译学风气语境、西学语境、严复自身的思想转变语境。

从对话者的文本语境来看，严复针对的很可能就是《尊疑先生复简》的通信人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受到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加藤弘之等人的影响，对权利一词的使用往往取强权的解释，视“强权与自由权为一物”。同时梁启超还否认天赋人权的学说，“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

从译学风气语境来看，严复针对的是 1900 年开始兴起的、以《译书汇编》为代表的新译学群体，其中包括马君武先于严复出版的《自由原理》译本。这些译学群体的特征之一便是借助当时的日译本而非直接从西语翻译，因此，他们也往往带有同梁启超相似的问题。

从西学语境来看，19 世纪是自然权利学说没落的世纪。边沁认为，自然权利是“高跷上的胡言乱语”。这一倾向同样体现在密尔的学说里。密尔承认个体权利的意义，但却否认权利的自然基础。事实上，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对中国学界影响极大的两位西方思想家——密尔和耶林——都是自然权利学说的反对者。

而从严复自身的思想转变语境而论，从蔡元培开始到李泽厚，学界历来认为严复此前所采取的译名是《自由论》，其后改为《群己权界论》是其自身立场从激进转为保守的表征。

严复的思想的确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而他对当时学界视“强权与自由权为一物”、否定“natural right”的不满应是表现之一。他采取“直”的译名，更多是取其“正当”、“正确”之义。

不过，严复《群己权界论》汉译本并没有彻底贯彻他的方案，其中有不少地方保留了“权利”的译名。但严复的译名困境并不像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带有太多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意味”。真正的困境在于，古汉语中的“直”大体近于“正当”、“正确”或“正义”，只代表一种客观的伦理准则，并不具有相对于某一人或某一主体而言的主观意涵。通过考察《群己权界论》汉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严复改变了他之前视为“铁案不可动摇”的译名，在涉及“自主权”及“他人的权利”的地方均采用了妥协性的“权利”译名。这一现象表明，一旦退回到“直”的译名，就无法呈现出现代“right”观念中的主观意涵或自主性含义。

因此，严复的翻译困境不仅在于如何在汉语中重构一个中国传统从未有过的观念，还在于如何在汉语中呈现“right”在西方语境中发生的古今转义现象。若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别回溯到中国古代语言的相关词义构造问题及西方自然权利学说的中世纪起源说中去。

（撰稿：韩潮）

05

赵刚：细读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

2018 年 4 月 11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作主题报告，题目是“细读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

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赵刚教授首先感谢文研院的邀访。难得的驻访机会使他得以在陈映真全集出版之后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既能够同其他学者学习互动，又能够专注而有效地阅读陈映真全集的部分书目，以期重新掌握其文学作品，特别是晚期小说（如《忠孝公园》）的思想内涵。对于陈映真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全集的出版为他们提供了研究便利及研究要求。赵刚教授表示，他的研究方法较为传统，需要对文本、作者与时代语境这三重因素进行交互编织的理解，即所谓的“知人论世”。因此，全集的出版对其新一轮的陈映真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赵刚教授

《忠孝公园》作于 2001 年，约略同一时期的小说还有两篇，即《归乡》（1999）与《夜雾》（2000）。这是陈映真创作的最后三篇小说，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与之前的最后一篇小说《赵南栋》（1987）相距长达 12 年。陈映真是一个公认的“思想型作者”，他总是以自己的思考回应时代的挑战。因此，世界在其间发生的变化，其令陈映真激起的危机感和介入思索方式就变成了理解陈映真晚期文学的关键。

十二年间，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陈映真迫切地对几个问题展开焦点思索，其中包括：旧殖民的伤害及其遗留问题、1950 年代以来台湾的历史反思与整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发展等等。

本场报告中，赵刚教授细密地分析了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林标与马正涛。他指出，两个没有交集的人物之间覆盖着共同的近现代史。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之外，赵刚教授对“罪意识”这一陈映真晚期著作中最繁出、最重要的主题着墨较多。赵刚教授在比较林标与马正涛这两个角色后指出，陈映真更为立体丰富经营的对象其实是后者。究其原因，无非是陈映真对于“加害者”有着更为强大的思想、道德与情感投注。

《忠孝公园》层次丰富，指类繁多。在历史与现实的叙事方法之外，陈映真也动用了高强度的象征手法。赵刚教授认为，“忠孝公园”本身就是一个超级象征，且分别以樟树与木棉象征了“忠”与“孝”这两个人伦道德条目的危机崩解状态。赵刚教授表示，在所有繁多的指涉之中，《忠孝公园》于作者来说最具痛感。在冷战与内战的历史脉络及新旧殖民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下，社会与人群的道德底线面临丧失的危机。脱殖民化与重新做中国人，这两件事其实经常是同一件事。使当代台湾社会的道德肌理免于溶解是时代摆在两岸中国人面前的共同挑战。

赵刚教授指出，陈映真书作《忠孝公园》，讲的也是大陆的故事。大陆本身也在新旧殖民的遗留与影响之内，而非之外。对伪满洲国与日据时期的反思固然不可回避，时代摆在我们眼前的要求作答的，其实更是两岸中国人该如何面对自身在各个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格局、道德想象以及知识构造）与“美国”的相对关系。

因此，《忠孝公园》是借两个小人物的悲剧来诉说当今中国人的家、国、天下的问题。可谓所说者小，所指者大。

赵刚教授最后指出，阅读陈映真文学，与所有重要文学文本一般，要求读者细读：细细耙梳其中的复杂歧义，细细品味其中的光暖丰润。同时也要求读者感受并领会贯穿于陈映真文学之中毫不妥协的毕生使命：结束那因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而造成的民族分裂。

（撰稿：赵刚）

06

刘亦师：田园城市学说之思想来源及其全球传播与实践

2018 年 4 月 18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刘亦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田园城市学说之思想来源及其全球传播与实践”。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高波参与讨论。

刘亦师助理教授指出，1898 年，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在《明天：通向真正改良的和平之路》（以下简称《明天》）一书中以大篇幅阐释了开发、管理新建“田园城市”的可能性，完整地提出了这一学说。“田园城市”以“自由”与“合作”为基础，经由建设一系列新城而形成区域性的“社会城市”，达到疏散城市人口和重组城市结构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和平渐进地改良英国社会的理想。其中，土地权公有、居民自治管理是这一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并由此衍生出“卫星城”“绿化隔离带”“城

刘亦师助理教授

市疏散”等相关概念。

1902 年，《明天》一书得以再版并广为流传。次年，英国第一处田园城市莱彻沃斯 (Letchworth) 正式动工建设。从该书出版算起，田园城市学说在短短 5 年内由“纸上谈兵”变为现实，既奠定了英国现代城市规划运动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还促生了一系列直接影响城市政策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田园城市运动。可以说，系统考察田园城市的思想来源、全球传播和实践活动是研究 20 世纪以来中外城市规划史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工作不但有助于形成田园城市的研究体系，对加深认识我们当前所处城市的各种问题与发展方向也有着直接关联。

刘亦师助理教授认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学说并非旷古未有、凌空出世。他从规划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了 19 世纪以来针对城市问题的各种反思和解决方案。此外，霍华德还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19 世纪理想城市理论与实践以及宗教影响等三方面缕析田园城市的思想来源。考察社会改良相关思想主要内容、生成背景及其为田园城市学说吸纳或扬弃的方式有助于廓清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也能更加明确田园城市的特征及其历史贡献。

19 世纪，英国社会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多种新城建设方案与实践，如欧文 (Robert Owen，1771–1858)、潘伯顿 (Robert Pemberton，1788–1879)、白金汉 (James Silk Buckingham，1786–1855) 等，以及 19 世纪末由企业家实际建成的伯恩维尔镇和森赖特港等工人住宅区，均成为霍华德形成完整的田园城市学说之思想来源。作为虔诚的公理会教徒，19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教堂七城”方案也对霍华德拟定田园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城市”区域结构有所启发。

为何只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得以实施并大行其道？刘亦师助理教授表示，他的学说采取示范而为的方式，跬积渐进，既体现了善于调和的特点，还强调了自由精神、勇于试验的重要性。同时，霍华德正确地估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舆论，并配合以详密理性的分析计算，使田园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既具可操作性，也能为现实政治和既得利益者接纳和支持。

提出后不久，田园城市思想便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田园城市运动，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还诞生了城市规划相关专业和学科——现代规划史上的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均与之密切相关。田园城市运动既将田园城市思想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促使各国政府渐次将城市规划纳为职能部门，反过来也在不断修订、完善和扩充田园城市思想内容。诚如前文所说，第一处田园城市于 1903 年开始兴建。而在此后，这一运动转向设计手法和规划技术，具体体现在蜿蜒优美的街景、充分绿化和林地、设计精良的住宅及公共建筑等。至于本质性的土地权属和土地增值归属等问题，未予以讨论。

德国、法国、美国、澳洲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不尽相同，因此，各国的田园城市运动同英国有出入且加入了颇多新创造。在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传播方式更倾向于直接仿效技术和手法，漠视其产生背景和社会改造的宏大意图。试举几例，在非洲和巴勒斯坦，田园城市或城郊住宅（garden suburb）被当作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工具；在苏联，其与该国意识形态不符而被弃置；在日本和我国，这一运动被纯粹用作服务于上层阶级新式住宅区。我国在近代时期便已被卷入这场席卷全球的田园城市运动之中，且产生了较多文献，实例虽少却衔接了 1949 年前后城市发展和规划的思考与实践。相比西方国家，非西方世界的田园城市更重视技术手段和空间形象，从微观的草地、树木、公园、建筑样式，到中观层面的分区制度、道路设计、土地重划，再到宏观层面的城市疏散、区域规划，无一不可以田园城市思想笼括涵盖，并足以显示这些国家近代化事业上的成就。

（撰稿：刘亦师）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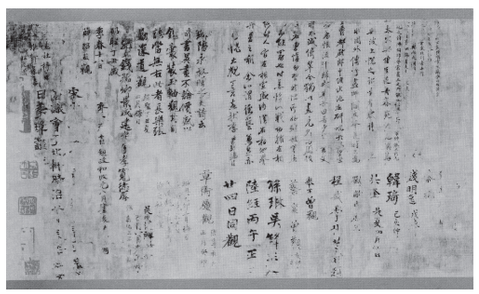
孙正军：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
——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解读为线

2018 年 4 月 25 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解读为线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滨、苏芃、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出席。

孙正军副教授首先对选题缘起作了说明。他介绍了自己从对六朝士人皇帝的讨论及历史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进入这一课题的路径，并回顾当下学界对图像与历史关系的反思。

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是传世画作中的精品。据称，该画作为初唐画家阎立本所绘，共绘有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后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十三位君主。一个显而易见却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便是，帝王穿戴着不同冕服：其中一部分帝王身着冕服，另一部分帝王身着非冕服甚至便服。对此，台湾学者陈葆真先生以“原迹”的后半段为据，并将其与唐朝初年编修南北朝诸史联系起来推测道：这或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初君臣对南北朝正统所在的历史认识相关——着冕服者为正统，着便服者为非正统，。

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视作一个整体，重视诸帝王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并由此提出了富有深度的图像理解，颇具启发意义。不过，若细审图像，我们可注意到其中存在的若干矛盾：正统性无可置疑的隋炀帝、汉昭帝未穿冕服，不具正统的蜀、吴二主却着冕服，同样身着冕服的北周武帝题记称其“无道”等等。尽管他试图通过质疑题记予以解释，不过，综合各种证据来看，尚不能轻易否定题记。因此，从图像自身语言看，“冕服即正统”、“便服即非正统”的对应关系恐难以成立。而唐人多以幞头而非冕服绘本朝皇帝像的现象，也显示出时人并无将冕服对应于正统的认识。



《历代帝王图》

基于此，孙正军副教授认为，我们应跳出“图像证史”的窠臼，转而从帝王像绘制的自身传统进行解答。从各种资料看，尽管尚无法确认汉人是否绘制了本朝皇帝像，但帝王像已在汉代出现是殆无疑问的。其时，绘制上古帝王时多用冕，绘制秦始皇及春秋战国诸王时则多用通天冠。及至魏晋南北朝，东晋南朝和北朝实际都存在两种绘制皇帝形象的模式。其中，自汉代而来的着通天冠皇帝像传统在南北双方均有继承，且各自又发展出新的皇帝像绘制模式。

东晋南朝当世皇帝多着白纱帽（通天冠仅被用于前朝帝王），而北朝皇帝既着冕冠，也着通天冠。只不过，出于滥用的缘故，一些非帝王也着通天冠，其象征意义被削弱。相较之下，冕冠的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在这两种绘制皇帝像的模式中，作为“新发明”的着白纱帽和着冕冠的绘制模式更为重要。而这与《历代帝王图》中南北皇帝的冠服恰好相对。由此可见，《历代帝王图》绘者以不同冠服加于南北帝王，并非基于唐初君臣对南北朝正统所在的历史认识，而是沿袭了此前南北双方皇帝像的绘制模式。

院长邓小南为孙正军副教授（右）颁发聘书

接下来，孙正军副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东晋南朝与北朝出现不同皇帝像绘制模式的原因。他认为，这与南北双方皇帝舆服文化的差异有关。冕服自东汉明帝永平二年重新问世后，魏晋以下用途渐广，但在南北皇帝舆服结构中的地位仍有差异。北朝冕冠地位突出，允为象征帝王的第一首服“符号”，东晋南朝皇帝也使用冕服，但白纱帽等于彰显帝王身份之际意义更为突出。正是在这样不同的皇帝舆服文化下，才酝酿出南北不同的皇帝像绘制传统。

报告最后，孙正军副教授以以上考察为基础，尝试对图像与历史的联系提出一点思考。并以自身对文字文本生成过程的认识为例，提出阅读图像也可遵循类似的途径，即从内证到外证，充分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

（撰稿：孙正军）

（五）文研读书

07

先秦城邑与社会

2018 年 3 月 6 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先秦城邑与社会——《先秦城邑考古》研读会”。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担任引言人并作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杭侃、孙庆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金城出版社副社长张朴远，《先秦城邑考古》责任编辑欧阳云、杨超出席并参与讨论。

在研读会开始，许宏教授回忆了《先秦城邑考古》一书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深厚渊源。一年之前，许宏教授作为访问教授到研究院报到，在为期四个月的驻院时间里最终完成了这部书。这场研读会也为“文研共同体”学者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平台。

《先秦城邑考古》体现了考古学研究中田野和书斋的两个方面。作为早期中国著名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教授一方面在遗址现场做发掘、出报告，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把自己的研究提炼成综合性的专著。这部书最初的写作契机是许宏教授的博士论文，一部大约 30 万字的关于先秦城市考古的研究成果；在二里头的发掘中进行微观和个案研究之后，在最近几年才改编增补，“升级”成了这部将近 100 万字、分为上下两编的学术著作，展示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相比之前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先秦城邑考古》淡化了研究性，努力成为一份资料性比较强的概论性专著。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许宏教授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数据整理、资料收集和分门别类的工作上，最终用比较合理的框架把资料展示出来，分为“用来看”和“用来查”的上下两编。这样的安排有两点考虑，一是考古学界注重资料的传统，二是为学界尤其是后学铺路搭桥的学术情结，有利于后人在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这部纯学术著作用材料来说话，述而不作，仅仅对于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基础性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也体现了考古人的历史写作特色。

李零教授

《先秦城邑考古》的另一个特点是研究视角从公元前 7000 年一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覆盖了大约 7000 年的时间。许宏教授认为，学术界对于学术碎片化的现状普遍感到不满，把握总体史成了一种需要。这部书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一些主流意见，也尝试了做打通各个地区、各个文化区系的年表这样大的工程，尽管仍然仅供参考，但是也期待能够以城邑为切入点，初步勾画出几千年间东亚大陆从城邑到聚落乃至社会的宏阔图景。

许宏教授还谈到，虽然这部书的资料性很强，但是它仍然融入了自己的史观，例如考古学本位的思考，鉴于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之间历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保留了考古学话语系统的分期定名。另外，书名中的“城邑”也是作者个人特征比较鲜明的概念界定和认识。城邑原本是指突出于地面的城墙及城墙围绕起来的聚落。但是，这部书的时间上限达到了公元前 7000 年之久，城邑的概念扩展到了围圈聚落，也就是围子，指的是用城墙或者壕沟、甚至是栅栏或自然天险圈围起来的聚落，这就和社会发展范畴的“城市”不同：有围子的聚落不一定是城市，城市不一定用围子圈起来，城邑的起源远远早于城市，进而才有对城市发展问题的相关讨论。

许宏教授坦承，《先秦城邑考古》这部书仍然有若干不足。其一是对于长达七千年的大的历史时段只能纵向切段来叙述，在展现某一个区域考古学的变化和城邑的发展时会有割裂之嫌。其二是受精力和学力的限制，书的展开以关注城邑本身为主，较少涉及城邑与非城邑，以及城邑间关系的宏观聚落形态问题，对于其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制品存在状态未及探讨，可以期待将它们放在城邑的背景下来阐发，产生出一批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其三是作者以一己之力收集资料，难免挂一漏万。另外，书中的图片几乎全部是线图，今后如有可能要收集航拍图充实和完善。

引言结束后，刘绪教授指出，正如许宏教授所说，这本书的实用性很强，而且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下努力打破严格的时段分界。除此之外，他首先关注的是书名相比于之前的博士论文标题发生的改动，对此予以肯定。从城市的角度理解，他认为“城市”是一个译自国外的说法，与中国语境不同，在比较早的文献中也没有“城市”这个说法，只有“城”和“邑”。一方面，城市首先暗示了它包含商业性质的“市”，而在中国，从出现金属货币的角度看，直到东周才会出现固定的“市”。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城市”里没有合适的商品交流场所，反而很容易找到墓地，这也说明两种语境下说到的城市是不一样的。这些

都是“城邑”与“城市”的区别，这也是城市演变史研究中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孙庆伟教授表示，城市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有两个方面，也就是遗迹和遗物，其中遗迹是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或者接触的对象，研究遗物也应该放在遗迹的背景下。城市或者城邑是遗迹的综合体和集大成者，对城市考古的研究可以有很多成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受到讲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新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有从挖文物到挖社会的转变，有很成功的聚落考古，它的高级形态就是城市考古。因此，从考古学发展过程来看，城市考古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城市考古也面临长期的困难，就是材料的全面性和资料性不足以应付深入的系统研究。考古发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过程缓慢，也不可能投入全部学者，等不到发掘成果全部展现。因此，不是这部书没有进行研究，而是城市考古学科本身就有这样的局限性。可以研究的类似于刘绪教授提到的城市墓葬问题，讨论它发生了哪些大的阶段变化、保持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在这些方面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杭侃教授格外注意到了对书的编法。他认为，将“城市”改为“城邑”，不仅处理了原来的题目带来的争议，而且解放了讨论对象。这部书是一部做得很好的工具书，在考古学界完成的是一项基础的工作，可以说是嘉惠学林。另外，资料书也一定会体现作者聚类分析的痕迹。从编法上看，这部书特别适合解决困惑，不仅仅是目录性质的书。例如，在对早期的考古学感兴趣的时候，会发现文献很多、考古材料很多，让人无所适从，这时就需要这样一部带有研究性质而又具有工具性质的书。杭侃教授还提到许宏教授称这本书像一部教材，但是认为不是在课堂上教授的教材，而是做相关研究所需的像敲门砖一样的参考资料。对此，许宏教授补充说，这部书的自我定位更像是教辅读物。

在接下来的研讨中，严志斌研究员认为《先秦城邑考古》的出版正当其时：从许宏教授写作博士论文至今，对于城址的发掘经历了从兴高采烈到没有什么声音的变化，有必要对二十多年里大城址或者“围子”进行总结。在有关城市的思考中，严志斌研究员还提出了关注对立面的方法，例如，在研究城市遗址的时候关注当时的乡村遗址和小聚落，才能更好地理解城址。另一个有关城市考古的问题是城与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类研究还比较少，但是在所谓的城邑考古中很重要。可以思考的问题包括城邑的资源、范围交叠、城市本身的竞争或者敌对状态。城与城之间的关系网也长期存在，例如在所谓的周国的同一种文化的天下，城市之间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究竟有怎样的竞争。

刘未副教授认为，城市考古的很多中心都放在都城上面，在都城间考虑前后关系，就像穿串，缺乏时代的观察；《先秦城邑考古》这部书首先把各个时代的横切面的观察提到日程上来，并且刺激了先秦以后的其他历史时期的资料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地图和卫星照片。这部书自身也展现了在城邑考古的领域里怎样积累起资料，供研究其他历史时期的学者效仿开展类似的基础工作。作为读者，也可以看出许宏教授花大力气修订了书中的图片和图表。在此基础上，学界还需要进一步统一信息在图片上的取舍和表示。最后，刘未副教授还提出一项阶段性工作，借助田野调查的结果更细致地推进对资料的处理，具体地说，通过开展区域性工作为资料提供补充，并且确定城址的建筑年代。

之后发言的是唐晓峰教授。他首先表达了对这部书的一个直观印象，一个就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城邑如此之多。因为中国的古城基础大多是夯土，天长日久，所以看上去并不起眼，倘若像欧洲那样的石头城，那大地上古城的景观就很显眼了。中国是古代城市遗存最丰富的国家。今天的城市大多是在隋唐城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的城市基本都被放弃而成为废墟，《水经注》里有很多“故城”的记载，古城址已经成为中国地理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另一个印象是内心的喜悦，因为这部书为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先秦城市提供了信心。过去想研究先秦城市，有一个不敢下手的犹豫不决的原因就是：怎么能把那些考古资料找全了呢？现在有了这部书，让感兴趣的学者敢下手研究先秦城邑了，这对学术界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都研究古代城市，但历史地理学多一个方面，就是城外的环境。城外的事情考古学一般不关注。对于刚才严志斌研究员和刘未教授提到的城外的问题，唐晓峰教授也持相同看法。

研究古代城邑，历史地理学关心三个体系，一是环境体系，二是规划建设体系，三是城市群的体系。唐晓峰提起，刘未教授谈到了城市的环境体系，周围的自然地理要素，那些和城市建设有关的东西。他继续说，要理解一座城市，就需要把三类体系和要素都拿出来，讲解这些要素在什么方面发生了作用，或者由于城市的出现，这些要素又发生了什么改变。城市研究学科更多地是讨论这些互动关系。历史地理学不是一个独门私活，只有专业者才去做；实际上你只要去对一个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你就一定会走到这件事情的地理方面上来，会想到它的地理环境、空间关系等问题。

关于城市的研究，唐晓峰教授提出了如何研究城市群的体系问题，例如，应该用什么指标说两个城市在一个体系里面，城市体系识别是一个问题，找到形成体系的机制是一个关键。例如，在运河沿岸的城市的关系中，运河本身有一个人文的内在机制，我们可以说运河沿岸的城市有一个体系，但是自然河流沿岸的城市未必成体系。同样地，对于我国的大量的城址，无论规模的级别和社会发展的级别，都应该指出一些指标性的东西来进行比较。

最后，唐晓峰教授还建议，城市考古要在大区域中看一座城市。过去有一个例子，一座城址出现在湖泊旁边，非常奇怪，到了现场才看到那不是湖泊，而是修建大坝之后形成的水坑，在没有大坝的时候是一条大河，城市出现在大河岸边，这才合理，如果当时这样用历史地图表示，就解释清楚了。许宏先生这部书中很多城市也把地理环境画出来看，很不错。当然，画地貌确实不容易，特别是画等高线，看起来显得很乱。另外，有些城市考古图把不同时

许宏研究员

代的遗址都画在一起，看起来也显得乱。这样的图有历史变化的比较，但如果另外再把每一个时期的遗址单独画成一张图，就会更清楚一些了。

张朴远副社长谈到了出版这部书的思路。首先，金城出版社是中办下属的出版社，虽然其专业不是文博考古，但是有一个对文博有一定积累的编辑团队，也有一本广泛发行的专业杂志，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出版学术著作。其次，这部书属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有学术性、文化传承，有独创性，也有资料性，内容比较全面，得到了国家项目的支持。最后，出版社之前就有出版综合的考古论著的考虑，这部书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出版的，经过许宏教授的打磨，形成了现在的成果。

欧阳云编辑更具体地介绍了出版的过程。作为编辑，他在读稿子四五遍之后大概理解了作者的思路，又查阅许宏教授之前的作品，理清了整个学术体系，也渐渐形成了这本书怎样体现学术体系、出版成什么样的概念，最后才开始做封面、附图二维码、地图等细致的工作。全部 400 幅图附有二维码，在研究论著中是个新的尝试。便利读者使用，出版社的服务器至少可以保持十到二十年的基本运营，可以随时替换最新的图片，供读者下载使用，促进学科的研究。

李零教授从这部书的特色说到了考古学人的工作风格。在考古学这个大的学问中，越学越觉得自己渺小，因此做资料性的工作才更显得有意义。同时，正是因为考古学的浩瀚，行内的人常常太忙，但是又只有行内的人才能坐下来思考消化多年的工作，最终写出来的才是一部帮助别人读书、帮助别人理解学科的写作成果。另外，

许宏教授之前就在思考理论问题，最后回到资料长编式的内容，由博返约，又由约返博，并没有丢掉之前的理论思考和框架，这部书中其实还是谈了很多与先秦城市有关的理论问题。

在关于《先秦城邑考古》的讨论中，可以提出很多关于城市考古和城市史的问题。其一，中国是一个史料丰富的国家，从地理的角度、从古文字的角度都有很多问题值得提出。其二，李零教授认为，“城市”是一个外来语，主要还不是早晚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和其他国家的城市的形态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城邑考古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个方面，无论是政区还是地形地貌研究，都有很多的层次。其三，许宏教授在这部书中进行了区域性的划分，但是在分块研究的体系中还有一些不太清楚，可以继续探讨。最后，对于书中学术资料的利用问题，李零教授赞同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肯定了许宏教授和出版社在读者使用书中资料上提供的便利，让这部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许宏教授最后说，恩师徐苹芳先生曾经希望与年轻学者一道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甚至古代城市史的论著，这部书也算是给徐先生的一个初步的答卷，其中有着学术上的传承，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不够。考古学是一门本原性的学科，它能够给其他学科提供给养和灵感，因此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有助于历史文化、城市建设和规划、古代社会制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甚至为公众利用和掌握。但这项研究目前还很粗浅，在搭建起这个框架之后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进一步精进。

最后，许宏教授和其他学者还回答了与会者的问题，就《先秦城邑考古》和与其相关的话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撰稿：刘小雨）

08

休谟与启蒙运动——《大卫·休谟传》读书研讨会

2018 年 3 月 17 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休谟与启蒙运动——《大卫·休谟传》读书研讨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周保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张正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杨璐作主题发

言。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教授吴红列、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出席本次会议并担任评议。

本次研讨会围绕由北京启真馆出版的《大卫·休谟传》一书展开。会议伊始，李宏图教授表示，举办本次研讨会是为了讨论研究大卫·休谟对当下的意义。三位评议人随后发言。

吴红列教授首先发言。他首先肯定了《休谟传》的可读性及中文译文的流畅性，继而指出，休谟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书籍在国外如同恒河沙数——也正因如此，以他为传主的传记书写难度极大。莫斯纳（Earnest C. Messner）的这本《休谟传》却摆脱了人们一直以来贴在休谟身上的“哲学家”“思想家”标签，以“文人”这一新颖独到的定位书写大卫·休谟的人生。此举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更还原了其作为一名 18 世纪文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吴红列教授指出，今日我们在做思想史研究时，不能单看研究对象的著作，还要考虑其写下文句时身处的环境和想法——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思路发展。人物传记写得再好，终究还是第二手资料。我们都盼望着由周保巍老师译著的《休谟通信集》能早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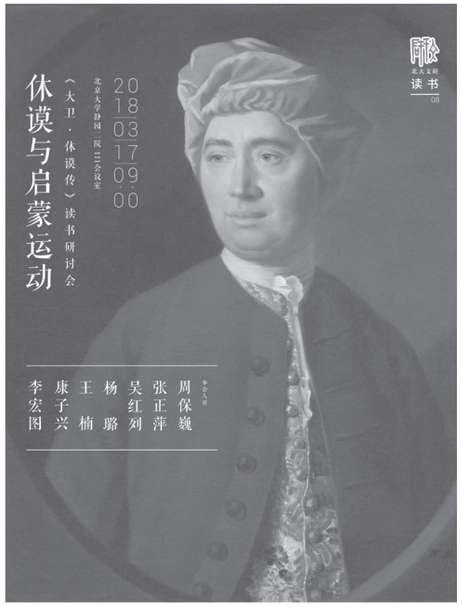
接下来，康子兴副教授以一篇题为《凡人休谟》的文章开始了评议。该文将莫斯纳《休谟传》的贡献总结为：将休谟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凡夫。康子兴副教授表示，自己起初对这一评价并不赞同，传记书写中过多的生活细节、时代背景描写无益于理解传主思想。但在完成阅读之后，他转变了看法：书中对休谟个人生活的描写虽篇幅巨大，但首次面世的新材料众多，且作者在评述休谟的生活、思想时行文非常克制。

康子兴副教授特别就本书最后的章节，亦是休谟一生中最后的著作——自传《我的一生》展开了探讨。他指出，休谟特意为自己的死亡而写作这一行为，具有很强的哲学上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这部自传，让他的死成为“再生”的契机——自己虽然死去，但后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著作的讨论会让另一个精神性的休谟在众人的评议中永存。这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思考方式。

随后，张正萍老师继续探讨哲人之死。她认为，休谟在墓碑上不留一字的做法，意在将自己的怀疑主义思想留给世人评判。她强调，休谟不仅是“文人”，更是“启蒙文人”。他对宗教的观点引发了 18 世纪主流社会人士的强烈抨击，也被同时代学者指控为“异端学说”。但现在看来，休谟的怀疑主义时期正是他作为启蒙哲学家留给世人最宝贵的遗产。

《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道德的判断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道德感”等观点。这些观点为何触动了同时代学者的敏感神经？又为休谟招来了哈奇森等人怎样的批评？对此，张正萍老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她最后总结道，尽管莫斯纳在《休谟传》中并未过多着墨于评判休谟的思想，但从篇幅安排以及全书洋溢的启蒙色彩中可以感受到，莫斯纳在试图突出休谟的“启蒙哲人”身份。

在听取评议人意见后，《休谟传》译者周保巍副教授对其中一些观点做出了回应。他赞同“休谟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公正评价”的看法，又同张正萍就“休谟是否是怀疑主义者”这一观点交换了看法。他指出，哈奇森对休谟的反感并非因为他视休谟为怀疑主义者，而在于二者从事道德事业时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画家路径，哈奇森通过描述道德本身的美好驱动众人做善事；另一种是休谟式的解构学家路径，即以全然理性的态度对待道德。哈奇森认为，休谟在对待道德事业时缺少温暖，他重视的是道德判断背后的运作机制——二者的隔阂正在于此。



周保巍副教授还表示，休谟对 18 世纪宗教信仰的真正威胁在于，他抽离了宗教的前提，转而从人类的知、情、意中推断出道德的法则。此外，他还从逻辑上驳斥了对有限世界背后有一位无限的全知全善全能神的推导。

接下来，张正萍老师开始了后半阶段的主题发言。她首先介绍了对自己的论文（《激情的自然史与休谟的商业社会观》）起到了铺垫作用的三种前人研究，而后重点阐述了“文明（市民）社会”与“商业社会”的区别。张正萍认为，我们讨论“文明（市民）社会”一词时虽然也会涉及历史，但总体偏向于在共识性的维度上讨论它的政治含义；“商业社会”则不同，这一概念本就源于人类发展四阶段论，是典型的历史观。张正萍表示，由此处开展研究，可以对休谟是否将 18 世纪的人性研究普遍适用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这一问题进行论证。她坦言，这正是自己选题的初衷，即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对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中针对休谟的一些批判观点进行反驳。随后，张正萍进一步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框架。王楠副教授赞扬了她的研究方向和设想，建议她深入挖掘同为休谟著作的《英国史》，并将其与《人性论》结合，进一步还原休谟对人性和历史的看法。

之后的讨论围绕杨璐老师《同情与效用：大卫·休谟的道德科学》这一论文展开。该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休谟放在道德科学兴起的传统里考察其方法论转变、问题意识和基本任务，并揭示出社会学自身的精神性面相。杨璐介绍道，论文事实上的主体是“观念论的改造”。这一章节处理了休谟是如何突破现代哲学观念论的困境，将规范秩序重新奠基在对人的观念、

想象、激情、动机、行动等社会性机制的理解之上等问题。

此外，杨璐也谈到了休谟的墓碑。她认为，正如无字的墓碑一般，休谟的《人性论》也没有独断式的结论。他的理论至今仍是敞开的，留给后人不断修正、丰富的空间。在研究过程中，这一点带给了她很多感动。

吴红列教授表示，在阅读苏格兰思想家的著作时一定要考虑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自成一套的法律体系。自然法的引进冲击了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此后，我们在哈奇森、休谟、斯密、亚当·福格森、约翰·米勒等思想家的著作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条影响脉络。从依靠外界约束力转向从情感出发，并以审慎、自律的态度追求道德——这一变化体现了苏格兰历代思想家的努力。

吴红列教授还谈到，亚当·斯密和休谟私交甚密，二人对商业社会等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唯独在道德情感的问题上，亚当·斯密引《道德情操论》第四卷对休谟的效用论进行了批判。吴红列教授认为，要理解休谟的效用论，一定要熟悉亚当·斯密的批判。他还指出，二人的分歧归根究底在于同情理论的不同。

研讨会临近尾声，与会学者围绕休谟思想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李宏图教授将整场讨论归纳为简单的两点，既“凡人休谟”与“文人休谟”。“凡人休谟”研究的意义在于挖掘其生活经历同个人情感与思想之间的关联；“文人休谟”则直接点明其作为启蒙者的身份。李宏图教授表示，在当下，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 18 世纪的苏格兰有很多相似之处。李宏图教授还希望借由对休谟的研究提醒中国学者，可以为剧烈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做一些启蒙式的工作。

（撰稿：刘梦菲）

09

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十里八村》研读会

2018 年 4 月 9 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十里八村》研读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副教授冯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珊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一书展开。韩茂莉教授首先说明了《十里八村》一书的研究视角。本书研究的是山西“乡村社会地理”，但从学术角度来看，其实更侧重于历史地理和地方历史研究，即用地方的历史依据和历史材料来研究地方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讨论的“社会地理”并非仅针对地理与空间问题，而是囊括了村民生产生活的所有空间，即从“田头”到“炕头”。其中心是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它把农民的一切活动都牢牢束缚于此。在中心之外，还有婚姻、祭祀、交易、行政等重要环节。这些活动都可被容纳在以自己所在村落为中心的空间范围中，这个范围即俗语中常说的“十里八村”。接下来，韩茂莉教授从乡村集市与水权两方面论述了“十里八村”这一空间范畴的形成。

一、乡村集市与村民认知空间

农村生产生活中最基本的制约因素便是土地。因此，为了照顾农业生产，农民的所有活动都要在一日之内往返。对于山西农民来说，“一日之内往返”的距离正是“十里八村”，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很好地概括了村民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范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际间的商业活动，村民参与交易的距离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空间，也构成了村际间的婚姻圈与祭祀圈。在本次研读会中，韩茂莉教授从乡村集市来说明“十里八村”的形成与作用机制。

地形上来看，山西以高原为主，“定期市”一直是村民们主要的交易形式。定期市也称作“赶集”，是商业活动的较低阶段。但对于村民来说，它不仅是交换剩余产品的场所，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与娱乐场所。村民们的交易需求支撑起定期市的形成，而村民需求力度的大小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决定了定期市的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集市门槛值（即维持集市所需要的人口与购买力）低、集市密度大、间距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集市门槛值高、集市密度小、间距远。在四川，定期市的覆盖范围大约在一里半到四五里之间。而在山西，这一覆盖范围扩大至“十里八村”。

即便在同一地区，各个村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定期市的集期与客源区范围也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单日集与双日集在交易服务中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单双日集覆盖范围的交叉，两个集市构成同一个客源区，而这一组单双日集的交叉地区与另外一组单双日集的交叉地区则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客源区。于是，不同的村落就在客源区的大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共享空间。这个空间为村民们提供交易场所，也为将来的婚姻、结社提供了交往圈子。因此，定期市也往往成为村际间的社交中心。

以晋城县为例，无论是单日集还是双日集，县城所在的城关镇的商家数量都远超其他村镇，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级别较高的交易点。但即便如此，也只有距离城关镇较近的村民才会去这里交易，如果往返超出一日距离，村民们还是会选择去自己村落“十里八村”以内的集市。所以对于村民来说，集市没有“较高等级”与“较低等级”之分，仅以“十里八村”为限。像城关镇这样的大集市只对职业商人有意义，这些商人游走于各个集市之间，平衡不同地区的商品需求，他们的交

易轨迹和活动范围与农民是完全不同的。总之，虽然村民进行的是较低层次的商业行为，他们的交易活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这样一个涵盖了“十里八村”的交易空间已可以囊括村民的全部基本生活。

二、水权与乡村社会

接下来，韩茂莉教授谈到了乡村社会的另一层面——“乡村精英”。历史上的大部分王朝都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官员”皆非国家任命，而从本地农民中挑选，且享有很大的话语权。但这些精英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韩茂莉教授从乡村水权找到了解决思路。

山西是一个半干旱地区，水权便是生存权，它的重要性甚至在政权之上。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山西百姓们修建了很多用来引水灌溉的渠道。这些渠道由村民集资修建，管理者自然也从村民中产生。从渠道的管理制度可以看到，山西农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了两套以水为本的空间管理体系——以水渠为中心的“地缘水权圈”和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

“地缘水权圈”以渠系为中心，涉及到上中下游利益分配的问题。试举一例，山西著名的民营渠道“通利渠”全长 100 多公里，流经三个区县。“自在使水，永不兴工”，其中上游地区灌溉不受亩数和时间限制，也无需负责渠道的日常养护。这是因为渠道的修建其实是将上游村落独有的水源由三个区县共享，中下游地区的村落若要换取上游水权自然要多付出成本。此外，通利渠还规定，

韩茂莉教授

作为渠道的最高管理者，渠长必须从下游村落选出。在整个灌溉过程中，下游处于利益最难保证的地方。从下游选出渠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一渠段的利益。并且，为了保护这一利益最薄弱地区，每年来水时都要先由下游灌溉。当然，在具体的灌溉过程中，整个秩序的维持还需渠长同村民间不断协调。在大旱年水源不够的情况下，已经定下来的秩序有可能被打破，这时，就会产生械斗。

械斗关联着第二个体系，也就是“血缘水权圈”。依附血缘关系的家族水权，来自渠长的权力。渠长承担了整个水渠的管理工作，也会获得一定的额外利益。比如，一个月固定的灌溉日一般为 28 天，若某个月超过 28 天，多出来的灌溉权则归渠长所有。渠长可多浇灌自己的田地，也可卖给其他农户。那么，作为享有特殊利益的“乡村精英”，渠长是如何选出的呢？一般来说，渠长由下游家道殷实、家风良好的大户人家轮流担任。这就涉及到了这一职位背后的预付资本，这个预付资本既包括祖先的传承积累，也包括修筑水渠时的投入，甚至还包括械斗中的人员牺牲。这些资本共同构成了乡村中的精英阶层。

总之，历史上的朝廷官员虽然只任命到县级，但乡间也一直保有自己的秩序。村民在保障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依靠利益形成了统一的保障圈。这个圈子在山西农村以水权为中心，它维系着十里八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最后，韩茂莉教授谈到，因缺乏实际经验，只能依据样本提供的历史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

随后，唐晓峰教授发言。他认为，由于时代不同，自己经历的农村生活同本书中描写的农村生活有很大差别，但这一差别也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对照性视角。唐晓峰教授亲历的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自由交易和祭祀已基本消失。公社化时期，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生产单位也从一家一户变成了的生产队，劳动报酬以工分计算。韩茂莉教授提到的“剩余粮食”在合作化时期也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农民上交的粮食不是按“剩余”，而是按指标——这也是后来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唐晓峰教授还提到，当时他们去农村插队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是针对全国解放以后的新形势而言，要农民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另有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做了较大的牺牲。

公社化时代农村限制私人商品交换，自然也看不到“集市”，农民不能自己生产的用品大都可以在村里的合作社买到。关于商业问题，茂莉教授在书中提出传统社会的商业“二元”论，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与城镇工商业者的商业活动是不交融的，这个观点很重要。过去，我们在书本上读到，小生产者会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于是简单地以为农民也是小生产者，也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像山西这样的传统农民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

唐晓峰看到过的公社大队的灌溉管理，同韩茂莉所讲的情况有些相似，不过负责灌溉的人（相当于渠长）是从生产大队这个层面上选出来的，他们对水系渠道最为熟悉。灌溉的时候，“渠长”守在渠口，每个生产小队按顺序轮流计时灌溉，灌溉时间事先分配好。在一个灌溉地区，每个村子分多少水，指标也要统一规划。

公社时期，虽然是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在同一个生产队里也存在殷实户和艰苦户之分，这是各个家庭劳动力强弱不同造成的，也与个人头脑和勤奋程度的差异有关。但即使是殷实之家也达不到可以“预付资本”的程度，制度也不支持。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农村社会里一直都有一些所谓的“能人”。这些能人大致可分为两类：有头脑者和“灰旗杆子”。前者眼光长远，讲道理，在村中享有威望；后者聪明，但不讲常理，敢打敢闹，这类人在特殊时期会起作用。

关于“十里八村”这一核心论述，唐晓峰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过去，农民的活动范围的确非常小，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呆在“十里八村”的范围内，即使是公社化时期也差不多。因此，作为一个相当有限且

封闭的空间，村子便成为了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名字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大家从小就熟悉，有个小名，可以用一辈子。只有准备走出农村的人（上学、当兵），才认真起个好听的名字。

唐晓峰教授最后说，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已完全不具备书中所描绘的那种乡村面貌了。而至于未来的农村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不过，韩茂莉教授研究的是中国传统农村最为基础的体制构建，是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维持发展和稳定的自主机制。要认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必须懂这个机制。农村的现代变革，也是从这个机制出发的，成就也好，问题也好，都在参照它。正因为此，韩茂莉教授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接下来，冯健副教授发言。他非常认同韩教授提出的“十里八村”，这一空间尺度在当今依然发挥着作用，并构成了我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半径”。冯健副教授例举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这一项目需要将宁夏某个农村的居民全部搬迁到城镇上。因耕作工作变得十分不便，很多农民并不乐意搬迁。可以看出，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无法摆脱“一日往返”的生活半径。此外，本书也让我们意识到，不应仅仅为了节约土地就“一刀切”地全部拆迁入楼，而应更多考虑农村一直以来的发展规律和空间布局。冯健副教授还提到加速乡村文明衰落的“空心化”问题和“剩男”问题，而韩教授所做的研究正是当前农村建设所欠缺的。

杭侃教授指出，考古学也是一门乡土学科。作为一个地理层面相对独立的单位，山西保存有很多古建筑。2001 年，杭侃教授在去山西考古途中也注意到，村民们只熟悉本村的古庙。庙直接关系着村民的祭祀活动，建筑排布格局与上香群众出处均是考古工作者在研究中要考虑的问题。杭侃教授还就自己家乡（江苏南通农村）的情形与韩茂莉教授进行交流，希望她可进一步研究山西农村“十里八村”的空间规律能否运用于更广的江南农村。

陈晓珊副研究员表示，从古代行政区划的改革中也可以看到出人的生活半径在发挥作用。古代划分区界一般遵循“百里为县”。“百里”是平原地区一天之能走完的路程，这个距离保证了人们若在早上从一个县出发，晚上可在另一个县下榻休息。但是，在非平原地区，“百里为县”不再适用。以书中的山西高原地区为例，可在一日之内往返的距离只有“十里八村”，因此，各朝各代的行政区划也要按照不同地区的“一日之程”不断调整。且人们的生活半径和工作半径虽有着固定的规律，但在具体条件下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蔬菜瓜果一般会种植在距城镇较近的地方，五谷杂粮则会种植在较远的地方，这是由农产品保鲜期不同决定的。即便在交通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时下流行的“江浙沪包邮”便是一例。

最后，韩茂莉教授和与谈老师就相关问题同听众作了进一步交流。

（撰稿：孔博琳）

10

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研读会

2018 年 4 月 13 日下午，“文研读书”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教授陆扬，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出席并参与讨论。

侯旭东教授

本次研读会围绕侯旭东教授的著作《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展开。这本书以西汉为例，将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细分为礼仪型与信 – 任型两类。后者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产生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极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书结合西汉历史，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来分析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其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引领西汉历史的方式。此外，本书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

研读会伊始，侯旭东教授首先分享了《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的创作背景和想法。首先，这本书参照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以西汉的完整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该书第二、三部分以描述性内容为主，包括西汉的一些表征、不同时期皇帝及其亲宠的关系等，其余部分以分析性内容为主，但总体来讲还是个案研究。

侯旭东教授指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大部分学者关心的是变化，但变化带来的后果其实是历史中延续的（或说不变）的层面。侯旭东教授强调的恰恰是其他学者关心较少的，即变化中不变的部

分。具体来说是人的活动，或是人的活动所形成的互动关系。他相信所有人都在创造历史，而帝王将相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更大，所以更需要被揭示出来。此外，侯旭东教授也在思考如何恢复历史。过去的历史讲了很多规律，结构性的东西较多，而人自身的因素实际上被严重压制了。我们是观察者，同时也是行动者、实践者。我们既观察过去，也在现实中创造历史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被所谓的规律所束缚，而应该看到人的创造性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在侯旭东教授的分享之后，阎步克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面对一个课题或者一本著作，最重要的是弄清该课题或著作在既往知识体系和历史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秦汉建立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官僚制度，但在各种组织中，非正式关系、个人化行为还是普遍存在的。《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以宠为线索，叙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争宠、失宠的行为与命运。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读者感受到的是一部人间悲喜剧、一系列的命运交响诗、一幅争宠的风情画。但是，作者也有大量理论分析，阐释了邀宠、得宠的手法、形式以及条件效果等。阎步克教授认为，侯旭东教授选择西汉作为研究案例是很明智的。赵翼曾言，秦汉之间是天地一大变局，建国者是一群无赖，而此事自古未有。所以，西汉非常平民化，升官模式化程度也低于科举时代。所以，宠信、富贵无常等现象较为突出。虽然西汉具有特殊性，但放眼古今中外，争宠现象则为普遍现象。如家国不分时，家奴也能获得巨大权势，这与作者所关注的侍从有关。

阎步克教授还从侯旭东教授的书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现象。首先，邀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邀宠能够改变身份，一种是邀宠不能改变身份。贵族的仆人也会邀宠，但无法改变其奴仆的身份。其次，既有制度性的邀宠，也有非制度性的邀重。如后妃为皇帝提供性爱是其职责，而大臣的邀宠则不是其法定责任。此外，阎步克教授还提到五个规则。其一，专制程度越高，邀宠越有意义，因为趋炎附势是大多数人的天性。其二，社会越平民化，流动性越强，邀宠行为就越普遍，因为邀宠为改变命运提供了可能性。其三，官僚的贵族化程度提高，邀宠行为的意义下降，因为贵族不愿邀宠（如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其四，官员竞争模式的稳定程度、成熟程度若上升，邀宠行为就会下降。其五，士人的影响力上升，邀宠行为意义下降，东汉名士强调文化，他们就不邀宠。

阎步克教授进而指出，在词典里，“宠”指的是上对下的偏爱。“偏”，指的是一个人有才能，皇帝愿意任用他；“爱”，则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不是政治行政的必要条件。在古人看来，假如十个有才能的人，皇帝对一个人情有独钟，说明他能让皇上开心，这大约就是“偏”。书中有很多关于大臣和政治的部分，但是在“偏”和“爱”之间出现了边界的模糊性。书中附注二列有进士、大臣、宦官等，这些人其实都从其他角度被研究过。尤其是大臣，他们的臣服具有政治性，可能出于政治势力、政治斗争或行政的需要，且与人事关系密切相关。

读书会现场

此外，阎步克教授还对书中所提出的“告别线性历史观”的方法论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东晋门阀政治》不是线性历史观。按照线索叙述，依据时间展开，是史学的基本方法。没有在超越历史学的层次上，有个理论建构，来论证特定的历史目的，就不是线性历史观。如果盲目扩大其内涵，那么每个历史研究者都难逃法网。第二，线性历史观也不需要告别。每一种理论模式就好比从特定角度投射到黑暗历史客体的探照灯光，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其他角度所看不见的景象，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制度史观，以及环境生态史观等。所以，每种史观都有自身特殊的价值。

接下来，孙正军副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初读《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选题以及叙述的模式，不过，这可能与侯旭东教授对日常统治研究的关注有关。他认为，候旭东教授对所谓日常统治有明确的认识，特别强调在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上的“日常”。

孙正军副教授熟悉的叙述方式一般是围绕政治事件的演进、政治集团的争夺或政治文化的善变等来推进的，时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虽然描述的是西汉两百年的历史，但提及的时间维度却不是很多，书中反复循环出现的是上一朝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与下一朝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之间的联系。他表示，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叙述中时间维度的缺失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没有时间维度，循环反复出现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容易被认为是同样性质的，且难以区分其影响。此外，孙正军副教授也提出了“边界模糊性”的问题。一部分人虽然与皇帝结成信任型君臣关系，但是对政治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不同时期，信任型君臣关系可能是有差异的，关键是如何定义这种关系——或许

需要在这批人内部进行更清晰的划分。

随后，田耕助理教授发言。他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定义上的困难。侯旭东教授定义恩宠的关系并不从制度性入手的，而是关系性的定义。这种定义看似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但追踪史料，寻找哪些人背负信任型关系却并非社会学讨论的内容。

田耕助理教授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较为具体。侯旭东教授在第三章中对信任关系进行展开，其中两个基本的论述点就是关系的过程和关系的关系。从关系的过程来看，信和任这两种关系很可能发生在一个宠臣的生命历程中，出现由信而任和有信无任两种发展轨迹。田耕助理教授表示，需要集中地把具有因果关系的信任和没有发展成因果关系的信任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何种君臣关系最后走到了由信而任（即两种关系合流的形态）？何种君臣关系最后无疾而终（即信、任未能合流）？从关系的关系来看，它意味着信的关系和任的关系可能在某一宠臣身上同时存在。而如何看待同时存在于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人身上的两种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祎楠助理教授随后发言。他认为，侯旭东教授创作《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的目的是在对理论或方法论的重新反思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历史的研究，进而重新激活传统中国的历史，发现新内容。侯旭东教授在书中想要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机制、历史环境中，为什么信、宠可以产生？罗祎楠助理教授认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公开组织，一种是私人的、私密的政治之间的互相信任。《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有很强的对话意识，他希望读者理解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基于概念构造出来的、对历史的结构性解释，另一种是基于概念构造出来的、对历史长时段变化趋势的描述性解释。

侯旭东教授提出的走向历史机制的研究，其方法和意识的本质是要通过历史机制这样的因果力量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并尝试进行理论化。罗祎楠助理教授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历史研究变成枯燥的社会研究，但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历史资料。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之前更多关注的是材料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新的研究则要更多地关注核心方法论跟材料分析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重新对这本书以及对其他中国传统历史资料的方法学、技术学以及编纂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理解。

在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上，罗祎楠助理教授认为，侯旭东教授使用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是纪传资料，属于自我表达型的资料（如书信以及关于儒生的讨论）。这部分资料是思想史研究重要的自我表达的文本，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人和人之间在具像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中进行对话的图景。而这种对话不断地推动事件发展，最终塑造出基于信的政治逻辑。

接下来发言的是应星教授。他指出，其对《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最直观、最有冲击力的感受是社会学和史学的深度融合。从社会学的角度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隔离。应星教授尝试打通所谓的政治运作和非政治的关系，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之处：侯旭东教授在书中使用了关系事件的分析模式，分析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人物或关系本身。应星教授所理解的关系事件是要通过事件分析作为支撑，打通所谓国家权力的关系和所谓日常的关系。基于此，应星教授认为，这种分析的张力不足，复杂性不足，所展现出来的关系是平面的。

此外，应星教授指出，书中划分了信任型和礼仪型两种理想类型，但是对礼仪型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比如，所谓忠臣和良臣、争宠和媚道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一般性？或说在西汉的历史中，它具有哪些特殊的影响？应星教授认为，书中对这个方面的历史分析展开不足，对西汉历史和对帝制中国的关系类型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争议。

接下来李猛教授发言。他认为，侯旭东教授希望通过所谓检讨线性历史观打开国家的思路，获得重新理解古代中国国家的想法。这种做法能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基于其自身逻辑的动力机制的把握。此外，他还认为，官僚制这一概念较为复杂，且时间跨度大。我们应在本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所谓理性化和官僚制的成分。

李猛教授提出，在整个历史进展中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建设或政治体系的发展，它代表了一个传统的古典秩序的崩坏。而崩坏和建设是同时的。同时代人会对这个时代产生疑问，现代历史学则从两个角度研究这个时代。在侯旭东教授所说的比较带有私人性的关系的部分，能够看到政治重组的、新的发展舞台。政治体制重组在何处？怎么转成新的体制中私人化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定义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就是所谓礼仪型和信任型关系。关于侯旭东教授在研究君臣关系的时候提到了一套东西，李猛教授认为，这可能就是现代国家最初最根本的含义。十五、十六世纪现代国家的形态在意大利发现的时候，是与个人高度联合在一起的，借助私人性发展未来具有公共政治意含的事物恰恰是后古典时代政治发育的重要方式。

李猛教授还指出，在官僚制世界中仍然有人的活动空间与感情，从儒家的角度来说这是媚道，但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甚至相反的东西蕴含其中呢？李猛教授提出侯旭东教授在书中提供了处理人和制度关系的思路，提供了思考中国古代国家的新思路，这种思路是否能够在信任性的关系和制度结构之间建立更有机的联系？ 李猛教授表示期待侯老师后面的研究能够继续展现研究视角的潜力。

最后，陆扬教授发言。他表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不应过度融合。历史学的特殊之处在于方法的灵活，即使采用了社会科学中的某些概念，落实到历史学的时候却是非常具体的，揭示的层面也是非常特殊的——否则历史学的力量就无法显示。和前面几位教授一样，陆扬教授也认为侯旭东教授并未特别强调时间的维度，但他强调空间的构造。当时人际关系、个人关系的不同层次是通过空间体现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

陆扬教授指出，侯旭东教授反对线性史观，反对结构性的论述，其分析中结构主义的成分比较明显。但复杂的个人之间

的关系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很难把握的。正是因为难把握，侯旭东教授才使用了很多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的介入让读者进入历史世界。这种做法同时也会产生问题，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潜在的历史解释。单纯的描述是不可行的，历史解释的出现不可避免。

陆扬教授还强调了“私”的概念在帝国政治运用中的重要性。“私”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被认可的。有些在日常的政治舆论、公共话语中被认可，有些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关系中被认可，还有些完全不被认可。如果不在特殊的语境下对这个概念进行较精细的分析，整个讨论就会缺乏说明力。个人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身体。私人关系在实质上就是身体的疏远与亲近。陆扬教授认为，整本书虽然提到空间的内外、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似乎却没有把身体这个概念单独列出。关于汉代如何看待身体观念、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观念为何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此外，陆扬教授还提出两个问题。在秦汉时期，个人的因素特别突出，它的突出不是日常的运作都是通过个人的关系而建立，而是个人的关系在权利运作中被广泛认可。这个时期，皇帝作为一个个体的君主，其个人意义在体制运作中尤为突出，这种个人得意义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际介入的。那么，“宠”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模式还是中华帝国政治运作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公共舆论对宠或信这种关系的认可程度，是否和这类关系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相同？换言之，我们是否能够将前者作为后者判断的依据？

陆扬教授发言过后，侯旭东教授作出回应。他指出，李猛教授以及应星教授的论文为其提供了很多理论上的启发。来自史学以外的灵感和理论上的启示是很重要的，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关于陆扬教授最后提出的问题（即宠是否为特殊的模式），侯旭东教授表示，他只对汉代进行研究，由于王朝的政治构造的不同，其他时期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关于告别线性史观，侯旭东教授认为，中国在建立国家体制方面，秦代已经达到顶峰，之后都在退化。研读会最后，侯旭东教授表示，历史的演进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撰稿：卢雨枫）

（六）静园雅集

19

刘铮：现代北大学者的西文藏书

书评人刘铮

2018 年 3 月 30 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现代北大学者的西文藏书”。南方都市报社编辑、书评人刘铮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高峰枫教授首先对刘铮老师作简要介绍。刘铮，笔名乔纳森，编辑、书评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职于广州南方都市报社。刘铮著有《始有集》，编有《日本读书论》,文章刊登于《万象》、《读书》、《文汇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报刊杂志，并曾在《南方都市报》开有专栏“西书识小”。

本场讲座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域外编、本色编、反差编和受赠编。讲座伊始，刘铮首先对主题——“现代北大学者的西文藏书”包含的几个概念进行说明。现代指民国时期；北大则指广义上的北大，包括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学者，从广义上理解，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即算在内；北大学者，则指毕业或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人；西文，指西方文字，本次讲座仅限于英、法、德三门外语；藏书，指有收藏者明确特征的书。此外，刘铮还指出了目前开展学人藏书研究存在的困难：其一，出于战乱、劫难、图书馆管理的疏漏以及无整体保存意识等因素，几乎无法对中国现代学者的西文藏书做某一现象的整体研究；其二，尚难对中国学者西文藏书下定性判断。

第一部分中，域外编书籍主要是学者们在国外购买的。欧美始终是西文图书的最佳购买地，同时，北大学者的学术背景以洋派为主。刘铮指出，从阅读史的角度看，他所说的藏书均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考察，即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哪里（where），如何（how）、为何（why）。第一本书是德文书《现代史学史》，作者是爱德华·费特尔（Edward Vetter），编者之一则是德国著名史学家梅涅克。这本书在扉页上并无签名、印章，但在第 464 页处有中文的旁批：“此派在

德本国，曾受反对，但不久即风行全国。德国外则流传甚慢，至英在十九世纪下半纪，法史家如 Taine，尚几不知有此派。”如何判断这本书属于谁呢？刘铮在此征引了藏书研究学者周运在《姚从吾西方史学藏书点滴》中的发现，指出历史学者姚从吾的藏书有个特点，就是在书脊下部贴着手写的‘代 1123’一类数字编号的标签，很像图书馆藏书的书标，如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923）两侧编号是‘代 1756’，韦伯的《政治学论文集》的编号是‘代 1758’。由此可以认定，这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姚从吾的藏书。

第二本书是《九部现代的独幕剧》，这本小说有朱光潜的批注。朱光潜于 1922 年从香港大学毕业，1925 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1929 年转入伦敦大学，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回国，1946 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从阅读史的六角度讲，判断藏书信息时需要额外注意时间点的问题。以本书为例，书上标有“1928 年，伦敦”的字样，便为勾勒朱光潜先生的早期生活图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传统藏书家认为这些信息过于简单，但刘铮在探索后发现，这本书确实是朱光潜留下来的、时间最早的藏书。

第三本书是关于中亚的法文书，作者是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持有人写有“尹赞勋赠”等字样。尹赞勋 1919 年毕业于北大，1923 年留学法国，1931 年回国后担任地质调查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并于 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标有批注。

第四本书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持书人为王毓铨。他于 1936 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38 年应邀赴美。书上所标日期为 1939 年，可见是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选修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史时所读书品。

第五本书是语言学著作，书上写有“周一良廿九年二月十二日，买于哈佛合作社”的字样。在周一良的履历中，与此时间点相对应的是其 1939 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兼学梵文的时候。这本书可能是周一良的教材之一，内有不同颜色的批注。

随后，讲座进入第二部分——本色编。本色篇是指学者的藏书与其研究领域相关或是其感兴趣的书籍。这一部分的第一本书是狄金森的随笔《泰山》，空白页上有印章，书名页上有篆书字样“温德藏书”。这本书后又传给了另一个人，即女师大附中教师赵普孙。他收藏了很多英文书，品味较高，是藏书史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两者得书的先后顺序，尚不能确定。刘铮认为是温德在前，赵普孙排后。温德是一位值得北大人铭记在心的先生，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被尊称为“学术白求恩”。第二本书较容易辨识，书中有江绍原先生用毛笔写的批语，即“敬赠江绍原先生惠存”。

第三本书是一本英文书，内有篆书字样“袁家骅”。袁家骅于 1930 年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建国后致力于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研究。刘铮指出，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往往会受到其晚年的研究成果及其弟子表述的影响。但是，这只是人生的一个侧面。传统的藏书家认为，这本书只有一个简单的印章，并无丰富的含义，而刘铮则破除这种旧有观念，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第四本书有魏碑体的印章“李霁野”。李霁野先生 1927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鲁迅先生交好，其译作文笔甚好。

第五本书上印有“萧乾”的字样，萧乾著有《书评研究》。第六本书较好辨认，注有“赵萝蕤女士”，时间为 1947 年。赵萝蕤女士先后于 1946 年、1948 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这本书是她在美国读书期间购买的，反映了其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即对美国文学的研究。

接下来，讲座进入第三部分——反差编。反差篇是指学者的藏书类型与其学术研究方向没有直接关系。这一部分的第一本书是萧伯纳戏剧集，左上角写有书店的名字和“向达”字样。由此可以看出，该书是向达先生的藏书，日期地点为“1938 年 5 月 20 日，巴黎”。1938 年，向达已经到达巴黎，并于同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回国。

第二本书是魏尔伦的遗文集，为邵循正先生的藏书。邵先生的女儿在《忆父亲》中写道：“我原以为父亲不看小说，后来才知道古今中外的名著他几乎都看过，他学英文就看英文小说，学法文就看法文小说……他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书，发现有几本外国小说，法文的居多……”。

第三本书是蒙田的随笔集，为蒙思明的藏书。蒙思明于 1929 年至 1933 年就读于华西大学社会及历史系，1935 至 1938 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进修中国历史，《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是其毕业论文。然而，这本书与蒙思明的学术研究没有关系。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为受赠编，这一类别较为重要。第一本书中有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留下来的字样，分别是“1949 年 8 月，香港”和“雅礼，长沙，1950 年 6 月 20 日”。此外，书上的标注显示着本书后被送给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赵紫宸先生。刘铮在查阅资料后发现，书的持有人叫做孟德华，曾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据此可推知，两位先生可能在这段时间产生了交集。

第二本书是神学著作，由洪业先生所有，标注的时间是 1917 年。洪业先生于 1915 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俄亥俄州卫斯理安大学，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时间的维度上可以相互对应。将这本书赠送给洪叶先生的是埃里克·诺思（Eric M. North）。他曾担任美国圣经会干事、燕京大学托事等职，并于 1925 至 1928 年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创立出力甚多。

第三本是论文抽印本，这类书是学者间交流的重要渠道，且数量较少，一般从作者本人处传出。这本抽印本上印有“未济斋藏”，未济斋是罗先生的书斋，故此书为罗常培先生所有。

第四本书与美国耶鲁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佛雷德利克·奥拓有关，其与中国英文学界关系密切。书中题赠显示这本书是这位先生送给另一位留学耶鲁的北大学生王岷源先生的，时间是 1942 年。王岷源先生 1938 年入耶鲁，1942 年获耶鲁大学英

文系硕士学位。

第五本也是论文抽印本，作者是裴文中，右上角有收藏者的签名“齐思和”。在旧书流传的早期，作伪现象很少，所以来源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本同样为论文抽印本，是陈世骧为《袁枚传》一书撰写的书评，书上写有“陈世骧”字样，并被签赠给美国著名汉学家付璐德。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学术自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到与国际交流的阶段，中国学者也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展开竞争，学术研究的范式也随时发生转换。就刘铮所考察的范围而言，这一时期的藏书也就到达了终曲的阶段。

在进行个体分析后，刘铮尝试给出了自己的定性判断：其一，北大学者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私人西文藏书的质量并不高，藏书多为普通书，基本无珍本；其二，尽管书的质量不高，但意蕴丰富。在此基础上，刘铮老师指出，藏书研究有四点基本要求：笔迹与印章的识别能力、相关经验的积累、学术史的背景知识积累以及学术鉴别力与学术鉴赏力。讲座最后，刘铮概括出几点心得：西书是西学的载体；学者藏书研究是学术史、书籍史、阅读史的综合研究；文本研究无法取代实物研究。

（撰稿：卢雨枫）

20

宋雨喆：虚空擒事业——音乐的制造与思考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虚空擒事业——音乐的制造与思考”。大忘杠乐队及木推瓜乐队主唱、音乐人宋雨喆主讲，乐评人张晓舟担任对谈人，音乐人小河、音乐制作人孙雷、鼓手李旦、萨克斯手李铁桥出席并参与讨论与演出。主讲人宋雨喆主要与大家分享木推瓜与大忘杠这两支乐队二十年以来的音乐走向与思考，以及宋雨喆对音乐的理解和阐释。讲座以且唱且讲的形式展开。

第一部分“为什么不是巫”，涉及大忘杠乐队的天地观、舞台呈现与理念表达。宋雨喆及乐队现场表演了歌曲《山道上撞见两个咒师》，这是其与“巫”联系最为紧密的歌曲之一。“咒师”已进入巫术和宗教的言说领域。中国传统的“巫”含有通天达地的愿望和意味，在“巫”出现之前，每个人都应具有与天地自由沟通的能力，

雅集现场

并不需要中间人或代言人；而我们现在理解的“巫”，更多地指向了一种代言者身份，在许多宗教中都有着“为生者安心，为死者安魂”的“巫”或类“巫”的存在。宋雨喆解释道，《山道上撞见两个咒师》一曲有“巫”的状态，但自己却不是以巫师的身份出现其中的。他甚至对这首歌抱有强烈的疏离感，不将其认为是自己的创作。这样做，反而可以更完全地沉浸在音乐的氛围和情景之中，正所谓“将现实联系远远推开，从而在内部达成更为深厚而本质连通”。宋雨喆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永远的叙述者或主持人，每位听者都可以自行填补歌曲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大忘杠乐队的音乐确实蕴含着、也传达着通天达地的内容，但他们更想要表达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越过代言人去自行理解和体悟音乐、世界与自我。

如今，科学经验和理性精神占据着生活的当下，宋雨喆提出了一个开放式问题：以非理性方式探索宇宙的这一脉络是否应该被切断？他在此引用日本学者所著《气的思想》中的一句话：“在齐国，流行着突破了当时儒墨显学作为焦点的社会伦理的束缚：对于自然、历史、宇宙变化和构造得以成立的思索，其内容尽管伴有古代咒术的形态，但却是驰骋深远。”如今的“巫”就代表着一种使思想“驰骋深远”的面向。宋雨喆介绍道，48 赫兹的声音可引人进入迷醉状态，达到一种类似于钟摆互引效应的人音谐同。这不仅在“巫”的仪式或表演中可以找到，在音乐中也时常可以获得。然而，这种神奇的状态既不能完全用“巫”来解释，也不是纯粹用科学就能解答的。“大自然要往深里头看，面对奇迹你敢不信吗”，宋雨喆以歌曲《擀毡子》结束第一部分，大忘杠的音乐溢出“巫”的存在。

第二部分“还向人间再踏歌”。诗句出自道教人物蓝采和，据传，“他常身穿破蓝衫，手持大拍板，行于濠州城，乘醉

而歌，云游天下。”《道乡集》载，蓝采和作诗颇多，有“高卧烟霞几百年，此心未与世相关”的自述。而就是这样一个仙人，又写出“枯禅坐罢性无波，还向人间再踏歌”的诗句。宋雨喆认为，这种重又复归人间的精神也正与他强调音乐功能性的观点不谋而合。将音乐重新拉回社会层面，不是对之强加功利性，而是在“达”时“兼济天下”。嘉宾小河说，宋雨喆的音乐力量不是灵力或虚空所赐，而在于他真正找到了音乐的功能性。最初做摇滚乐是要质疑、反叛甚至砸碎一切，未曾想到如何建设，而将音乐返归社会层面和功能性则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之后，宋雨喆、小河和乐队成员现场表演歌曲《说鸟一》，“亲爱的别怕，我想为你安心；亲爱的别怕，我为你安心。”音乐勾连自然、人类与神灵，亦有大慈悲与大担当的境界。

第三部分，“摇滚乐不只是摇滚乐”。宋雨喆认为，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儒释道的痕迹存在，三家都在修“道”，而印证“道”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今天所讲的“虚空擒事业”具体来说是音乐，它既是时间的艺术，也散入到虚空之中。而个人如何完善自我，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种“事业”。摇滚乐就是宋雨喆一直以来的事业，从纯粹感性的发声与表达，对自由被武断意志妨害做出自然反映，到“反”上又“反”——反对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摇滚乐，并寻找理论支撑完善摇滚乐的社会功能。随后，宋雨喆播放了木推瓜乐队新专辑《活人秘史》的片段剪辑，讲述近年来人的内心和时代联动的“新历史”。

宋雨喆认为，摇滚乐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因其首先能把音量扩大到传统乐器在物理层面上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这决定了摇滚乐与生俱来的气质、强大的冲击力和反抗的态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摇滚乐的黄金时期，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摇滚乐与社会运动有着强烈互动。宋雨喆说，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摇滚乐依然没有太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在当今的西方，摇滚乐也不再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了，相较之下，嘻哈乐和电子乐已霸占了时代的风潮。然而，面对个人与时代的转型与激变，世界需要摇滚乐，中国也需要摇滚乐。宋雨喆表示，摇滚乐和时代有密切关联。“性若见命，如禽得风”，如果摇滚乐和社会运动充分结合则能够迎来新的飞跃。宋雨喆讲到，朋友周云蓬是一位盲人音乐人，曾表示自己想要到很多地方真正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但不抱功利之心创作成歌曲。这样的精神令人动容，底层生活和民谣民歌也是摇滚乐传统的一部分，是真正具有摇滚力量的东西。

乐评人张晓舟认为，现今是“摇滚”泛滥的时代。纵观国内音乐节阵容，真正的摇滚乐可能只占百分之十的比例。更为可怕的是，那些被称为“摇滚”的音乐不仅占有摇滚之名，还占用了真正的摇滚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木推瓜乐队的《活人秘史》是这个时代的心灵史诗，是对 21 世纪摇滚乐的总体回应。当今的摇滚乐已走到瓶颈之处，在音乐性上难有突破的可能。有野心有责任感的音乐人若想寻求出路，则应当面对两个历史：一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一是浩繁而精深的音乐史。

第四部分，“未来激荡的声响”。《乌托邦》一曲在《活人秘史》专辑中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展现，每一部分的音乐制作、乐器选择和混音方式都有所不同。从传统乌托邦的开始与破灭，到与强烈政治意识不相关的小型公社乌托邦幻想，一直到未来，伴随着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声音直接进入神经元的出现，探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乌托邦的想象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宋雨喆现场播放了第一部分表达传统乌托邦的歌曲片段。他介绍，对未来音乐的想象大致有两个思路：一种方向在经历电脑介入音乐编码的二十年后，开始想要把机器化的控制和序列去除，重新找回“演奏感”；另一种方向是继续人工智能的方式，加强人机互动的结合，这种发展是不可阻挡且无法被忽视的。

接下来，音乐制作人孙雷讲述并展示了听觉世界的奇妙与未来音乐的可能性。他首先从音乐的产生讲起：音乐由震动而来，世界上最纯净也是最难听的声音是正弦波，但正弦波经过变化就会成为音乐。孙雷现场播放了正弦波 48 赫兹下的情态与不断加倍的效果，以及高低频声音被不同年龄的人耳所捕捉的情况。孙雷讲道，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中，人类的听觉是不同的，因为生物会据生存情况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听觉参照点。但人类生物的进化并没有使听觉发生变化，我们依旧会觉得现在的某些声音不是音乐。在未来，有可能会根据每个人感受力的不同而制作出一些像是声音的音乐。接下来，在关闭灯光后的一片黑暗之中，孙雷带领大家浸没式体验“人类声音简史”，以德彪西《大海》的主题旋律贯穿并渐次产生变化。

宋雨喆总结道，现代音乐使我们失去了面对细小声音和音乐元素的机会，从摇滚乐将声音变大开始，人类耳朵敏感度反而降低，再难捕捉弹古琴时风吹落叶的细琐声响。选择回归“演奏感”和回到现场，还是选择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身体现实感受的延展，一切尚无定论。但宋雨喆指出，人工智能的出现或可完全颠覆音乐的概念，当人类可以通过选择感觉系统和接受频率的范围来自由选择音乐或声音时，是否也损失了作为肉身生命个体的乐趣。

最后，宋雨喆与到场所有嘉宾音乐人进行了即兴演出，萨克斯、架子鼓、吉他、诗诵……在音乐的浑融之中，焦点游移变换，人声成为器乐，器乐也成为人声。“所有带着生命生下来的人，总要继续歌唱吧，直到能够朴素地生活的那一天；而且如果生命真的能朴素地活着，也还是要继续唱歌吧。”讲座自音乐开始，由音乐结束，引领人们思考着音乐之于“巫”的通融与溢出、生命与宇宙的复杂缠绕、自我完善与摇滚乐未竟的事业、音乐的功用与激荡未来的声响。

（撰稿：陆敏秋）

静园学术

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

王家葵教授

2018 年 3 月 23 日下午，“书志与书史”系列讲座“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王家葵主讲，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熊长云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评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刘绍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副研究员王天然、清华大学教授刘薔、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卢芳玉、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等出席。

讲座伊始，熊长云对“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的重要性作简要介绍。该书法文物在北宋《宣和书谱》、明代丰坊《书绝》、清代《墨缘汇观》中均有记载；清代初年入藏故宫，在《石渠宝笈》中被标记为乾清宫藏书次等“元”字号。同时，“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对研究唐代王羲之书法及其流传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其书体特点与宋代的官文书具有高度相似性，“赵模千字文”极有可能是当时书写规范的参考底本之一——这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唐宋书法和宋代官文书的新视角。

讲座第一部分，王家葵教授根据“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所存信息，证明现存实物与古代著录具有同一性。他首先介绍了赵模其人与现存纸本手卷的情况。赵模是唐太宗（六二七至六四九）时翰林供奉搨书人，远不及同时供职于弘文馆的神龙本兰亭序摹搨者冯承素为人所知。赵模兰亭没有传下来，但赵模集王羲之书法的千字文还流传在人间。现存的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纸本手卷纵约 26 厘米，横约 170.2 厘米，共约 530 余字。字迹采用双钩填廓而成，起“东西二京”，讫“焉哉乎也”，是《千字文》的后半段。从每行上半残损 1–3 字来看，有过火烧痕迹。卷后题跋可分为古代题跋和近代题跋两部分：前者包括元代滕宾、夏克复，明代吴宽、徐寓、范允临，清初徐枋的题跋；后者包括罗恽、罗振玉、梁启超、庄蕴宽、王国维、王大燮、于右任的题跋。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在 1921 年由罗恽收藏，经丁念先转手，至 2011 年现身拍卖。这段历史清晰可考，但若向前追溯，其“身份性”需要考证。

接下来，王家葵教授按照由近至远的顺序，抽丝剥茧，对“赵模千字文”进行身份鉴真。关于“赵模千字文”的最晚著录应当是《石渠宝笈初编》卷五，但卷子上没有任何一枚可以证明其“石渠宝笈出身”的印章或其他痕迹。于是，王家葵教授从题跋入手进行考证。徐枋跋文后有三枚徐枋的印章，第三枚白文“俟斋昭法”之下，几乎相同间距处还钤盖了一枚“备卿鉴赏”的印章。对此，王家葵教授指出，如非特别留意，这甚至可能被误认为是徐枋的第四枚印章。经考证，“备卿”是满洲斌良（1783–1847）的别号，此人官至刑部侍郎，授驻藏大臣，嗜书画，鉴藏颇富。但藏于深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赵模千字文”是如何被活动于嘉道年间的外臣斌良收藏鉴赏的呢？

回到本卷被火烧这一基本史实，王家葵教授认为，《清史稿》卷四十一记载的“嘉庆三年二月丙子，京师乾清宫火”应当是“赵模千字文”遭遇的那场火灾。《石渠宝笈初编》卷一至卷九为乾清宫藏品，其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想必是毁于此次大火，但火灾中的残本是如何被处理的却不得而知。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先生在《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詩＞——希珍际遇殊惊晚，尤物闇章固有时》一文中提到卷子“很有可能是煨烬之余而为宫人盗出售于市”。王家葵教授认为，“赵模千字文”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结合斌良“备卿鉴赏”的印章，则可推测此卷出宫时间应为嘉道年间，原因很可能与嘉庆二年乾清宫这宗失火案有关。同时，这也可以解释本卷上见不到任何一枚乾隆内府收藏印了——可能皆为出宫后被刮削掉了。至于备卿印章的位置，似是故意混淆视听，使人们误认为是徐枋之印，也恰好符合其拿到被偷运出宫的书卷后既想留下印记又怕牵连性命的微妙心理。据上，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现存之卷就是《石渠宝笈》中著录的那一件，但其题跋是否是原件还需再加考证。王家葵教授介绍，明末汪珂玉《珊瑚网・书录》卷一所录“赵参军摹晋千文”的题跋信息与现存纸本上的内容基本吻合，并且又比照了吴宽、徐枋等印章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样态，基本可以保证本卷跋尾部分与相关著录完全吻合。

时间再往前推进，在清代《石渠宝笈》收录之前，“赵模千字文”是否为历代著录的原件呢。王家葵教授介绍道，本卷在 16 世纪中叶由苏州吴邦桢刻帖（有关刻帖的文献记录也见于《书绝》、《碑帖纪证》与《弇州四部稿・碑刻墨刻跋》）。“赵模千字文”的刻帖，即使是翻刻本也十分罕见。目前寻得两种拓本：一是《书品》杂志所载《集帖》本，二是日本苏峰德富（1863–1957）藏本。通过对比翻刻本与

本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递进结论：一，现存墨迹应该是刻本的“底本”；二，即使是翻刻本，也传递了墨迹原本的基本信息；三，墨迹本已经残损的部分可通过刻本来补配。由此，王家葵教授认为，本卷（包括正文）是明代收藏家史明古以来所收藏著录的原件。

王家葵教授表示，本卷的历史还可以上推到元代。首先，元代的题跋乃至《宣和书谱》赵模条提到内府收藏“模集千文”。更重要的是以下两条实物证据：一是本卷有疑似贾似道的印章残痕；二是结合刻本来看，“赵模集千字文”中“匡”、“殷”、“贞”、“敬”和“竟”五字有缺笔。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翼祖赵敬、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之父宣祖赵弘殷、宋仁宗赵祯的讳和嫌名，可确定缺笔时间下限为宋仁宗时代。除了缺笔，墨迹本上还有四字被加朱圈。南宋刻书遇讳字，除缺末笔外有时还会加以墨圈。王家葵教授特别指出，“桓”字也有朱圈，只不过不太明显。并且，观察墨迹残卷上缺笔的“匡”字，其末笔是被刮削而非空缺未书，由此可以排除本卷是宋人临摹制作的可能性。王家葵教授指出，关于“赵模千字文”的文物学鉴定目前只能到此，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如缺笔、加圈的必要性、该卷在唐宋的影响力、该卷是否为赵模所集等。

讲座第二部分勾勒“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研究的学术意义，揭示赵模制作集字千字文的本意，以及此千字文书法与宋代诏敕字体的关系等。

首先，还是要进一步确定“赵模千字文”的成书时间。王家葵教授指出，最早著录“赵模千字文”的是日本来唐僧人最澄的《法门道具目录》。此目录中记载的书法作品大多是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带回日本的，目录中记载、的“赵模千字文大唐石摺”即“赵模千字文”的石拓本，可以证明的一点是，唐代贞元年间已确有“赵模千字文”。但要保证该作品并非是贞观到贞元这一百五十年间由他人用赵模之名杜撰而来的，则还需要对赵模和所谓“集字”行为作进一步研究。王家葵教授介绍，赵模的真迹除了唯一的碑刻以外，还有唯一的一行书法真迹保留在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国诠的《善见律》中——“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臣趙模監”。对照“赵模千字文”的结衔“太子右監門府鎧曹參軍事”来看，前者的级别是正九品上，后者的级别是正九品下。王家葵教授认为，以职事官阶大小而论，赵模任太子右监门府铠曹参军当在作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参军事之前，即“赵模千字文”制作完成应在《善见律》之前，也即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之前。

接下来，王家葵教授主要探讨“赵模千字文”的字源以及它与《兰亭序》的关系。王家葵教授认为，《兰亭序》是赵模使用的主要资源，字迹与《兰亭序》冯承素本高度接近。通过检核“赵模千字文”中 134 个《兰亭序》字，字迹与冯承素本基本一致的有 82 字；特别选取了“觴”、“茂”、“林”、“蘭”、“詠”五字，与冯本对照，字迹几乎一致。此外，赵模未用的《兰亭序》字亦有 52 个之多，足见其手中掌握有足够数量的王羲字迹。随后，对比“赵模千字文”与《兰亭序》冯本、褚本、虞本和定武本的字迹，王家葵教授现场展示了选取的 26 个字。可以发现，四个兰亭本之间并不完全一样，甚至比“赵模千字文”与它们的差异还大。王家葵教授认为，《兰亭序》不同版本之间的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实证解答，但若以“赵模千字文”为参照，冯本是与之最为接近的。如“興”字在《兰亭序》四版本中差异甚大，此字上半“同”字左侧，除冯本外，皆为两竖，冯本为一竖；“赵模千字文”亦为一竖，笔势与冯本接近。王家葵教授由此设想，“赵模千字文”与冯本皆摹自同一份《兰亭序》底本，甚至就是内府所藏的真迹，故字迹结构乃至细微特征都保持一致，但由于搨书者对于字的体会不同，冯本飘逸而“赵模千字文”相对凝重。据此也可以猜测，赵模搨书是将其作为标准字范，故而省略或简化了过度飘逸的痕迹。其他《兰亭》本恐怕都是临与摹兼用，故字体结构差异较大，有些本子经过多次复制辗转，细节改变较多。

除了来源于《兰亭序》以外，“赵模千字文”的字还来源于当时内府收藏的王羲之法帖，即《法书要录》卷三中褚遂良所编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平安帖》以“此粗平安”开首，与《右军书目》行书第十七卷所记“此粗平安”相合。《平安三帖》共九行六十余字，与“赵模千字文”相同或接近的字有“平”、“安”、“載”、“百”和“霜”五字。今存《快雪时晴帖》摹本四行二十八字，虽与《右军书目》行书第十一卷所载的行数有差异，但其“結”、“次”两字与“赵模千字文”相近。《孔侍中帖》中的“信”、“書”、“懸”、“故”四字也与“赵模千字文”相近。除墨迹外，在刻帖和拓本中也有一些相似度较高的例证，如《右军书目》行书第八卷中所载“谢范新妇得富春还疏，十行”，即《谢范新妇帖》。据《宝晋斋法帖》对比其刻本，“寂”字与“赵模千字文”完全吻合；又如《官奴帖》中的“女”、“玉”、“脩”、“訓”、“誡”、“官”、“道”和“生”八字与“赵模千字文”相同或相近；再如《建安灵枢帖》，根据《淳化阁帖》和《宝晋斋法帖》中的刻本对比，“建”、“靈”、“慈”和“慕”四字与“赵模千字文”相同或相近。王家葵教授认为，这与赵模的身份以及“赵模千字文”的制作时间完全吻合，取“赵模千字文”与现存的王羲之法帖相比较，相同字迹几乎都出自《右军书目》中的行书帖。同时，这也是论证“赵模千字文”作于贞观时代的重要理由之一。

据上所述，赵模集字是在贞观末年，与怀仁集字（咸亨三年）时间接近。王家葵教授认为，两者相关性极大，且《怀仁圣教序》利用了“赵模千字文”。据王家葵教授统计核对，《集字圣教序》包括标题、署款和《般若心经》，共 1904 字，使用字符 750 余枚，见于“赵模千字文”者 402 枚，两者相似诸多。更为关键的是，王羲之父亲名“曠”，故王羲之不写“曠”字，因而赵模和怀仁写“旷”字必用“日”与“廣”相拼。据王家葵老师现场展示，“赵模千字文”与《集字圣教序》的“曠”字写法结构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个文本中的“感”字。赵模对“咸”字之“口”的末笔与其下“心”两点之间的关系交代不清，怀仁本同样如此，而冯本《兰亭序》则点画分明。以上证据皆可说明“赵模千

字文”与《集字圣教序》的关联性确定无疑。

接下来，王家葵教授重点论证《怀仁圣教序》利用“赵模千字文”的成果。“濟”字，分别取自“赵模千字文”中的“濟弱扶傾”、《怀仁圣教序》“弘濟萬品”和“南陽縣開國男來濟”。《怀仁圣教序》中的两个“濟”字其水旁之提与右旁之“齊”之撇连成一笔，显得非常奇怪；而“赵模千字文”中的这两笔虽然相连，但起讫各自独立，字形正常。王家葵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赵模千字文”在前，《怀仁圣教序》模拟在后，偶然失误造成。又如唐代讳字“民”与“治”，赵模制作千字文始于唐太宗时代，故两字借无缺笔；但《怀仁圣教序》成于唐高宗时期，这两字需要缺笔。根据现场字形展示，“民”与“治”字源相同。其中，“治”字的缺笔十分奇怪：怀仁的“治”字缺两笔，偏旁三点水只留了第三笔一提，让人误以为缺笔的字是“冶”。但观察“赵模千字文”就会发现，赵模所摹“治”字的三点水是一笔下来而后连笔一提，因此，怀仁应是在赵模之“治”字的基础上处理缺笔的。显然，这是怀仁集字借用了赵模的成果，再对避讳字加以缺笔处理。王家葵教授介绍道，可以利用现存的“赵模千字文”对《怀仁圣教序》的制作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例如，《怀仁圣教序的》字体大小是由“赵模千字文”的字体大小决定的。除此以外，兴福寺半截碑、《玄序集字金刚经》在利用《怀仁圣教序》的同时，也利用了“赵模千字文”。另外，主要使用赵模千字文的集字碑有普觉国师碑，此碑拓本中不见于《怀仁圣教序》而写法又接近“赵模千字文”的字迹。

这引出了下一个重要问题，即赵模集千字文的真实目的。王家葵教授表示，可以从书法家留下的书迹中找寻线索。若将李邕《李思训碑》的字迹与“赵模千字文”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书法字形结构上有很大关联。又如上元三年（676年）高正臣的《明征君碑》，年代早于李邕，仅比《怀仁圣教序》晚四年，故而谈不上学习《圣教序》。此碑中凡见于“赵模千字文”的字，写法皆与《李思训碑》相同；而不见于赵模千字文的字，则高正臣、李邕各有写法。王家葵教授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两人共同学习了一个范本。弘文馆承担书法教育职责，字帖等学习材料皆由内府提供。参考祁小春有关《十七帖》制作目的的意见，即编制一套弘文馆草书习字范本的需要来看，可猜出“赵模千字文”或许是赵模制作的“王羲之行书标准字样”，以作为当时的“行书教材”用。天宝十四载（755年）田颖书《张希古墓志》和大中五年（851年）朱玘书《才人仇氏墓志》也是专门学习“赵模千字文”的。王家葵教授认为，通过比较上述文书，我们可以确定唐代确实存在“赵模版”的标准王派行书。赵模集王羲之行书制作千字文本意是成为一册“王羲之行书标准字帖”，供弘文馆书法教学之需。只不过，此本问世不久，即被怀仁借用，成为供集字使用的“王羲之字库”。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千字文书法与宋代诏敕字体的关系。王家葵教授认为，宋代内廷一直以“赵模千字文”作为御书院书法学习范本，并用于诏敕的书写。他在现场举证了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和宋孝宗时期的四件诏敕一，即《毛应佺知恤诏》《台北故宫所藏宋高宗残诏敕》《宋孝宗时虞允文敕书》。此四者在字形结构上与“赵模千字文”有很大的关联性。王家葵教授认为，内院使用“赵模千字文”作为诏敕字体，甚至可以追溯到吴越钱镠时代，字形结构均为纵向密集，横向疏松。随后，王家葵教授特别介绍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行书千字文”这一有力证据（最近改名为“御书院书千字文”）。在现场展示并进行逐字对比后，王家葵教授表示，此“御书院书千字文”是“赵模千字文”的临本。通过分析“體”字，可进一步判断这是“对临”。由此，南宋内府至少有一本供临写的“赵模千字文”陈列在书写者面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御书院将“赵模千字文”当作实用器使用而非文物。因此，对于“赵模千字文”中的避讳字，书手们在原帖上刮削、加圈甚至损毁性地记标记等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王家葵教授认为，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今存的“赵模千字文”就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御书院对临的底本，但宋高宗绍兴府内确实收藏有“赵模千字文”作为书写诏敕的标准字体。

最后，王家葵教授对文物“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做出以下结论第一，尽管“赵模千字文”曾有过多件副本，但今天这份墨迹残卷及其完整刻石拓本是硕果仅存的一份。我们无法确定此残卷到底是赵模制作的原件，还是某一时代的复制品。其字迹与今存王羲之字迹符合度甚高，这一现象表明，现存“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即使不是原件，也是高质量的复制本。第二，若要确定本卷年代，仍需通过纸墨等科学分析报告来结论，但从讳字的刮削情况看，宋以前的可能性较大。第三，这是现存年代最早、容量最大的王羲之书法字库，著名的集字碑《怀仁集字圣教序》即主要从此取材。此外，王家葵教授还指出，目前仍有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怀仁圣教序》的制作以及最澄书法中的“赵模千字文”元素等问题留待考证。

评议环节，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老师指出，书法史和艺术史研究不能满足于对一个书家或一部作品的一般性研究，而是应该将书家和作品放在整个历史环境和书法史流变中去。王家葵教授对“赵模集千字文”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本，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探讨唐代弘文馆与宋代御书院对“赵模千字文”的学习和使用。在唐代，王羲之书法的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赵模集字参考的是什么？怀仁和赵模的集字有何异同？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各自的辐射和影响？赵孟頫所延续的是怀仁“传统”还是赵模“传统”？唐宋院体和文人书画如何产生互动？马楠老师表示，上述问题皆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发和拓展。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随后发言，他认为，“赵模千字文”的研究难度很大，王家葵教授所做的工作在概念上和文献上完成出色。但针对具体作品而言，该书迹产生的具体年代可能性较多，相关证据链还需再加检验。最后，与会学者围绕讲座的细节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

（撰稿：陆敏秋）

东亚历史地图编纂的传统与特点

金裕哲教授

2018 年 3 月 14 日下午，“东亚历史地图编纂的传统与特点”主题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韩国西江大学数码历史研究所教授金裕哲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主持。

本场讲座中，金裕哲教授以自身对历史地理的兴趣为出发点，结合多年工作经验和研究，分别就如何评价历史地图、历史地图的类型以及中日韩三国在历史地图编纂研究上的特点、联系和区别等多方面展开了介绍和论述，解读历史地图背后的深层意义。

一、评价历史地图的三个观点

金裕哲教授认为，评价历史地图的价值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待，分别是“历史地图的内在观点”、“历史地图编纂的背景观点”及“历史地图的表现观点”。

其中，“历史地图的内在观点”指的是历史地图中所包含的信息，重点在于地名和境界比定的正确性，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地图的质量问题和价值问题。如果史料内容不足、说法不同，就难有说服力，同时这也是评价地图价值或水平的重要标准。“历史地图编纂的背景观点”指的是编纂者当时所处社会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而编纂机构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历史地图来可以了解当时时代的情况，包括反映民族、国家、社会阶级等特点。“历史地图的表现观点”指的则是历史地图的表现形式。这反映出编纂者地理信息的收集能力和地图制作技术，此外，还会显示其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

二、历史地图的五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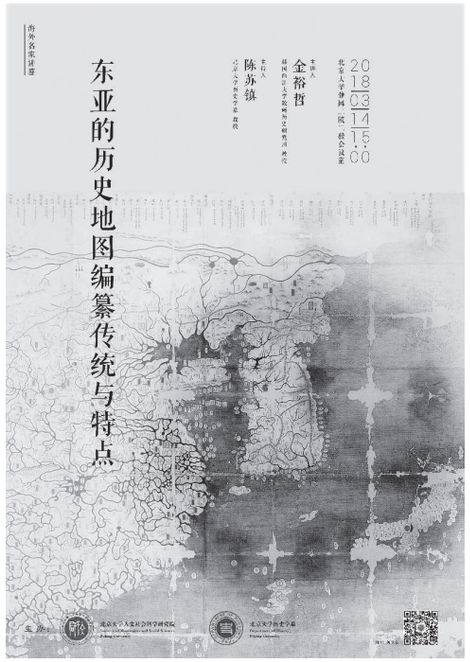
历史地图发展上千年，种类繁复，内容繁杂。金裕哲教授表示，历史地图可分为五类：“今名古注”、“古名今注”、“古今重显”、“古今并显”及“古名单显”。

其中，“今名古注”是指用古名标注历史地图上的今地名。编纂者常在此类地图的空白处标注古名和沿革或人物信息，并作相应的解释。金裕哲教授以明代《古今人物事迹图》和 1872 年的《朝鲜地方地图》为例解释道，“这种类型的历史地图更多属于地志型的地图，而不在历史地图范围内”。而“古名今注”则与“今名古注”相反，指的是用今地名将古地名以注释的方式去标注。这类地图的代表是《汉三辅图》和 1681 年朝鲜制作的《东舆备考》。“古今重显”是古地名、今地名均写在上面，但用不同的颜色标注，代表地图有杨守敬的《历代与地沿革险要图》、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程光裕的《中国历史地图》为代表。与“古今重显”稍有出入的是，“古今并显”则是将古、今地名以同样颜色显示在历史地图中，代表地图有税安礼《华夷区域总要图》和《华夷图》。其中，“古今并显”与“古名今注”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一对一标注，而前者不然。“古名单显”则指的是古地名直接在当代的地图中显示。这类地图只写古地名，不写现代名，代表地图有《禹公九州山川之图》。欧洲地区常采取这种形式制作地图。中国也曾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后来基本消失了。金裕哲教授强调道，虽然日本有这样的传统，但是却和西方并没有多大关系。不同的标注方式有着不同的目的，也受到当时的时代和政治背景的影响。

三、中国历史地图编纂经过和特点

在东亚，中国开历史地图绘制的先河。魏晋裴秀制作的《禹贡地域图》，开创了古代中国地图绘制学的先河，并提出了著名的“制图六体”理论和“故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例”的历史地图制作原则，强调历史地图的严密性；西晋时期的杜预按照时间顺序制作《盟会图》，反映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离合聚散；而唐代的贾耽确立了“古黑今朱”的做法。

而后，宋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绘制《历代地理指掌图》，成为历史地图的规范，但是编纂者是谁至今议论纷纷。但是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在时间上包括了中从帝喾到宋朝全时代共 44 幅的通识地图，同版型上收录不同时期的地理信息，可比较各个时代之间的差异，这是其最大的历史意义；二是它继承并保存了裴秀杜



预贾耽等人的成果，成为确认古代民族国家地理位置的根据；三是它成为东亚历史地图的规范，影响了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图的制作。

金裕哲教授介绍，在《历代地理指掌图》的基础上，明代沈定之制作的《今古舆地图》信息更丰富，但是内容有所缩减，没有了民族和山水的标注，只强调疆域的变革。而清代杨守敬制作的《历代舆地图》相比之前则更加仔细，过去每个王朝只有一张或两张历史地图，但杨守敬给每个王朝分别制作了 80 多张历史地图，规模更为庞大。

四、韩日历史地图编纂经过和特点

金裕哲教授介绍道，现存最早的韩国历史地图是 15 世纪末出版的《疆域沿革图》，内容包括从古代到高丽的时代疆域和地名的沿革。而早在这之前，朝鲜已出现有历史地图，例证有二：一是朝鲜初出版的《新撰八道地理志》和《世宗实录地理志》连接着朝鲜以前的历史地理沿革；二是在编纂高丽史过程中，编纂者肯定会研究当时的历史地理，也就会出现当时朝鲜的历史地图——但都是以地理志附图的形式出现。

18 世纪以后，韩国开始制作独立地图，包括历史地图、疆域图、行政图和地方图等。在现存的朝鲜历史地图中，最受关注的是《东舆备考》和《高句丽国图》：《东舆备考》采用彩色笔画和“古名今注”的方法标注，内容包括韩国全时代历史的最完整的历史地图；而《高句丽国图》则几乎是有关高句丽王朝的、唯一的历史地图。

在东亚，中国对韩、日历史地图的制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金裕哲教授指出，如今，韩国收藏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图。其中，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不是木刻本，而是彩色笔画，其篇名、版图内容、注记文等信息与宋本一样。但韩国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六张新地图，不过其制作年代和制作者无法考明。从地图强调大名疆域的内容来看，大致可推定为清初时期。

朝鲜独自制作的《历代舆地图》也保有朝鲜地图制作的技法，如使用彩色笔画和绘画以及采用“古名单显”的方式标注地名等等。但当时，朝鲜地图的制作者缺乏对中国地理信息的了解——他们曾错将长江、黄河连为一体。

对于日本来说，现在于东洋文保存着的宋版《历代地理指掌图》早在 1150 年就由宋商客刘文冲带入日本，并送至藤原赖长。18 世纪初，日本的《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地图》在内容上以色彩划分行政区域，在时间上将范围扩展到明代，形式上也十分精简。金裕哲教授认为，虽然日本和韩国都受到中国《历代地理指掌图》的影响，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日本偏向于使用颜色标注不同区域，且强调领域的存在。

五、地图利用的三种方式

金裕哲教授认为，共有三种利用地图的方式：“看图”、“听图”和“读图”。其中，“看图”类似于现在的交通旅游地图，可供寻找相关地理信息；“听图”不仅仅指利用地图，更强调读取地图中反映出的国家、外交信息及其意识形态；“读图”则指的是读取“看图”“听图”之外的信息，或在此基础上制作不同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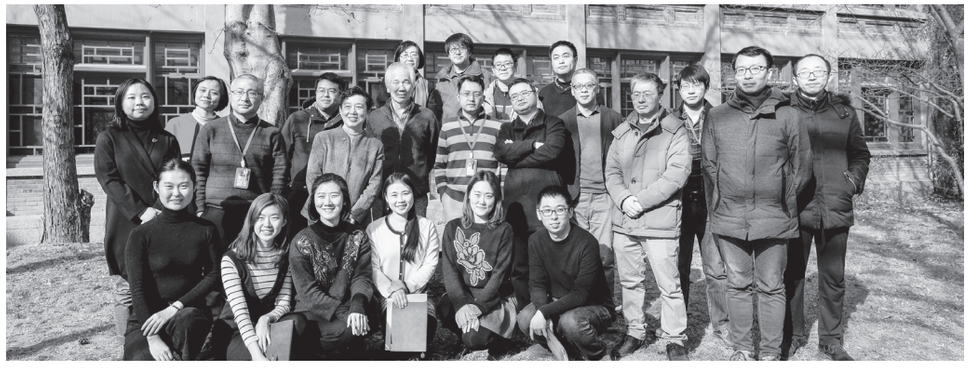
最后，金裕哲教授表示，历史地图本身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反映出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可对比不同的历史地图来了解各个国家对它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日本便是通过标注不同的颜色显示出其对领域的重视。因此，古代历史地图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

评议环节，陈苏镇教授表示，金裕哲教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亚历史的新窗口，看似简单的地图却内藏丰富的历史信息，这对研究历史学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在场师生还就“地理信息的变迁如何在地图上表示出来”“中国指掌图传到日本韩国，其功能有没有变化”“历史地图如何更好应用于环境研究”等史学与应用价值兼顾的话题展开讨论。

（撰稿：唐国俊）

文研回望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第四期邀访学者欢迎会



第四期邀访学者与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2018 年 3 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迎来了 12 位来自海内外的第四期邀访学者，他们将在静园二院从事为期四个月的研究和交流工作。5 日下午，邀访学者欢迎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期邀访学者与文研院院务会成员、行政团队，往期邀访学者代表见面，开启本学期的驻访生活。

欢迎会由副院长杨弘博主持，她代表文研院向各位学者表示敬意与欢迎，并简单介绍了参会人员和会议安排。随后，与会学者们共同观看文研周年视频，进一步加深了对北大和文研院的了解。

院长邓小南在发言中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她表示，文研院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交流平台。邀访学者项目是文研院的重要组成之一，学者们在年龄段、兴趣点、学科背景等方面不尽相同，彼此之间相互碰撞而启发的议题或可成为引导学术实现根本性突破和持续性发展的聚焦点。她欢迎学者们在文研院搭建的平台上相互交流，激荡出新的观点，以集体性摸索的方式走出一条不守窠臼的道路。

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随后发言。他认为，一个好的文科学者不仅要有系统的学术训练，更要重感情——对这个时代有情怀。只有拥有丰厚的内涵，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基于此，文研院希望能以务实的精神接续传统，探索出一条较为完整地理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路径，而非局限在某一种指标上。同时，文研院也鼓励各位学者充分利用宝贵的驻访机会，热烈探讨学术议题，借此打开视野、深入理解学问。

院长助理韩笑介绍了文研院的学术与制度安排。他表示，文研院将竭尽所能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并努力营造充满活力的交流氛围，突出多学科之间的连接，以及北大校内外学人、学术机构之间的连接。

第四期邀访学者分别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进行介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分享了她从事西亚考古与中国北方考古的学术历程，期待这四个月能大有收获。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表达了从事学术研究以求在知识上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的研究方向为现象学与政治哲学，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让西学在中国扎下一个有坚实基础的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治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古典学在华的译介，同时对钱钟书的学术创作很感兴趣，计划借助驻访机会查找相关文献，同时思考近代以来多元的著述文体对于学术发展的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芃计划在驻访期间完成先秦两汉文献相关书稿，考察其中的变化与传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刘亦师的学术目标是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出发，以更立体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他希望在文研院借鉴其他领域的学科方法，完善自己的学术训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关注制度史与文本分析这两个领域，他期待能与各学科学者沟通交流，打开学术视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对文研院提供的驻访机会表示感谢，并凭借优越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环境获取与晚清史相关的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从事商代青铜符号研究，他计划在驻访期间编成一本集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文研邀访一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文研邀访二期）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文研邀访三期）作为往期邀访学者代表，回顾了他们在文研院度过的驻院生活，分享了在此的收获，对文研院兼具高效率与人情味的学术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欢迎会在温馨而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研院本期驻访的邀访学者共计 12 人，分别为：杨建华（吉林大学）、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刚（台湾东海大学）、韩潮（同济大学）、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治（中国海洋大学）、戴海斌（复旦大学）、苏芃（南京师范大学）、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刘亦师（清华大学）、高波（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大文研院举办校庆纪念展

具体内容参见“百廿校庆专题”。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北大文研院举办未名学者校庆讲坛

具体内容参见“百廿校庆专题”。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05
2018-02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研究中心主任路伟到访文研院，并与院长邓小南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

28
2018-02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学科办主任张平文、人事部部长刘波到访文研院，文研院院务会汇报 120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筹备情况及本学期相关工作。

01
2018-03

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马勃思（Max J. Fölster）访问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就举办 2018 年马克思·韦伯讨论会细节问题作进一步商讨。

广东工业大学渠岩教授来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商讨“中国南方乡村的变迁与重建——顺德乡村振兴考察活动”跨学科学术考察事宜。

04
2018-03

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并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青年拔尖人才”的称号。

05
2018-03

文研院第四期驻访学者欢迎会在静园二院 111 室举行。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访学者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刘亦师以及往期邀访学者代表罗祎楠、袁一丹、刘未参加。

06
2018-03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二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罗马肖像——真实还是虚构”。美国波士顿大学古罗马艺术史教授弗雷德·克莱纳（Fred Kleiner）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07
2018-03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教授朱玉麒的陪同下，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到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就黄文弼中心的发展事宜进行交流，并参观“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展览。

08
2018-03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茶叙（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访学者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刘亦师出席。本次茶叙，高波老师就“波考克 Barbarism and Religion 一书及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可能启示”这一主题分享研究心得，刘亦师老师浅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史料类型、方法与视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三期第一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坚持，坚持下去！——阿比·瓦尔堡笔下作为自我心智画像的《马奈与意大利古代艺术》”。德国汉堡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瓦尔堡档案馆馆长傅无为（Uwe Fleckner）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09
2018-03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月度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就第五期邀访学者申请及遴选、文研院组织 120 周年校庆相关活动等事宜展开讨论。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工作委员高枫峰、李猛、刘云杉、陆扬、孙庆伟、邢滔滔、叶炜、周飞舟、张辉、张亚光出席。

10
2018-03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四期第一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作为国家制度的家国天下”。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评议。

11
2018-03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协副主席徐国元率工作团队到访文研院，并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讨论跨学科学术考察项目“中国南方乡村的变迁与重建——顺德乡村振兴考察活动”等合作事宜。

12
2018-03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四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大国的精英选拔”。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并评议。

13
2018-03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世界政治进步了吗？”。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作引言，文研院学术委员、燕京学堂院长袁明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三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有障碍的摄影——瓦尔堡美国之行的图片”。德国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瓦尔堡档案馆馆长傅无为（Uwe Fleckner）主讲，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副主任滕宇宁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出席。

14
2018-03

3 月 14–16 日，院长助理韩笑赴哈佛中心（上海）参加“中国历史研究的网络基础设施”国际研讨会。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治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钱钟书与西方神秘主义诗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东亚历史地图编纂的传统与特点”主题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韩国西江大学数码历史研究所教授金裕哲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主持。

15
2018-03

西北科考团成员袁复礼之子袁鼎参观“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展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全程陪同。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做客“教授茶座”，与来自多个院系的 22 名同学就“读书为己”这一主题进行热烈讨论。（“教授茶座”秉持“不谈学术，只谈人生”的主旨，是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创立的知名教授与青年学生分享成长经历、共话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校园文化品牌，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年。）

17
2018-03

“北大文研读书”第八期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休谟与启蒙运动——《大卫·休谟传》读书研讨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主持。

3 月 17–19 日，院长助理韩笑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青田村参加“杏坛镇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为文研院学者考察团的田野考察项目做前期沟通联络准备。

19
2018-03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千年的世界：全球化的开始”。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评议。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出席。

20
2018-03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本次研讨会由文研院同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共同主办，来自内地、港台、欧美的近二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21
2018-03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早期中国的史料加工——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中心的考察”。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参与讨论。

22
2018-03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茶叙（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

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访学者杨建华、赵刚、严志斌、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刘亦师出席。本次茶叙，杨建华老师围绕“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一个实例”、戴海斌老师围绕“略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日本因素’”，各自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应邀在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CEIB）“净慧长老纪念讲座”发表演讲。

23
2018-03

“书志与书史”系列讲座“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王家葵主讲，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熊长云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评议。

26
2018-03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到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商讨与香港中文大学 –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深化深入合作、举办历史人类学研习营等事宜。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访问文研院，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商讨合作事宜。

27
2018-03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九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闵雪飞作题为“弒神诗人佩索阿——读组诗《守羊人》第八首”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

静园二院玉兰花开。

28
2018-03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巴蜀符号论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赵刚、韩潮，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孙正军、徐建委、高波参与讨论。

30
2018-03

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邀请主讲学术讲座，题目为“前丝绸之路的亚洲草原的文化交往—以金属器为视角的考古学研究”。

“静园雅集”第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现代北大学者的西文藏书”。南方都市报社编辑、书评人刘铮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31
2018-03

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应北京大学哲学系邀请于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参加“自由与法权：黑格尔法哲学的现实意义”学术研讨会。

02
2018-04

邓广铭先生之女、原农村能源行业协会会长邓可蕴到访文研院，与院务会成员商讨“老校长与北大”展览事宜，并提供北大东厂胡同旧址相关信息与资料。

03
2018-04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高波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副教授李溪作题为“文人之物：从苏轼像中的‘杖’谈起”的演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担任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评议。

04
2018-04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应邀前往北京山水美术馆参观由中国汉画学会主办的“中国汉画大展”。参与本次活动的有：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以及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全程讲解。

09
2018-04

英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艾什·艾米（Ash Amin）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副校长王博会面，商讨两校未来学术与国际合作事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陪同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读书”第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十里八村》研读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作引言。

11
2018-04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细读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一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作题为“通往华夏之路——六朝南方山区的历史进程”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

12
2018-04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办。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发言，题目为“作为文明研究的区域和国别研究”。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日俄战争、东北亚与世界近现代史的转折——《日俄战争》新书研讨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主讲，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再谈朝鲜战争：从信息沟通和情报认定看中美苏三国的决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教授金东吉评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

13
2018-04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宋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及全体行政人员到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探讨双方学术规划及合作事宜。

“文研读书”第十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 –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作引言。

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中心主任冯金红一行来访文研院，并与院务会成员商讨出版合作事宜。

17
2018-04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二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公主府到红楼：老北大的校园空间（1898–195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鲍宁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二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卢白羽作题为“进来吧，因为这里也有众神！——《智者纳坦》里的启蒙与宗教”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黄燎宇评议。

18
2018-04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刘亦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田园城市学说之思想来源及其全球传播与实践”。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高波参与讨论。

19
2018-04

商务印书馆向文研院赠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全套图书，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法律等多个门类，共计 448 册。

“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三期在静园二院 201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亚视野下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此次论坛由文研院承办，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教授张弛作召集人。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十余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茶叙（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访学者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刘亦师出席。本次茶叙，张治老师谈“从《说部丛书》看近代中国的翻译文学”，苏芃老师谈“‘愿’字的历时演变规律与古文献断代”。

20
2018-04

“静园雅集”第二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虚空擒事业——音乐的制造与思考”。大忘杠乐队及木推瓜乐队主唱、音乐人宋雨喆主讲，乐评人张晓舟担任对谈人，音乐人小河、音乐制作人孙雷、鼓手李旦、萨克斯手李铁桥出席并参与讨论与演出。

文研院校庆系列学术活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未名学者校庆讲坛在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办。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资深教师叶朗、张鸣，“未名学者”代表昝涛、陈侃理、王洪喆、陆胤、程乐松、孙飞宇、贾妍，文研院院务会成员及两百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活动。

23
2018-04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一行到访，并与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座谈，交流工作经验。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八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影集与华服：进入非洲档案”。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程莹评议。

24
2018-04

2018 年 4 月 24–29 日，由文研院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历史·自然·踪迹——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在山东举行。本次工作坊对山东多地的博物馆、摩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就碑刻实物与墨迹、拓本的关系展开讨论，同时对于清代碑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检讨。

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解读为线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滨、苏芃、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出席。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遭遇及相关看法（1868–1945 年）”。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阿伊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评议。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作题为“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敕瑞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平安评议。

25
2018-04

文研院校庆系列学术活动“老校长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纪念展”在静园二院地下展厅正式开展。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宝荣、副局长赵峰涛、办公室主任何长江，房地产管理司司长徐永胜，政策法规司司长陶雪良、政策研究与指导处处长汪雁访问文研院并参观“老校长与北大”展览。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仰麟、房产部部长殷雪松全程陪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介绍文研院基本情况及理念宗旨。

26
2018-04

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于 4 月 26 日、5 月 8 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6 号院进行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杨绛 / 钱锺书的翻译：视野、风格与观念”、“路吉阿诺斯在中国：以周作人、罗念生与钱锺书为代表”。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全球化与土耳其的亚洲研究”。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阿伊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评议。

27
2018-04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八九期第二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绘画 / 政治 / 摄影：马莱内·杜马斯、卢蒙巴夫人与非洲女性图像”。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程莹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刘晨评议。